

前 言

我們生活在一個偉大的和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時代。命運已被判定的資產階級看到他們衰朽的制度從根本上動搖了，所以竭盡全力來支撐它，使它繼續下去。他們在“自由”的旗幟下却在破壞自由——特別是破壞工人們為矯正某些顯然令人不滿的現象而採取罷工行動的權利；在“和平”的名義下他們造成了超過國家經濟力量所及的軍備負擔。他們高談着國內團結以及和外國資本家之間的團結，而各種分崩離析和矛盾的情況却無時無刻不使他們的論調成為笑柄。

在這種情況之下，關係着我們國家前途的最重大的責任就落在工人階級身上。在他們的前面有一項重大的任務。他們必須消滅舊的事物而重新建設，但這並非輕易之舉。工人們在走上解放的長征中，從來也沒有一條便捷的途徑。這曾是很艱苦的鬥爭並將愈益艱難。回顧過去可以看到我們已經有了怎樣的進展，贏得了什麼勝利，失敗帶來了什麼，從其中可以吸取那些教訓來指導我們在未來的日子裡的步伐。

鑒於吸取重要的教訓這樣一個目的，我們的青年作家，一位新聞事業工作者兼經濟學家，就專心致力於這一總罷工的歷史著作。這種書籍的需要愈來愈增加了。這些書籍向讀者們指出和介紹了真正的歷史創造者——唯一進步的

和建設的階級——工人階級。

一般为大家所公認的歷史書籍大多只触及表面的；它們可以刻划出重大的事件和偉人而甚至毫不述及礦工、機械工人、鐵路工人、紡織工人以及其他許多推動着時代的車輪轉動和使那些“偉人們”可能有所成就的人們。本書所述是关于一樁重大的事件和一个偉大的階級。是关于那些被虛榮所驅使而變得妄自尊大的懦弱的人們在陷于他們自己所不希望的處境時就卑劣地拋棄了他們所領導的人們。

總罷工是一次巨大的階級行動，是工人階級在反對資本家剝削者的鬥爭中所達到的最高階段。這不僅是一次反對僱主們的罷工，也是一次反對十分公開地代表着僱主們的鮑爾溫政府的罷工。

當然鮑爾溫會感到欣慰，如果他能不經歷一次總罷工就能把他和礦主們的計劃強加于礦工的身上。大部份的工黨和工會的領導人也會因此而感到高興。但是壓力，強大的壓力却來自雙方。組織起來的工人們堅持着要求其他的工會全力支持礦工，要求最高委員會和工會執行委員會正視這一重大責任。另一方面，內閣中的好戰之徒如邱吉爾、費·依·斯密司和喬遜—希克斯也都“出馬參加屠殺”。

武裝部隊動員了，邱吉爾叫囂着要向英國的工人階級“攤牌”，正如同現在他以同樣狠毒的詞句叫囂着要向蘇聯的工人階級和東歐的工人階級“攤牌”一樣。邱吉爾當時的階級意識和今天一樣是非常明確的。他的階級利益高于一切，為此甚至於不惜使用唯一挽救其階級的方法——把自己的國家交給美國。

“攤牌”在一九二六年來到了，工人們担負起擊敗政府和僱主們的任務。如果他們有堅決有力的領導，他們是

会完成它的。但他們缺少的正是这样的領導。資產階級当时正处于危急的形势下，邱吉尔及其伙伴們也充分地認識到这一点。

在九天內，英國存在着兩個政府。資產階級及其僕从仰望并听命于鮑尔溫政府。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則向鮑尔溫政府進行斗争，并对它的命令置之不理，他們仰望并听命于自己的政府——最高委員會；并進而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他們自己的管理機構——行动委員會。在許多地区，警察局長要把一个犯人由監獄提往法庭或由法庭帶往監獄都要事先獲得該委員會的許可。全國主要地区都被掌握在工人階級手中。

但是工人階級的領袖却还没有准备好來正視此种情况發展的必然性和帶來的責任。

湯瑪士、貝文等人对于事态發展的恐懼并不亞于邱吉尔或任何資產階級的成員。他們不是早已被收羅進資產階級社會中“被寵幸的一羣”中去了嗎？当洛威还是一个有創見的漫画家时，他經常在他的漫画上描繪出一套禮服，这立刻就会被辨認出是杰姆士·赫·湯瑪士。他和其他的領袖們已經比資產階級更加“資產階級化”了。

这种領導的結果是可以預見到的。当工人們的士氣在最旺盛时，当組織日益堅強时，罢工却被取消了。这一决定是在湯瑪士的密友百万巨富南非礦主阿比·倍萊爵士的住宅中举行的会上所作出的，在这样的地点开会不是毫無意义的。

总罢工的重大的教訓——資產階級和工党領導人完全了解的一个教訓——就是为了勝利地貫徹一次階級行动就必须要有一个可靠的毫不动摇的階級領導。

一九二六年是階級對抗階級的时代；但是在其中的一方面，工人階級这方面缺乏階級的領導。

今天，在虛假的全國團結的幕后，兩種階級力量正在積聚起來。在一九四五年時工人表達了他們自己的願望要擊敗和結束資本主義，他們以為工黨政府的執政就能完成這一功業。他們的願望却被違背了。他們現在不僅受制于本國的資本家，還要受制于美國的資本家。這后一批凶惡的賊伙把麥克阿瑟將軍安插為亞洲的大老板，艾森豪威爾將軍為歐洲的大老板并以馬歇爾將軍來掌管戰爭機器。這些美國富翁的代理人將掌握着這里和西歐各國工人們的命運。至少邱吉爾、艾德禮和美國佬們希望如此。

但是工人階級也有其自己的主見。當他們開始行動時，這個腐朽的制度就要陷于危險之中。於是各式各樣的工人階級的活動都受到排斥。而特別是販賣各種謊言和污蔑以防止工黨領導下的工人和共產黨人結成統一的行動。

目前，報刊、無線電台、電影、講壇（除了少數可貴的例外）都傾其全力來欺騙和迷惑工人們。至於報刊，它是一貫如此的。羅勃脫·斯密利在一九二〇年時警告礦工說：“當你們提出增加工資的要求時，百分之九十九的資本家報刊都會反對你們，像騎兵一樣地謾罵你們，可是騎兵卻不會像有些報刊那樣地躺下。”^①

要警惕資本家的黃色報刊！工人階級有悠久豐富的經驗，按理說似不再需要提醒這一點，但不幸他們還沒有認識到工人階級不僅需要一個工人階級的領導，也需要工人階級的宣傳與教育的工具。

① 英語“說謊”與“躺下”均為Lie。——譯者

工人階級需要“工人日報”。需要有大量銷售數的是“工人日報”而不是工人階級敵人的報刊。如果能善于利用它，它將成為工人階級的一個何等有力的武器！研究總罷工以及在這一事務中報刊所起的作用將大大地有助於我們認清這一點。

以下是我們在研讀這本工人階級的歷史書籍時必須學習到的經驗教訓：一個工人階級的政黨，一個工人階級的報刊和為了準備最後決戰的工人階級的宣傳——為了新的階級行動，聯合起各種形式的工人階級和民主活動，走向結束資產階級的統治和完全實現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

威廉·加拉赫

目 次

前言	
引 言	战争的創痕..... 9
第一章	紅色星期五.....25
第二章	政府的准备.....39
第三章	战斗的边緣.....50
第四章	战斗开始了.....80
第五章	九天.....96
第六章	余波..... 135
結論 160

引 言

战争的創痕

一九二六年五月三日星期一当斯丹莱·鲍尔温先生——当时他尚未被授予爵位——在下議院起立时，整个國會寂靜而緊張地諦听着这一位保守党首相壯嚴地宣布：受到总罢工的危害的不是礦工們的工資而是“我們憲法上的自由”。也許鮑尔温先生真誠地認為——如同許多保守党人和不少的自由党人那样——总罢工是一个蓄意深远的旨在以暴力推翻政府，并在英國建立革命政权的“紅色陰謀”。那些認為憲法受到嚴重威脅的人們决不是一个影响不大的少数派。可是我們認為鮑尔温先生是个观察敏銳的人，这就可以肯定他决不同意这种看法。有几点理由可以說明。首先，首相非常清楚当时掌握着罢工領導权的职工大会的最高委员会既不盼望这些情况的出現，实际上也不相信这一羣众示威运动的政治价值。他們实在是被事件的發展所迫而出此，他們自己对这一事件的恐懼是不亞于保守党人的。鮑尔温先生也完全了解那些坐在下議院中对面議員席上的麥克唐納、斯諾登和湯瑪士之流的工党領導人物，他們也和托利党人一样地对工人階級的“直接行动”感到恐懼。而且鮑尔温先生也知道——虽然他不一定同意——內閣中的有力人物在財政大臣溫斯頓·邱吉爾的率領之下要与工人階級斗争，借此机会“顯示实力”。

这些情况鮑尔温先生在那个星期一都已經清楚了。的

确，全國正轉向一种暴力行动的形式，在礦主們的歇業命令發布后，事态發展的迅速也使人們感到惶惑。但是正在來到的暴力行动在本質上却不是來自工人階級，而是來自國家权力方面。

一九二六年的总罢工是英國工人階級歷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它代表着早期工人运动和現代有組織的工人階級的成長与發展之間的一个明晰的分界点。的确，总罢工被認為是一个偉大的里程碑，一个“反叛的烽火”，它反映着从一八二五年庇特的禁止結社法之被取消一直到一九二六年事件之間一百年的斗争。整整一世紀的悲哀与凄凉沸騰起来，匯成一次巨大的爆發，它使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成为工人階級空前規模的斗争时期。直到現在工人运动把从一九一八年的休战到一九二六年总罢工之間的八个年头作为一种象征。它象征着工人运动在經濟危机这一渦混水中掙扎，为議會中的議席而斗争，为了把工人們团结在一个足以保衛自己和对付雇主進攻的有組織的机构里而斗争。

要充分了解導向总罢工的各种事实，就不僅需要叙述其基本原因的歷史情况——礦工为爭取适当的工資的斗争——也需要解釋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一般情况。

当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最后的槍炮声停止后，欧洲發生了重大的社会变迁。欧洲人民憂慮着不僅是战争，他們暴虐的政权也使他們憂慮。欧洲大陸正陷于混乱状态之中，在殘酷的战争的漩渦中產生出新的力量。俄國革命的影响特別强烈，并且这种影响还在繼續發展，不断地震盪着整个西方世界。整个大陸的工人羣众仰望着东方，仰望着这个在沙皇寡头專制統治下獲得自己自由的大國。俄國革命的影响是如此之强烈，在克萊特竟至有人真正認為不僅英國总

罢工的时机已经来到，甚至可以在英国建立苏维埃政权。

巴伐利亚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很快就消灭了。匈牙利也建立了同样的政权，并且执政了几个月，直到西方协约国用罗马尼亚的军队把它淹没在血泊中。在欧洲中部崛起的一些少数民族摆脱了那已经崩溃了的奥匈帝国的躯壳，重新建立国家。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发生了罢工和起义。在德国，只是由于社会民主党人艾伯特、谢德曼、诺斯克等人和军部勾结的叛卖行动，才使得各地的革命运动没有发展成为一次在左翼社会主义者领导下的全国性的革命运动：右翼军国主义者的卡普暴动实际上就是被一次总罢工所击败的，这也是一次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表现。

其时，在意大利出现了一种性质不同的恶兆：墨索里尼组成了法西斯党。

在英国，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由于害怕战争的影响会损害英国帝国的利益，表现得极为凶恶。对印度实行其“铁腕”政策——当时正是在阿姆里则大屠杀的日子里，放逐和拘禁了埃及的民族主义者。英国政府派遣了黑黄团^①以恐怖手段破坏了爱尔兰的乡村，警察们任意地袭击居民住房，以法西斯式的野蛮态度劫掠财物，传统的民主权利尽被践踏无遗。这些遭受灾难的人无疑地大都是新芬党人和共产党人。自克伦威尔以来，英国和爱尔兰之间的关系从未如此之恶劣。

在英吉利海峡的那一边，当代的大政治家们却正在策划着凡尔赛的和平，替那命运不佳的国际联盟奠定基础，并筹建国际劳工组织。当欧洲正陷于饥饿与支离破碎的状态

^① 英国政府派往爱尔兰镇压革命运动的武装部队，因其制服为黑色及黄褐色，故名黑黄团。——译者

中时，劳合·乔治、克雷孟梭和威尔逊总统却在一种如凯恩斯所说的“空洞枯燥的陰謀”的气氛中进行着巴黎和会^①。

正在巴黎玩弄着各种秘密条约和肢解欧洲的计划的劳合·乔治在选举中获得了胜利。他的“国民联合”在议会中获得了絕大多数的席次，在一九一九年初的议会中，参加联合政府的保守党人及联合党人（包括某些以国民联合为标榜的人士）共有三百五十九席，参加国民联合的自由党人一百二十七席，参加国民联合的工党人士或其他“国民民主”人士共十五席。其反对派計有五十七名官方工党人士，一名合作党人及三名非官方工党人士（其中之二名后来加入了工党的议会党团），此外尚有三十四名阿斯奎斯派独立自由党人，七名爱尔兰国民党人，七十三名新芬党人（他们拒絕参加议会）和一些“独立人士”。在新芬党人缺席的情况下，保守党人就占有绝对多数。

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战争是对英国帝国主义的第一次重大的打击。虽然战争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影响已经在帝国主义的范围内发生了重大的作用，而英国的经济在一九一九年时，相对地来说，还没有受到损害。格·德·赫·柯尔写道：“战争差不多没有触动英国的经济结构，在前线或建立新的宪法政权方面也没有多大问题。通货虽有膨胀现象，但还没有严重到不可控制的地步。”^②

据凯恩斯估计，虽然战争使英国貧竭，但还没有严重地影响到国家的实际财富，他断定在一九一九年时国家财富約和一九〇〇年时相等^③。可是战争却使全世界经济力量

① 杰·默·凯恩斯：“和平的经济后果”。

② 格·德·赫·柯尔：“一九一四年后的英国工党史”。

③ 凯恩斯：“和平的经济后果”。

的均勢起了主要是不利于大英帝國的变化。倫敦仍然是一个廣大而富庶的殖民帝國的中心。可是四年的战争把新的社会的、經濟的問題擴大了，其影响对于英帝國內部的經濟來說——例如印度的情况即是——是極為深刻的。

英國國內一部份產業工人的工資之所以比較高，主要是由于英國自其帝國範圍內吸取了巨大的財富。于是一旦战争停止，各地民族革命的鼓动和不断增長的独立要求就要在英國的經濟上得到反映，这是非常明顯的事实。

英國政府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避免遍及全歐的革命浪潮的影响，在处理工業中的騷动时尽量爭取時間。复員工作也不得不加速進行，因为政府已經感觉到难以維持軍隊的秩序和紀律——总之当工業中普遍發生騷动时，在任何情況下，保持一支沒有任务的軍隊总是一件危險的事。英帝國主义財富的第一次大衰退也必然会給予英國工人階級生活水平一次嚴重的打击，这点也是同样易于了解的。資本主义决不願意自动地來分担战争經濟影响所造成的重担。在当时，用减少工資、延長工作時間、要求生產更多的產品等方法來挽救“貧困的”英國，还是比較新的方策。今天这已是一套習見的惡毒办法，但在一九一九年时，这还是統治階級的新法宝。

一九一九年——典型的“歷史学家的年份”——也是國際工会联盟和國際合作同盟重新开始活动的一年。在英國國內礦工、机械工人、鐵路工人、碼頭工人和紡織工人相繼提出了他們增加工資减少工时的綱領。同时也开始了各个工会集中的过程，最后組成了职工大会的最高委員會。

工会會員的人数在战争期間从一九一四年的四百万人增加到一九一八年时的六百五十万人，一九二〇年时已到

达八百三十四万四千人之多。大家很快就明确了由于战后时期的要求在工会运动中需要一个更有組織的、更統一的領導。經過了某些工会的联合以后，在一九二〇年有了極重要的發展：即在职工大会中建立了最高委員會，其权力远超过以往的与此相应的議會委員會。后来，究竟赋予最高委員會多大权力这一問題也就是左翼和右翼爭論得最劇烈的一点。

这些就是当时欧洲和英國的情况，也是工業中斗争的时代背景，这一斗争已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在貝尔法斯特和克萊特的船塢工人和机械工人中开始。克萊特的官方人士極为震驚，竟至宣布暴动法案。貝尔法斯特的工人要求每周四十四小时工作制，克萊特工人要求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

一九一九年初，在礦工提出增加工資减少工时的要求并声称要以罢工來达到要求之后的一个月，三角同盟的組織恢复了。这一同盟的組織在战时一九一五年就已完成，但迄未發生作用。这一个礦工、鐵路工人和运输工人的联合在当时的工人組織中完全是一种新的嘗試。

这一同盟的真实意圖就是在这一个相互合作的組織中，各工会會員要以行动來支援彼此所提出的要求。其实，这个同盟由于某些理由是很难發生作用的。首先这是一种新的开始，各个工会在当时都是極为謹慎的，对新的联合組織——甚至是同盟的組織——怀疑并嫉妒它們的自主。工会之間的对抗和爭执也决非片紙只字或簽訂一項“紙上協定”所能解决的，困难很快就發生了。再者，各个工業部門的危机并不是在同一时期都發展起來的。

当一九一九年礦工联合会正在对罢工問題進行投票时，政府立刻就覺察到形勢的嚴重并迅速地行动起来。在

巴黎遇到難題的勞合·喬治極力希望避免國內的困難，因為這必然要削弱他在和平會議上的議價能力。那一年在歷時一星期的全國鐵路罷工后，政府已被迫向鐵路工人妥協。一個月以后，政府又遇到了以驚人的速度成長着的“全國不干涉俄國委員會”，該委員會得到了工人運動中極廣大部份的支持。

三角同盟發展的可能性是無可限量的，政府知道礦工的要求得到了公眾的同情。所以勞合·喬治向礦工提出組成一個煤礦委員會仔細考察工資、工時和煤礦國有等問題，並作出有關該一工業的全面報告。

礦工們接受了組成煤礦委員會的計劃，一九一九年三月三日這個由約翰·桑基爵士擔任主席的委員會就開始了它的評議工作——這是戰后一系列的煤礦調查的第一個。

但當時並不可能作歷時數月以上的調查。礦工們極為騷動，桑基委員會乃決定將報告分成兩部分——先提出關於工資與工時問題的建議。第一部分在十七天后公布，委員會的調查認可了增加工資的要求並承認每天七小時工作制，還提出了每天六小時工作制的遠景。這確實是狡猾的一步，委員會承認了工人所提出的大部份的有關工資與工時的問題，而沒有涉及煤礦將來的所有權這一關鍵問題。礦工聯合會誠意地同意接受這種讓步，取消了他們所建議的罷工行動，並等待着委員會的第二部分報告。究竟這一個把問題分開來提出的戰略對於以後七年中事態的演變要負多大責任，這是不可能確定的。可是由以後所發生的事件來看這會是一個饒有興趣的猜測。

在委員會公布報告的另一部份時，雖然大家都一致同意煤炭公有，委員會成員中贊成煤礦國有的只是微弱的多

數。這種意見的分歧後來就被勞合·喬治所利用而對報告的第二部份所提出的建議完全不予理會。

約翰·桑基爵士以及在委員會中的六名工黨代表在管理問題上的意見也有分歧——工黨方面主張由一個同等的理事會管理而桑基爵士建議由各地區的市政委員會加以管理，其中只有少數成員由工人指派。委員會中的三名礦工代表是反對給予地主任何賠償的，只是因為其他三名工黨代表（其中包括薛耐·韋伯）主張對一切收歸國有的財產都給予賠償，才在煤礦這一問題上贊成給予補償。我曾經對桑基報告中的各細節加以研究，因為就國有化這一問題而言，委員會的調查結果對以後導致一九二〇年和一九二一年艱苦罷工的煤礦危機，曾起了極大的作用，並播下了釀成一九二六年五月掀起軒然大波的工業動盪的種籽。

在這一時期，英國工業中因戰後賠款而引起的繁榮保持了良好的就業情況，但是到了一九二〇年年中，開始出現生產停滯的第一批惡兆。自停戰以來一直保持在相當高度的物價開始下降。工業生產開始減縮，失業則不斷上升。其時礦工已經提出了增加工資的要求。在戰爭期間，工資的增加和生活費以及礦工們生產效率的增加並不是并駕齊驅的，工資對生產以及對生活費的比例實際上低於一九一四年的水平。

一九二〇年八月中旬，礦工增加工資的要求已形成僵局，礦工們投票決定罷工，並向新生的、未經考驗的三角同盟求援。

全國鐵路工人工會總書記杰·赫·湯瑪士先生要求在談判的時機到來時，三角同盟應被賦予全權解決礦工糾紛。礦工們拒絕對這一問題提出明確肯定的保證，當政府認識

到工会之間已經有了这种裂痕，其态度就愈趋强硬，这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最后，礦工們对所發生的挫折情况感到絕望，乃在十月中自行罢工，不再求助于三角同盟的支援。在礦工們采取行动的几天以后，全國鐵路工人工会宣布除非立刻解决礦工的爭論他們也將進行罢工。

將近一九二〇年末时，就在这样的气氛之下，被工人們的勇敢行动所刺痛了的政府，决定制造一件新的武器：这件武器的使用随着工業和經濟危机的加深而帶有愈來愈大的殘酷性，直到今天，它还是被用以压制罢工。这件武器——緊急权力法——使國家在罢工期間有廣大的权限來維持各种“重要事業”，在英國的歷史上这是政府初次在和平时期对劳資糾紛有裁決的权力。事实上，政府就抓住了这个未成熟的三角同盟流產的罢工威脅的机会，把这个新的迫害措施付诸立法——在战争结束后該一办法就已在布置中了。

就在一九二〇年工業的動盪不安之中，共產党誕生了；現已載入史冊的旨在阻止英國干涉新生的俄罗斯苏維埃政府的行动委員會在國內以驚人的速度崛起着。职工大会的議會委員會，工党全國执行委員會，和工党議會党团都参与發出了如下的响亮声明——“組織起來的工人中的全部力量將被用以反对这一（武裝干涉）战争”。工人階級的統一完成了：这一个偉大的進軍在進行中，在一九二〇年炎熱的八月中，英國似乎已被一种新的熱潮所籠罩。行动委員會沒有能進一步發揮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威力并不是由于工人們缺乏堅定的信心，而是由于他們有了胆怯的領導所致。行动委員會在完成了他們所要求的阻止帝國主义对苏維埃共和國進行武裝干涉这一任务后，就被解散并放回它們原

來的包裝中擱置起來——把國家權力又奉還給那些欣然從事于粉碎工人運動的人們。這是一個教訓——一九二六年又是另一個教訓。

一九二一年初，英國工業的劇降已發展到了相當嚴重的地步。價格的下跌，戰敗國以煤作為賠償的支付，和毀滅性的競爭，這些因素合併起來對於煤礦工業起了極大的影響。二月十五日政府宣布將結束戰爭時期國家對礦山的管理（自一九一六年起由國家管理）並決定交還私人業主的“適當”的時候就是一九二〇年十月所達成的煤礦協定滿期之時——一九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政府宣布這一惡毒的措施後，礦主們立刻（自發地——或是蓄意地？）聲稱將大大地削減工資。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每星期將減低兩几尼之多（每几尼為21先令）。和政府狼狽為奸的礦主們認為他們已選擇了“正確時刻”來扭轉形勢。

一九二一年二月時失業人數上升至一百萬左右——這在當時是一個非常的數字——而半失業的為數更多。礦主們認為這顯然是打擊工人的最好時機；這樣巨大的一支失業隊伍使他們地位鞏固，所以就在礦工要求增加工資的時候，他們要求大大地削減工資。

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解除礦山管制議案被通過而成為法令後，礦主們就貼出了他們的停業告示，一星期後開始了大規模的停業。礦工們就再次向三角同盟求援，全國鐵路工人工會和運輸工人工會都同意採取行動。職工大會的議會委員會和工黨也參與譴責了政府和礦主們的行動，並保證支持礦工。新生的共產黨更是站在鬥爭的前列鬥爭，舞台上正在布置一番巨大的鬥爭。政府方面的反應也

是同样有力的。新的緊急权力法被采用了并宣布進入“緊急状态”。軍事方面的准备就是召集某些預备隊，建立了一个由志願人員組成的特种兵团——保衛团。在各礦井口架起了机关槍，槍口对准了一堆堆的煤渣和寂靜的豎井。部隊全副武裝如臨大敌，紛紛开往大的工業地区。英國处在一种工業上的戒嚴状态。

但是在这塊土地的另一個角落里，在議會內的一間安靜的、華麗的房間內，正在進行着一次对此次事件生死攸关的會議——也关系到三角同盟的終局。礦工联合会書記法蘭克·霍奇斯先生被邀請在这一个各党（主要是保守党人）議會議員會議中替礦工方面發言。霍奇斯先生在回答一位保守党議員所提出的礦工們是否可以接受一个保証工資并不降低至生活水平以下的協議这一問題时，他未經礦工执行委员会的授权，就答称：“任何來自权威方面的这样的建議將被極慎重地加以考慮”。当这一言論被报告到勞合·乔治时，他就貪婪地抓住这一点（这顯然也是霍奇斯的原意）。而礦工执行委员会方面否定了霍奇斯的發言，并繼續提出其主要要求——由全國工資理事会和全國厂商联合会來調整全國各地——即在各盈利的与不盈利的礦井之間——的工資，使之趨于平均。

礦工自己發生爭吵时，三角同盟內的裂痕也擴大了。鐵路工人和运输工人宣称將不以罢工來支援礦工，除非（霍奇斯所同意考慮的）妥協的建議被提出討論。这种分裂擴大到了很大的程度，政府狡猾地利用了三角同盟中已知的分歧，再度使礦工們处于無能为力的地位。三角同盟的領導者們——如杰·赫·湯瑪士——当然是認為已經找到了一个足够机智的借口來避免这一次罢工而又不招致完全的非

難。可是，杰·赫·湯瑪士在四月十五日，星期五那天宣布的取消罷工，使整個運動陷于失望與混亂之中，直到今天“黑色星期五”仍然是英國工會史上一個醜惡的標志。

礦工們稱之為“叛賣”，他們是有充分的理由這樣來稱呼它的。關於三角同盟失敗的各種看法現在也是工人運動史上的一部份。這些看法和他們的結論和總罷工本身又是不可分開的，因為在三角同盟中錯誤的領導和缺少真正統一的原則的種籽就已經初次在很大的程度上顯現出來。曾被職工大會大力支援的三角同盟，如果它能正常地發揮其作用和得到果敢的領導，是可以成為工人階級手中一件強大的工具的。它是在爭吵與陰謀中瓦解的：各工會之間的嫉妬和一些很容易排解的摩擦却被容許來——甚至誘導來——敗壞集體行動的機構。這個“黑色星期五”悲劇的發生還不及五年後在一個重大得多的時機所重復的同樣的錯誤那樣重大。格·赫·德·柯爾述及“黑色星期五”時說：“姑且不論這件事的是與非，‘黑色星期五’結束了工人運動史中的一個時期”。礦工們痛恨着並在這增長着的危機中覺醒過來，繼續鬥爭到六月。其時由於極度的飢餓和精疲力竭才被追回去工作，他們的工資大為削減，他們的合同都被撕毀。于是在其間的幾年中籠罩着礦山峽谷的那種癱瘓狀態就開始了：惹起失望、仇恨和社會的衰敗滋長起來的壓迫和不平等的情緒，像毒癘一樣在峽谷中蔓延着……可是這是一種制度和生活方式的產物，這種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僅把混亂帶給英國而且也帶入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

“黑色星期五”的影響是極為龐大的。由於獲得緊急權力法的支持而感到欣慰的雇主們，加緊了他們的進攻，完全不顧及這種行動可能造成的痛苦與社會上的不幸。解除對

煤礦的管制实际上只是影响深远的社会和經濟的倒退的一个方面，这种倒退破坏了國家的穩定。机械工人、船塢工人、建筑工人、海員和紡織工人（在全國的停業后）也都被削減了工資。在取消战时農業津貼后，農業工人的工資也减少了。鐵路交还给私营公司，立刻就减少工資。在一九二一年末时已有六百万工人平均每人每星期被减少了八先令（这是一九二一年的水平）。房屋建筑計劃取消了，消除貧民窟的計劃“延緩”（这是个便捷的名詞）了，在經濟停滯的現象遍及欧洲时，英國工人階級原已低下的生活水平又劇烈下降。整个一九二二年中这种压力一直繼續着，涉及了不少次的停工（包括地方印刷業），那一年的二月，当“盖德斯的大斧”無情地落到工人头上时，也就是退却的高潮。这是爱立克·盖德斯爵士的杰作，他对各項社会福利大肆裁减造成了許多实际困难——但是这些措施却因經濟的“不平衡”而为保守党人所認可。一九二二年的最大的一件糾紛就是自三月延續到六月的机械業的停業，这一糾紛不僅牽涉到强有力的新生的（一九二〇年成立）混合机械工人工会，也涉及了四十七个較小的机械工匠工会。成千成万的机械工人在三个多月中为了反对停業而進行着艰苦的斗争，遇到了鐵路工人和礦工已經經歷过的迫害策略。

这一时期內工会受到了嚴重的削弱，战后增加的會員开始消失。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三年間，近三百万的工人放棄了他們的工会會籍，結果不僅在数量上，同样嚴重的是在財政上也軟化了抵抗的力量。

随着失業人数的不断增加——一九二一年末时已超过了一百万，一九二二年年中时达到了一百五十万，或者为享受社会保險人数的百分之十三点五——整个的工人階級認

識到了礦工的失敗已經把他們引入了二十年來最困苦無靠的時期。失業工人委員會于一九二一年的春季和秋季在全國各地舉行會議（一九二〇年十月時已經出現了失業工人的飢餓進軍）。逐漸地這些地方委員會被聯合在共產黨員、機械工人華爾·漢寧頓的領導之下，一九二一年秋末全國失業工人委員會運動就誕生了。其綱領的主要項目就是要求工作或按照工會規定的工資標準支付工資全額，在很短期間這個運動就在英國全國範圍內建立了三四百個地方支部[⊖]。

可是工黨却不願鬥爭的緊張情形，繼續拒絕共產黨所提出在工人運動中取得統一的建議。工黨會議年復一年地支持他們的領袖拒絕共產黨提出的聯合的要求。在一九二一年（第一次申請）以四、一一五、〇〇〇票對二二四、〇〇〇票被否決；一九二二年為三、〇八六、〇〇〇票對二六一、〇〇〇；一九二三年時為二、八八〇、〇〇〇票對三六六、〇〇〇票；一九二四年時為三、一八五、〇〇〇票對一九三、〇〇〇票；在一九二五年，工黨甚至進而排斥共產黨人以個人身份參加工黨。

一九二三年暫時的繁榮停止了物價的暴跌，由該時到一九二五年新的危機開始，這一時期中發生了不少事件。一九二三年法國武裝軍隊占領魯爾區，促成了英國出口暫時的繁榮，遵循着本國工業和資本家利益的法國軍事當局使魯爾區的工業停頓。而德國國內的右翼份子如斯丁納斯和其他的魯爾區工業家們在賠償問題上盡力使德法關係緊張起來，借以轉移羣眾們對投機奸商和當時已極為活躍的法

⊖ 華爾·漢寧頓：“一九一九年——一九三六年的失業工人鬥爭”。

西斯暴徒公正的責難。这三个國家的反动派就是这样地为了他們自己特殊的目的而利用欧洲令人絕望的局面。

在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四年这个短命的、發展又相当不平衡的繁荣时期，第一届工党政府成立了。这是一个新生的嬰兒，但有着强有力的父母；这是一个怯懦的政权，但是这个政府，尽管它在議會中是处于少数的地位，如果向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要求支持的話，是可以扫开那暫息后把它推翻的勢力的。⊖ 可是它却是一个从开始就拒絕相信自己力量的政府。一九二三年的大选結果是保守党成为最大的一个党，但是比自由党(在國會中有一五八議席)和工党(在國會中有一九一議席)的联合力量却还少八十九席。在工党議會党团幕后，經過了一番拖延和又驚又喜的躊躇，以及热烈的爭論，詹姆士·藍姆賽·麥克唐納決定組織他的政府——这一歷史时机經過了不少歲月后，現在已大大失去了它的光澤。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九一名議會議員中半数以上代表着各个工会(共一〇一名，而來自各地方工党組織的僅三十九名)，而这些屬於工会組織的議員中，代表礦工的議員达四十四名之多——这是最大的集团。

可是“好日子”和一个工党政府並沒有帶來期望中的社会条件的改善。还發生了几次罢工和停業事件，包括七月中的一次建筑工人大罢工，緊接着是一次歷时六个星期的全國性的停業。这年春天倫敦電車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資，公共汽車工人接着也罢工；当地下鐵道工人也声称要采取同情的行动时，工党政府(确系如此)就求助于緊急权方法

⊖ 第一届工党政府于一九二四年一月成立，于同年十月八日由于“坎貝尔事件”而崩台。見艾倫·胡特：“战后英國工人階級史”，第九四——九七頁。

了。这也开创了一个历史上的先例，因为一个工党政府使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权来击退工人们的要求这还是第一次。如果说少数派运动是在这一次行动中产生的，那是不确切的，因为它的组织在一九二三年就经过了讨论，它的根早已深深地种在煤田里了。但是工党政府的行动以及它所受到的工会运动中某些部份暗中的支持当然加速了这一运动的进程。

全国少数派运动是在一九二四年八月，在代表着二十万工会会员的二七一名代表参加之下的一次伦敦会议中正式发动的。它的单一的目的就是以组织工厂委员会的方法把工厂内的工人团结起来，争取在每一工业中组成一个工会（产业工会主义），并为在整个工会运动中建立起战斗的姿态而斗争。第一次大会由汤姆·曼主持，并选出哈里·波立特为总书记。少数派运动的参加者中也有职工大会最高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如乔治·希克斯和泼赛尔等。这一运动对于树立工会队伍中的战斗精神起了极重大的作用，这种精神在总罢工时达到了最高的表现。

在一九二四年四月，因为麦克唐纳政府在危急之际努力自行镇定，才间不容发地避免了一次全国性的煤矿大罢工。政府向矿工们（他们期望着从“他们的”政府那里获得一些改善）提出了一项以白克麦司特勋爵领导下的调查委员会的建议为基础的最低工资议案。该议案充其量也只是对矿工提出的要求的一个不像样的让步，但是不论如何该议案总是为了法律条文和各种解释而迟迟不能进展。最后矿工联合会不得不与矿主们直接谈判条件。在协定中工人的工资有了增加，但是为期只十二个月，这些谈判最后的结果就是直接导向总罢工的一九二五年的各事件。

第一章

紅色星期五

对于一个近代的工运史学家來說，溫斯頓·斯賓塞·邱吉尔是一个具有相当价值的人物，因为从他那兒是比較容易地追溯到許多在近代英國的面貌上留下了清晰标志的决定性的行动。在这方面沒有比他在一九二五年初在英國恢复金本位这一可恥的决定更好的例子了。向总罢工前進，实际上在那时候就开始了。因为恢复金本位就开始了降低成本推动出口的要求；而对一九二五年的工業家來說，降低成本只意味着一件事——再度削減工資。

溫斯頓·邱吉尔是斯丹萊·鮑尔溫在一九二四年末选举后所組成的保守党的政府中的財政大臣。保守黨員——利用了現已臭名昭彰的伪造文件“季諾維也夫信件”——得到了强大的多数而回到了議會。可是英國恢复金本位，部份是由于工党政府为邱吉尔扫清了道路。同意美國的道威斯計劃，帮助德國复兴以免走上“赤化”道路的正是藍姆賽·麥克唐納和阿瑟·漢德森。該計劃是最后在一九二四年八月倫敦會議上采納的，其直接的后果就是恢复德國資本主义的元气，使它和西欧的國家——特別是英國——發生劇烈的競爭。在許多方面，道威斯計劃是相同于今天的馬歇尔計劃——一个支持欧洲資本主义和阻止社会主义前進的計劃。可是这也是一个出色的例子，足以說明國際資本主义

所造成的，像鏈鎖反應一樣，由一個國家轉到另一個國家的危機，直到最後，使整個地區都陷入經濟的與社會的混亂之中。當德國競爭的第一陣烈風來到後的幾個月內，可以看出英國要用增加本國工人階級新的負擔這一辦法來擺脫其經濟上進退維谷的處境。在戰爭期間英國廢棄了金本位，可是現在這位保守黨大臣又聲稱要恢復“英鎊的威信”；在資本積累大量減少的情況下，邱吉爾在倫敦銀行家公開的影響下，不願恢復金本位可能引起各種危險的警告，就倉卒地投身於這一鬥爭中去。

英鎊的價格在一九二五年時已跌落到為其戰前價格的百分之九十，而倫敦的金融家們則竭盡全力想維持倫敦的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

當時散布在保守黨人中的經濟哲學和現在是一樣的：“英鎊的威信”問題比工人的工資重要得多。保守黨的經濟學家們辯稱英鎊的威望增高就能為倫敦帶來更多的貿易，就可以抵消最初由於價格較高而引起的出口減少的損失。他們說“提高工業中的工作效率”和減少工資與增加工時就能使英國重新獲得它在四年戰爭中所失去的大部分東西。所以在倫敦的金融家們和財政學專家們的壓力下，邱吉爾就決定在他的第一次國家預算中把恢復金本位列為一件主要的項目。愛姆立斯·休士在他的“戰爭與和平年代中的邱吉爾”一書中評論邱吉爾這一行動時說：“對於他的決定，如果要作一個寬大的解釋的話，那末就是他完全不懂得他的行動將給英國的貿易和工業帶來怎樣的經濟後果和嚴重影響”。

甚至於依照一九二四年英鎊的價格，英國還很難在海外銷售它的貨物。在一英鎊的實際價值只有十八先令時，

出口商的困难就由于恢复金本位而增加了，因为它直接地意味着外國的主顧要付出二十先令來購買只值十八先令的商品。可是工人階級却要為它付出代價。對於那些“大腹賈們”這倒不是一樁壞的交易。投資的價值增高了百分之十至十二，銀行的戰時公債投資的價值更是增加了若干億。

這也給那些認識到向工業國家輸出資本的商業利益的人一個小小的刺激——其中道威斯計劃自然是為所稱頌的。在一九二四年的選舉中，恢復金本位並非綱領之一，而鮑爾溫在坎貝爾事件和“季諾維也夫信件”之後確實也不太需要什麼“綱領”了。在這兩件“赤色陰謀”的掩蔽之下，對英國經濟的真正的威脅却在選舉期間偷偷地運進來，現在英國人民就要為他們自己的輕信而付出代價了。格·德·赫·柯爾在他的“一九一四年後的英國工黨史”一書中述及恢復金本位時說：“各工會並不願意接受這一計劃，它們認為這是企圖在經濟危機時把重擔全部轉嫁到工人階級的身上，而這一危機又是由於政府在本國的和美國的銀行家們指令下所採取的不良的財政政策所蓄意加劇了的”。（着重點是作者加的）

在所有的由於英鎊恢復其“同價”而受到影響的工業中，煤礦業的創傷是最嚴重的。在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間，由於法國在魯爾的行動而引起的德國生產和出口的劇降，煤礦工業乃經歷了一段人為的繁榮時期。一九二四年魯爾的撤兵，以及道威斯計劃的實行和美國投資的湧到，又鼓動了德國的出口，而差不多與此同時又發生了世界性的生產停滯，減少了对煤的需求，致使煤的出口價格暴跌。邱吉爾為了不致于使工人運動的憤怒波及到他，硬說煤礦

的危机与恢复金本位是毫無关系的。而答复他的不是別人却正是約·梅·凱恩斯[⊖]。

“从社会的道义上來說，是沒有减少礦工工資的理由的，他們是投入这一尊經濟偶像的車輪下[⊖]的受难者，他們活生生地代表了財政部和英格蘭銀行所策划的基本調整，滿足了倫敦巨头們急于弥补4.40美元与4.86美元之間（这是当时英鎊对美元的交換率）的一个不大的差額的热望。他們（礦工）和其他后繼的人是为了保證金本位的穩固所必需的一些不大的牺牲品。礦工們的陷入困境只是邱吉尔先生經濟政策的第一个，而不是——除非我們是非常幸运——最末一个后果，礦主們完全沒有考慮到物价是否减低而建議应当用减少工資的办法來补滿这一个缺額，也就是降低礦工的生活水平。而他們（指礦工）就变成了在这种既不应当对之負責，而又無法控制的情况之下的牺牲品。所以邱吉尔把兌換率提高百分之十的政策，也就是早晚在各人收入的每鎊中减去兩個先令的政策。要重复他在去年春天的实际情况之下的行动，他不啻是自找麻煩，因为他要把所有的工資和貨幣价值压低而又不知道怎样去办到。为什么他做了这样一件愚蠢的事呢？或者一部分是由于他缺少一种本能的判断來防止自己犯这样的錯誤；一部分是由于缺少这种本能的判断，所以就被財政界的騷擾的声浪蒙蔽了。限制信貸是一件不足取的强大工具，稍加使用就会發生巨大的作用——特别是在需要采取对策的时候。这种企圖降低工資而蓄意造成失業增加的政策已經部分地实施了，我們处境的悲劇就是在于，在官方的錯誤观点看來，这种对策

⊖ 約翰·梅那·凱恩斯：“邱吉尔先生的經濟影响”。

⊖ 指恢复金本位。——譯者

在理論上是公正的。沒有哪個部門的工人會在失業、罷工和停業的壓力下接受更低的工資的。並且為了確定這一後果起見，我們故意地使失業增加。

“利用英格蘭銀行限制的办法是可以使失業增加，一直達到任何必需的程度，直到工資降低下來。當這個過程完成以後，生活消費品的價格也會降低；那時候如果我們還幸運的話，就會又回到原來開始時的那種狀況之下”。

凱恩斯就是這樣來談到邱吉爾在財政部的這一段不光彩的表演的。而英國也就這樣走上了通往總罷工的道路。

但是整個國家在那像洪水一樣復滿了全國的鬥爭高潮到來以前，還要經過另一個階段。一九二五年初，當邱吉爾正準備金本位預算方案時，工人們却在準備一個新的工業同盟。礦工聯合會是在是年一月首先提出建議，這一建議在一九二四年夏組成少數派運動時，機械工人也曾提出討論過。大不列顛礦工聯合會（即現在的全國礦工聯合會的前身），正如它的名字的含義那樣，是一個由二十個分布于整個英國各煤礦區的不同單位組成的聯合組織。從它在一八八九年組成時起，它的宗旨就是爭取減少工時、增加工資、提高工人的撫恤金，以及加強礦井安全，爭取更多的議會代表和——或者尤其是——煤礦及礦產品的國有化。其會員人數在戰後增加到了八十萬人，並且是英國戰鬥的工人隊伍的前鋒。他們在和自然所作的殘酷而緊張的鬥爭之下，很自然地就養成了他們的戰鬥性。一個工業聯合組織對於礦工當然是有着明顯的利益的，而在他們心目中也認為一切工業中工人的聯合行動是共同保障生活水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建議應當有一個礦工、鐵路工人、運輸工人和這次再加上的機械工人的聯合組織。這裡應該提到機

械工人並沒有參加三角同盟而他們的組織自一九二〇年混合機械工人工會成立後發展得極為迅速。

在一九二五年六月的會議上，來自各工會的代​​表推出人選，組成一個委員會，負責起草章程。鮑爾溫政府則密切地注視着這一進展。可是很快地，這個計劃就被煤田中的新危機所傾覆了，而討論也從來沒有越出起草計劃的初步談判階段。在籌劃新的同盟時，又出現了一個新的難題——一次向工人階級總進攻，和以往一樣，首先是对准了礦工，把他們打垮，然後是……

礦工們在鮑爾溫政府當政後，當然也立刻認識到他們和礦主所訂立的為期一年的協定在一九二五年七月滿期後，新的嚴重危機就要開始。這也就是他們急于準備這次鬥爭，倡議建立一個新的工人同盟的原因。礦工領袖向其他的組織解釋，一旦礦工們受到攻擊，并被擊敗，那末鐵路工人、運輸工人和機械工人就要被一種分而治之的政策——這在今天已是司空見慣的了——所逐個擊破。在這個危急的階段，團結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必需。但是礦工們同時又期望着政府也許準備作一定的讓步，所以他們決定力求和煤礦主在每班最低工資十二先令的基礎上達成一個新的合同，可是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和礦主商談時，礦主提出了削減工資——甚至还打算提出延長工時的要求。礦工聯合會就要求政府修改煤礦業最低工資議案（該案系在一九一二一年礦工罷工後由自由黨政府首次提出），並提出最低工資為每班十二先令。還再度提出了組成全國聯營和保證工作時間的要求。但是他們很快就認識到鮑爾溫政府和礦主們是勾結起來的：他們代表着同樣的利益，他們對社會和經濟的看法也是一樣的。形成僵局以後，礦主們於六月三十日

發出通知停止現存的合同，提出大肆削減工資的建議，取消全國性的合同，而代之以區域合同，並且拒絕承認最低工資的原則。其限期為七月三十一日。

礦工的領袖們事先曾預計到一些問題的——可是資本家們的要求却超出了他們的估計。礦工震驚於礦主的無恥，就向整個工會運動求援，職工大會允予幫助，並通過決議“完全支持礦工”，保證“在這一反抗降低礦工生活水平中和礦工們全心全意地合作”。在職工大會作出決議的前一天，鮑爾溫已經對這一糾紛進行了第一次干涉，七月十四日首相宣布成立一個調查法庭處理整個的問題。礦工們拒絕予以合作。

七月二十七日法庭提出報告——全部是對礦工的譴責，但它又沒有提出任何具體的建議。當政府正狂熱地在幕後建立起破壞罷工的機構時，愈來愈多的工會向礦工們表示它們的支援，七月二十六日鐵路工人工會和運輸工人工會聲稱：如果礦主們不撤回其停業通告，他們就將在英國全國範圍內停止運煤。這一行動並為七月三十日職工大會所召集的工會執行委員會全國代表大會所批准。同一天，鮑爾溫先生召見了礦工的領袖們，在談話中，首相說出了他的有名的——或許是臭名昭彰的——一句話，他在回答一個礦工的問題時說：“我認為全國的工人都必需接受工資的削減，以幫助工業站穩腳跟”。礦工們在聽到了這位大不列顛首相嘴里所說出來的話時都為之震驚。可是這位不可捉摸而又貌似和藹的鮑爾溫却正在設法爭取時間，而在即將使全國交通系統癱瘓的工人聯合行動之前的二十四小時，他屈服了。

當工會執行委員會正在舉行特別會議時，鮑爾溫召集

了內閣緊急會議。首相和礦主們，其後又和礦工們不斷進行會議，最後在一九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星期五的清晨，在千鈞一髮之際，唐寧街宣布，政府對煤礦工業提出一筆補助費，為期九個月，借以使皇家委員會可以對該工業的全部工作進行全面的調查。僅僅在這一個杰出的轉變的四十八小時前，鮑爾溫先生還曾很堅定地說過“政府決不對該項工業提出任何補助費”。而現在却出現了這一驚人的轉變和最後關頭的不安定的和平。停業通告撤回了，礦工的工資穩住了，全國鐵路工人工會和運輸工會也收回了他們停止運煤的威脅。“紅色星期五”就是這樣出現的——這是對“黑色星期五”的回答——這個例子說明了統一行動的力量，也鮮明地証實了組成工業同盟的計劃是正確的。可是當工人運動中正充滿了歡樂的時候，當勝利的气氛鼓舞了組織起來的工人的時候，却還留下了一些不安的感覺。為什麼政府在似乎已經準備好戰鬥的時候，却這樣輕易地就屈服了呢？

毫無疑問，首相並沒有改變他原來的需要普遍削減工資這一意見，因為在八月一日，內政大臣威廉·喬遜—希克斯爵士在阿爾索普公園里還向他的聽眾說：“我們必須要（為經濟恐慌）找出補救的辦法，如果有此需要的話，那末不管要引起怎樣的不愉快，我要直截了當地說出首相打算在昨天的會上談的——換言之，就是為了和世界競爭，我國工人的條件、工作時間和工資必須要加以改變”。那麼為什麼政府在自信可以獲勝的時候投降了呢？這個問題的不愉快的答案在“紅色星期五”到九個月後總罷工爆發之間的幾個月中才逐漸顯露出來。

政府在七月的最後一個星期五清晨的戲劇般的最後讓

步，对于工人运动的影响当然是可以想像到的。勝利是那
样令人惶惑地不期而至，因为整个有組織的工人階級都期
待着向支持礦主及其他資本家要求的政府实力作一次長期
的和艰巨的斗争。可是在礦山的峽谷中，在一九二五年八
月的銀行休假日里，对这次得不偿失的勝利却很少存在着
錯覺。如果有某一部分的產業工人假想着“紅色星期五”是
一个工会团结完全的勝利，那末礦工們絕不会有这样的想
法。这一天的來到是由于工会团结所贏得的，这是事实，政
府知道如果繼續支持礦主的話，那末繼之而來的就是全國
性的癱瘓，因而政府就在組織起來的工人們的联合势力之
前低下头來，这一点也是事实。可是在政府的九个月的补
助費，以及建立另一个煤礦委員會的諾言后面的真正意圖，
也是顯而易見的。如果这一点在当时还看不清的話，那末
政府在以后几个月中的言論行动，也使人对此無可置疑。
鮑尔溫之所以投降主要是因为政府还没有充分准备好和有
組織的工人階級進行正面的冲突[⊖]。邱吉尔的具有巧妙的
战略思想的劝告是政府必須暂时屈服——而馬上准备組織
破坏罢工的机构，在下一大工会采取行动时加以粉碎，因为
他确知在补助金用罄后，煤礦危机再起之时，工会一定要采
取行动。邱吉尔、白肯漢勳爵和乔遜—希克斯这一个嗜战
的三人团說服了鮑尔溫，这是为了統治階級的利益先停止
行动，然后在國家的力量完全編制就绪并充分組織好以后，
再向工会运动猛烈回击。

报刊造成了一种气氛，認為“政府被有組織的工人羞辱
地击败了”，內政大臣威廉·乔遜—希克斯譏諷地問道——

⊖ 在許多年后，鮑尔溫在韋斯特敏斯特学校的一次演講中，他很溫和
地承認这就是政府在“紅色星期五”轉變的理由。

“究竟英國是由內閣管轄呢？还是由这一小撮工会領袖所管轄？”素來注意不輕易發表意見的高貴的詹姆士·藍姆賽·麥克唐納也同樣地为之震驚。八月三日他在獨立工黨的暑期學校中很輕蔑地說：“政府就这样簡單地不惜代價地把勝利的外觀奉送給穩重的、考慮周密的社會主義者認為也許是他的最大敵人的那種勢力”。這種偽善，甚至對於麥克唐納那樣的人，也確實是又進了一步，而其影響在後來的一个時期中變得更为明顯了。

麥克唐納所談到的穩重的、考慮周密的社會主義者當然是那些自一九一九年以來就竭盡全力地使那弥漫于工業中的騷動不至于發展成為工人階級革命運動的人。至于總罷工這個觀念在他們看來是該詛咒的。把總罷工作為一件政治武器這一理論和整個的國際工人運動的歷史是密切結合在一起的，而在英國，從憲章派起義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它却没有沿着任何一條堅強的或特殊的路線發展起來。甚至于在戰後，仍然主要是限于其理論的討論方面，而不是具體地計劃行動，從一些同盟的歷史來看——三角同盟和產業同盟——也足以證明這一運動並沒有給予有組織的羣眾行動的實際問題足夠有力的思想。

從其字義上來看，總罷工意味着全國一切工作的完全停止。法國的無政府工團主義運動，在剛進入本世紀時，認為總罷工是推翻現存社會秩序的最有效和可以普遍應用的武器。工團主義者甚至認為這種行動的結果會造成有利的條件，便利工人們在議會和資產階級制度自動崩潰時奪取國家機器的控制權。他們認為，停止工作就會造成革命。

可是馬克思主義者是一貫地反對這種見解的。他們一

逕認為總罷工是一件無比強大的武器——但也只是完成革命中的一步。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會認為總罷工本身就是一次革命的實踐，它只能是整個鬥爭中的一部份。

在憲章派的早期，總罷工的理論在英國首先是被作為一個實際問題提出來的。這就是一八三一年威廉·彭豪所贊同的行動政策，並為憲章派會議所接受。這在當時曾經是一個革命的觀念。彭豪認為總罷工可以用來促進羣眾起義，反對不能忍受的社會條件。他把他的理論建立在這樣的信念上，即把羣眾的社會壓力加諸於政府之上，把混亂發展成為革命是更為便捷的。的確這就是資產階級自己在歐洲在一八四八年這個革命的年份中所利用的概念。但是在各地的實踐，猶如各地的情況一樣，是不同的。沒有一個地方會有一個可以明確接受的共同行動的基礎。把總罷工作為一種基本的政治武器（有別於它作為日常勞資糾紛的武器）的理論的興衰是緊緊地跟隨着十九世紀經濟的動盪的。它在一八二九年至一八四八年間，在禁止結社法被取消後，在英國達到了其最高峯。但在進入十九世紀下半期時，由於經濟情況的好轉，英國的資本家能暫時地給予國內一部份工人一些津貼，於是工會就放棄了這一政治威脅的辦法。由於在強有力的琴他委員會[⊖]領導之下，大型的技術工人混合組織逐漸發展，全部停止工作的主張就愈來愈少有人主持了。

如果說資產階級是了解社會前進的力量，那是不真實的。他們甚至很少去分析他們自己的愚蠢或是有意識地去修正那使少數人掌握了最高權力和財富，而使羣眾陷于

[⊖] 琴他 Junta 系一八五〇年左右，英國工會運動幹部所組成的小團體，他們重新組織了英國的工會運動。——譯者

悲慘、貧困和墮落的罪惡制度。他們中間的有些大人物是了解的——可是害怕承認事實。

他們企圖零零星星地來補救這愈來愈嚴重的情況。可是除此以外，還有一種特殊的直覺——確實是由于害怕失去自己龐大的權力而產生的——這種直覺曾多次地把這一衰朽的機構從懸崖上挽救回來，免于最後的崩潰。他們並沒有懂得；可是當時對社會和經濟不滿的壓力上升到一個新的水平時，他們就讓步了——但這一讓步又不很大，並不會使他們的地位處於不可維持的境地，而又足以在心理上“收買”某些工人階級的領導。正如恩格斯所指出，這種腐蝕的形式只可能發生在一個巨大的帝國之內，它可以移東補西。它不穩定地平衡了社會力量，暫時度過了那不可避免的難關。它的確延長了壽命。而這一延長了壽命的主要同盟者就是那些被腐蝕了的人們。在這一分析中，理性並不是一支衡量的標尺。那麼是不是機會、直覺的準確推斷或是最後絕望的驚悸援救了這個腐爛的東西？不論英國原來的總罷工理論衰落的真正原因是什麼，統治階級用最後讓步的辦法來替代真正的改革的這種本領是有着明顯的作用。

國際間最初的總罷工號召之一是一九〇七年八月，在斯德特迦特舉行的第七次國際社會主義者大會上所通過的一項決議，號召進行反對戰爭和帝國主義的總罷工。[⊖] 在英國，以總罷工作為政治武器的幻象是凱爾·哈迪的夢想，而在一九一四年的前几年，在索勒爾“暴力的反映”一書給予它一種歐洲的時式後，無政府工團主義運動跨過了海峽。

⊖ “前進”，柏林，一九〇七年，第六四——六六頁。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一段短的时间內，工团主义式罢工的浪潮扫到了英國，然而其形式与發展是沿着和大陸模型顯然不同的路綫，而工团主义从來也沒有真正地在英國工会运动中生根。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时，由于物价的升騰和争取冲破战时工資的“冻结”，由于退伍士兵們發現了“适合于英雄們居住”的土地已經变成适合于失業者排列的夢境，在工人階級中發展了一种比五十年來所曾經經過的更为革命的精神。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間，参与罢工的有六百五十万人，这些罢工总共損失了一億五千万个工作日。关于总罢工的談論又复活了——最初是把它作为一件革命的武器——这在近代英國是第一次⁽¹⁾。該一思想是在几方面被談論着：在一个工業部門中進行全國性的停業；或者是在有关的工業部門中進行全國性的停業（即公路和鐵路運輸），或者是在某一地区，在全部工業中停止工作。主要是出諸于这种理論，并在这种激進的精神之下，最后誕生了三角同盟。

然而，把一九二六年的总罢工認為是一次推翻憲法的企圖，这种分析現在已經認為是不中肯的了。那时有着極大的自發的反对政府的憎恨。大部份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巩固地站在礦工这一边，在罢工持續的期間，他們的实力日益增長。事实上这是千百万男女所蘊藏着的感情的巨大顯示，当战后要出現一个新的更好的英國这样的諾言破碎以后，他們痛恨和醒悟過來，工人們从長期的恐怖的經驗中學習到某些階級斗争和資本主义弥补战争創伤的策略的教訓。从工人領袖畏縮的步伐來看，日益增長的工人階級力

① 一九二〇年五月，在政府向苏俄宣战这一件事上几乎釀成总罢工。

量是很可能促成全國革命形勢到來的。职工大会对这种思想的恐懼是不亞于政府的。也許这就是为什么最高委员会在“紅色星期五”之后就放棄了負責准备的精神，而政府却在好战分子邱吉尔、白肯漢和乔遜—希克斯的敦促之下警戒而坚定地增强戒备力量。

第二章

政府的准备

政府在“紅色星期五”的退却后，从八月份的第一天就开始准备着一次他們認為是不可避免的冲突，而且，坦白地說，如果能把整个工会，特别是礦工打倒，这也是他們所期望的一次冲突。絕大部分的准备工作是秘密進行的，但是在十一月中有一份公开的通告解釋政府所策划而由地方机构执行的破坏罢工的措施。

鮑尔溫先生于八月六日在下議院已經向各工会進行威嚇，如果它們再要迫使政府讓步，那末将用國家的全部力量來对付它們。首相說：“上星期我們面臨着工会強大的聯盟，如果再遇到一次这样性質的挑战，請容許我說，在一个自由的國家里迄今還沒有一伙少数人曾强迫过整个社会。”

在政府進行准备工作的整个时期，这种論調是很平常的。國內最有力的煤礦主之一，已故的倫鄧特累勳爵在“紅色星期五”后不久曾發出过这样的驚人論調，他叫囂道，“不論在流血和金錢方面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們要看到那些工会从头到脚地被粉碎”。^①政府的綱領不僅在一些非官方的声明中泄漏出來，而实际上还包括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日溫斯頓·邱吉尔在議会的講話中。

^① 引自華尔·漢寧頓：“一九一九年——一九三六年的失業工人斗争”，第一三五頁。

这位保守党的財政大臣談到鑒于貿易恢复的迫切需要和世界經濟总的改善，內閣認為七月三十一日的行动是必要的，他虽然是長于辞令的，但也咆哮着說：“我們也感到整个國家还没有充分地明了它所面臨着的斗争的性質及其重大影响……因此我們决定推迟这次危机，希望能避免它，或是，如果不能避免的話，希望在时机到來的時候，与之作有效的抗爭”。可是，职工大会的領袖們虽然觉察到这种“奇怪的和平”將導致更加艰辛的劳資斗争，却几乎没有作任何真正的准备。这种情况似乎难以令人相信，但是却有証据可以清楚地証实这点。恩斯脫·貝文，当时他已經升任到運輸与普通工人工会总書記之职，于总罢工后，在他的工会刊物“記錄”上寫到最高委員會的罢工組織時說：“它（指总罢工运动）在我國是初次發生：事先沒有作出任何的准备；这是一个臨時組成的機構”。

职工大会是充分地觉察到政府正在進行的准备的，这一点也可以由它在“紅色星期五”后向所屬各工会發出的一件通告中得到証实，該通告系由最高委員會主席艾·俾·斯威士及当时的代理書記華尔特·默·西特林簽署的。該文件在鼓吹七月三十一日星期五的偉大勝利及“对每一工会會員的巨大鼓励”后曾警告說——“工会运动必須注意和警惕，必要时要再度起來保衛其生活水平”。其含义是足够明顯的，但是它的負責人却沒有記取他們自己發出的警告。礦工們在銳利地觉察到將要發生的事实后，曾發出警告——“这是第一个回合。讓我們准备最后的斗争吧”。共產黨建議采取一次澈底的工会运动來对付鮑尔溫先生的恐嚇，要建立起强大的工厂委員會和各業理事会，并籌組領導总罢工的中央機構。它建議在这样的一次罢工中，工人階

級难免要受到來自“他方”的突然攻击，工人运动应当組成自衛团以防止挑畔。但是这一意見大部份都被最高委員會的領袖們和工党議會党团以这将被解釋为來自工人階級方面的“挑畔行为”为辞而拒絕。資本家的國家可以組織其軍事机器而工人們必須保持“不激动状态”，对这一事实的驚人的讓步早就証明了在总罢工中工人階級将要面对着两个敌人——無情的、决断的和准备已臻完善的政府力量；和或許是比一切更具有破坏力的他們自己的不坚决的領導者。

同时，在九月初职工大会正在斯卡巴罗举行會議时，政府就組成了以赫伯特·賽繆尔爵士(現为勳爵)为首的煤礦委員會。这是战后的第五次煤礦業調查，也是兩年內的第三次。但是这次政府就不再使它作出一个同情礦工的报告(如桑基报告)的可能了，以賽繆尔为首的这一組人員中，沒有一個人可以被認為是对于社会主义观点具有甚至是極籠統的同情的。賽繆尔委員會的成員計有：

赫伯特·賽繆尔爵士、主席、威廉·俾佛立奇爵士、陸軍上將赫伯特·勞倫士爵士和凱尼斯·李先生。而桑基委員會中計有主席一名和十二名委員，其中六名為礦工——或一般是屬於工人运动方面的——其他六名為礦主或礦主的友人。一九二四年的白克麥司特法庭調查和一九二五年的麥克米倫調查均由三人組成，其中每次都有一人為工人方面的代表。这次就沒有再犯这样的“錯誤”了。还能有什么比这四個人自己的履歷更好的証明嗎？赫伯特·賽繆尔爵士自一九〇五年的自由党政府起，曾任內务部次長、郵務長、內务大臣等职，一九二〇年任英國駐巴勒斯坦專員。他有着“开明人士”和一个正直的自由党人的名声，这可能都

是真实的。可是，要假定赫伯特爵士是倾向于左派的，那就是错误的了。威廉·俾佛立奇爵士（现为勳爵）在一九〇六年——一九〇八年間曾是“早晨邮报”的社論执筆者。他曾“發明”过工人介紹所，战争期間在軍火部工作，后来又在粮食部工作。陸軍上将赫伯特·劳倫士爵士是大金融信託机构格林·密尔斯公司的股東，并至少参加了其他十家大公司的董事會。凱尼斯·李先生是大棉花企業圖特尔、布劳德赫斯脫·李公司的董事長，和市銀行的董事長。該二企業都和煤礦業的利益有关。的确很难想像还有任何一小组人比这些人更能全面地代表資本家的利益和更有条件从维护資本的利益和保持一般現狀的观点去解决整个問題。

然而，不論其組成的成員如何，該委員會还是承認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事實。例如煤礦協會的主席就承認如果“如其會員所希望而延長工時，則工人工作時間（除西里西亞而外）將比任何歐洲的工人為長：該一建議將使十萬礦工失去工作，因為開掘出來的煤已經超過了市場的容納量”。^①

該委員會自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五日工作至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四日，在三月間提出了它的現已聞名的報告。但是在我們考查其調查結果前，有必要去追溯到九月間，和自當時至報告公布這一段時期中所發生的事件，特別是職工大會的斯卡巴羅會議，這是戰後年代中最重要會議中的一次。“斯卡巴羅代表着工會中左傾運動的最高表現”。^②但它後來却成了一個“紙上會議”——它通過了激進的左翼的決議，可是把一些不願意或不能執行大會要求的右翼領袖選入最高委員會。（大會）主席艾·俾·斯威士作了一次極

① 羅勃脫·默·雷納：“工會運動史”。

② 艾倫·胡特：“戰後英國工人階級史”。

为令人感动的講演。他宣称“坚定不移地奉行着的战斗的、进步的政策是能够统一、团结和影响我们群众的唯一政策”。他说工会必须重新掌握主动，恢复失地的时候已经来到了，因此“更大程度的工会团结”是必要的。然后主席在他的演说中谈到大会的一项关键的但也是最后未解决的问题——加强最高委员会的权力。斯威士脱应当把最高委员会建立为“英国工会运动的中央管理机构 and 指挥机构”，赋予“全权创立能与我們敌人的一切行动进行战斗的必要的组织”。接着就是他的值得记忆的结论，它使大会情绪高昂……“我们正进入我们的阶级向上斗争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四周都是各国人民觉悟的征象，谴责现在的社会制度”。

但是关于最高委员会职权这一重要问题的结果如何呢？大会本身并未作出最后决定，而将该一问题提交当届最高委员会，并指示它在工会执行委员会的一次特别会议中报告进展的情况。可是在斯卡巴罗大会后领导职工大会的最高委员会——杰·赫·馮瑪士又被选入最高委员会，恩斯脱·貝文初次当选——却并不打算利用这一时机扩大它的权限。

当职工大会在讨论这些决议而很少采取有效措施来实现这些决议时，政府正忙于准备行动。九月底时，已建立了良好的基础，以致有一个以志愿人员组成的，表面上没有政府任何支持的破坏罢工的組織公然出现，并宣称如果发生总罢工它将为“社会”服务。这一个被称为“供应维持组织”的机构“标志着英国合法的法西斯主义的开始”^①。

① 勒·庇·亞諾：“总罢工”。

控制該一組織的是資產階級中的一些領導人物，當政府發出“出動”的號令時，他們就將指揮行動。海軍元帥杰立哥勳爵；陸軍上將、前皇家衛隊司令官法蘭西斯·勞埃德爵士；名律師林登·麥卡賽爵士；以及和慈善事業組織有關的喬佛萊·德萊治先生；領導進攻的是彭赫斯脫的哈定奇勳爵，前印度總督并為外交部人士。所有這些人都是英國統治階級忠誠的和可資信託的奴僕。當工人們變成一羣“無法無天的亂民”時，就將依靠這些人來指揮他們的“志願組織”，並將使工會及其成員永志不忘。大工業家們把他們私人企業中的鐵路和試驗場地，在周末秘密地借給他們訓練機關車和車輛的駕駛人員，在電話和電報業中也以類似的形式訓練志願人員進行準備。①

英國法西斯組織的主席與副主席也參加了“供應維持組織”，因為他們認為“目前對於國家有效的幫助最好是支援‘供應維持組織’的工作”。② 如果它確如它所大聲宣稱的在本質上是一個自發的志願組織，那麼官方的態度又如何呢？這樣的一個團體在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結構中究竟占有怎樣的地位呢？內政大臣威廉·喬遜—希克斯自己就能回答這一問題。各報刊對“供應維持組織”的創立其態度的

① 韋·赫·克魯克教授：“總罷工”。

② 當時的英國法西斯組織系莫斯萊的英國法西斯同盟的前身。它是一個人數頗少的組織，它在莫斯萊開始他的法西斯組織許久以前就企圖仿效墨索里尼。在一九二六年時，莫斯萊當然還是工黨中的一個可尊敬的黨員——他還參加了一九二九年——一九三〇年的工黨內閣。直到一九三一年的分裂後，他才開始了英國法西斯同盟的活動。

見艾倫·胡特：“戰後英國工人階級史”，第一·四——二一五頁。杰·德·茂菲：“總罷工的政治意義”，第五〇頁。

冷淡是可以令人感知的，而在十月一日內政大臣發表了一個公開聲明，答复一位據說是“隱名的來信人”。喬遜一希克斯向他的神秘的來信人說：“感謝您昨天的關於‘供應維持組織’這一機構的來信。我可以完全坦白地向您談。在好幾個星期以前我已獲悉了該一團體的創立：實際上倡議者還會和我商討關於他們希望組成這樣的組織。我十分坦白地向他們說，在緊急狀態之下，保持秩序和維持必要的供應，使全國生活能夠正常地進行乃是政府的責任。政府已經準備好來擔負起這種責任。我的計劃早已訂好，並且政府已經全部批准”。（着重點為作者所加）

內政大臣接着談到他對“供應維持組織”的看法。“從這一個聲明，您可以看到不僅您沒有任何理由來反對‘供應維持組織’，而且您或任何其他的公民，只要是希望在困難的情況下能保持安定、秩序和良好的政府的人，就應當和這個團體或任何旨在依照我所建議的方式幫助國家的類似組織，採取聯合行動，那也就是一種愛國的行動”。

政府終於完成了它的組織。這種來自類似法西斯組織的可喜的幫助也被考慮在全盤計劃之中，然而，溫斯頓·邱吉爾卻特別不滿足於把這一任務交付給志願人員的組織：這個機會對於溫斯頓有很大的誘惑，他不甘於讓“業餘人員”來掌握。於是全國被分為十個區，每區以部長一名任專員統轄。各區分派公務人員管理糧食、運輸、郵政及燃料機構，在次一級地區也設立相應的機構。政府選派主席一名召集和主持志願人員服務委員會，以便召募新的志願人員，這些官吏被政府依據緊急權力法賦予特殊權力。這就是當時政府所計劃的頗堪注意的用以擊敗一次迄該時為止尚未提到的總罷工的軍事行動。的確有許多人認識到也許會發

展成这样的罢工。然而英國政府的这种行动在近代史上还是罕見其匹的。这一切等于什么呢？这意味着一个保守党政府支持着礦主的要求，即礦工（首先是礦工）的工資必須降低，为了使資產階級的國家获得勝利，政府已准备好在軍事的基础上來進行一次“階級对抗”。

当时已經支出作破坏罢工的准备工作之用的款項，甚至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也至少可以把礦工的津貼再維持一年。可是政府現在已經下了决心。这次一定要攤一下牌——讓工人們認清誰是屋里的主人。艾倫·胡特在他的“战后英國工人階級史”中寫道：“到十一月为止，（政府准备）工作的主要項目已經完成，人选也已决定，在十一月十二日第六三六号通告中，衛生部將該一計劃的一般性質通告各地方機構。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又对各种安排作了最后的潤飾。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和一九二六年一月各区的會議已涉及運輸通行証、制訂路綫等問題，并強調需要保持机動的警察隊，以便随时投入遭受威脅的地区执行任务。三月中又举行了審查整个計劃的會議、改進其余的具体項目。一切有关的官吏都得到通知在四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准备進行最后的會議。当时已是危机的前夕，虽然尚未决定总罢工，各專員及各区官吏都已守候在他們的总部中；这已是最后关头，一切均已准备就緒。事前安排好的信号是来自白廳的兩個字的电报——‘行动’。在（一九二六年）五月二日至三日的夜間，电报發出了，这機構就开动起來了”。

这一段文字讀起来很像是驚險小說——或者是一个偵探故事——中的一部份，但是它却并非虛構。当政府的准备已進入高級階段时，內閣發言人也更加大胆地对幕后進行的工作直認不諱。可是，無論如何，那些接触到政府計劃

的人，不拘是通过國會或是通过工業部門，也是完全清楚鮑爾溫在“紅色星期五”的讓步以后的各種情況的。

职工大会虽未作出实际的准备，至少在思想上曾加以考慮，可是工党在一九二五年九月的最后一星期所举行的緊急的利物浦會議上，实际上是放棄了陣地。职工大会主席艾·俾·斯威士的声調仍在与会代表的耳际：“坚定不移地奉行着的战斗的進步的政策是能够統一、團結和影响我們羣众的唯一政策”。但是这已是兩個漫長的星期以前的事了。現在，在利物浦、工党的領導方面，在詹姆士·藍姆賽·麥克唐納这位虔誠的社会主义組織者的令人敬畏的指導下，正在逐出共產党人，禁止共產黨員同时以个人身份参加工党。这虽然对于工人联合陣綫是有害的，但还只是事态更加惡化的先声。

工党利物浦會議后一星期，保守党在勃萊敦举行他們的年会。尽管这次保守党會議的代表們还对鮑爾溫在七月中向工人低头这一事实極为痛恨，但在首相允諾政府考慮对共產党人加以迫害后，这种情緒很快地就緩和下來了。共產党人由于要求工人階級方面進行“对抗准备”而触怒了政府。鮑爾溫狡猾地認識到虽然共產党还缺乏多數的支持，可是一旦总罢工成为事实，他們的警告是响亮而有力的，足以使他們在一次真正危險的运动中（对于統治階級來說，这是危險的）躍居領導地位。因此保守党人在他們的会上提出二个方法，第一，控訴共產党的領導人員；第二，訂出法律，使工会失去战斗力。第一个办法是在一星期內就实行了，第二个办法应当是在总罢工之后才照办的。所以保守党人在勃萊敦考慮成熟后一星期，共產党倫敦总部就受到襲击，文件被查封，党的十二名主要領導人被逮

捕。⊖ 在中央刑事法庭的審判中，十二名共產黨人被控以言論煽動叛亂（檢察長說“出版列寧先生的著作”）并分別判处徒刑六個月至一年不等——这就足以使他們在一九二六年四月底煤礦業危機再度开始时，不能参与其事。这次審判共產黨領袖的幕后真相是不僅要瓦解黨的中央領導，還要禁止一切共產黨或近乎共產黨的活動，这种活動曾使政府在对总罢工斗争的准备工作中遭受困难。可是來自工人運動中的抗議是如此之強硬，致使鮑爾溫和許多保守黨隊伍中的人士开始再度考慮他們的处境。礦工聯合会在提出抗議的各組織中，各列第一，在南威爾士硬煤礦井中的一次特別劇烈的罢工斗争中約有五十名礦工被拘禁。这一些事件的后果却是共產黨黨員的數字在六個月中增加了一倍，目前黨和少数派运动仍然繼續他們的工作，喚起工人并警告他們前面的危險。

風暴正在密集，当一九二五年聖誕節快要來到时，礦工們开始感到極度的不滿，因为無論在职工大会的最高委員會中或是工党内对形势的緊急都缺乏真正的認識。这已十分清楚，最高委員會并没有作任何与政府冲突的准备，而把差不多全部的希望寄託在賽繆尔委員會的調查也許能作出一个令人滿意的結論这一点上。

礦工聯合会的总書記阿瑟·杰·柯克認識到礦工們如果要爭取主动，那么他們必須依靠自己去获得。单独地依靠最高委員會制訂战斗計劃是没有用的。所以建立工業同盟的企圖又复活了，十一月五日在倫敦举行了一次會議，对建議中的同盟的憲章加以考慮和批准。这一計劃立即得到

⊖ 麥克麥納斯（主席）、英克平（書記）、加拉赫（副主席）、波立特、坎貝爾、漢寧頓、貝爾、坎德、魯斯脫、茂菲、亞諾和温特林翰。

某些大工会的支持，包括运输工会、机车工人工会、全国铁路工人工会、翻砂工人工会、钢铁工会、电气工会和机械工人工会。

该同盟成员的条件之一要求所属各工会不拘他们的任何其他协定的约束，必须肯定地承诺要依照“本同盟大会的指示行动”。正如勒·庇·亚诺在他所著“总罢工”一书中所指出，这个建议中的同盟不外乎在于“建立一个工业联合中的最高作战委员会”。其目的是要把一个巨大而有力的工会集团统一和团结起来，并使它能在职工大会的最高委员会中明确而决断地投票。它是一个泛工业同盟的基础。整个计划均经慎重作出，并避免涉及赋予最后决定权这一易于造成破裂的问题，这一问题曾使三角同盟瓦解。

两件事实却使这一同盟在诞生前就流产了。首先就是全国铁路工人工会在十一月五日的会议上所提出的阴谋的修正案。铁路工人要求工业同盟会员的义务之一应当是为实现产业工会主义而进行准备——换言之，即在一个工业部门中，由一个单一的工会负责。可是全国铁路工人工会提出这个似乎是无害的，而且在理论上极可嘉许的修正案后，立刻可以看出其目的是在他们和机车司机和加煤工人协会之间制造隙裂，因为后者反对产业工会运动，另一目的则为掩饰全国铁路工人工会退出同盟的真相——而在任何情况下，全国铁路工人工会书记杰·赫·汤玛士从来也没有赞同过这一同盟。这一同盟从一开始就猝然受挫而逐渐烟消云散了。其他工会大部份都宣称它们需要在会员中进行表决以取得委托，在某些工会公布其表决结果前，已是一九二六年的三月份了——距离总罢工仅几个星期。这个时候再谈论“对抗准备”已经是太晚了，战斗差不多就要开始了。

第三章

战斗的边緣

新的一年开始并没有为工人们带来暂息。政府方面显然已无意后退一寸，而雇主们在赋予他们实力和支援的国家机器的暗示下，积蓄了力量，抓住每一次机会向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进攻。除了矿工以外，机械工人也被要求在同样的工资下增加工作时间（这和减少工资毫无区别），铁路工人也受到强大的压力，面临着减少工资的要求。雇主们所提出的唯一的辩解就是鲍尔温所说的工人们应当接受减少工资，使工业能够站稳脚跟这一论调。这就使得所采取的任何步骤都成为正当的。

其时职工大会的最高委员会还没有迎击进攻的战斗计划，也没有采取“对抗准备”以应付政府的军事措施。经过了一月和二月，矿工联合会认识到时机已经不再对他们有利，就迫使职工大会的產業委员会采取某些行动。最后经过一番高谈闊论后，他们终于在二月底和矿工们会谈，并同意向所屬各工会发出一个通告重申政策。这一通告宣称：“工会运动的态度在去年七月已明确表示，即它将坚定不移地、一致地来反对再度降低煤田中的生活水平。不能减少工资、不能增加工作时间以及不得干涉全国合同的原则。这就是工会运动现在的立场”。这是不够的，但至少它是毫不含糊其词的，职工大会已经肯定了它们是忠实于矿

工們的綱領，並且它是特別重要的，鑒于以後事態的發展，這裡特別要強調注意不得減少工資這一點。因為當發動總罷工比過去任何時候更為迫切時，和在總罷工開始後，最高委員會中胆怯的領袖們在他們狂熱地尋覓逃避之道和替罪羊時就抓到了工資問題作為他們猶豫不決以及最後叛賣的辯解。

三月十日賽繆爾委員會提出報告。如果說皇家委員會是一次澈底的失敗或是一次陰險的詐騙，顯然都把事實簡單化了。當這個由才智之士所組成的威風凜凜的機構提出報告後，礦工們所孕育着的懷疑和恐懼，以及他們對賽繆爾委員會的估價就完全得到了証實，它所使用的一切法律條款和妥協的贅言，只是為了說明一個建議——工資必須減少。它堂而皇之地宣布：“在一世紀多的時間內，曾是國家經濟實力基礎的煤礦工業現已進入了困難的階段。這種命運的改變乃是巨大的經濟力量發展的後果……”。一種有效能的思想：對政治經濟學的賢明的貢獻。可是關於國有化問題的意見，委員會也知道這是礦工們主要的建議，該報告卻以輕而易舉的言詞頑固地予以否定：“我們認為向我們提出的計劃並不是可行的，也不是明顯地對社會有益的。我們認為其中包含着嚴重的經濟上的危險，我們也找不到任何循其他更便利的途徑所不能得到的優點”。這樣就把國有化的論據拋開了。然而委員會確曾建議把礦產品收歸國有——“過去所犯的把煤炭的所有權交付在私人手中這一錯誤應當加以補救。礦產品應當歸國家占有……”但是這裡並沒有什麼革命的——或者甚至是新的因素：在七年前，桑基委員會曾作出同樣的建議，但毫無結果。而賽繆爾委員會也有一個相當深刻的見解，即他們的建議也是不會有

結果的。的確，這是事實，礦山的國有化不會替委員會所代表的利益帶來什麼“社會福利”：同樣真實的是，這對資本家來說是會把他們卷入“嚴重的經濟上的危險”。

委員會把調查結果分為兩個部份。第一部份他們稱之為長期改組的必要措施，在這一部份內，委員會集中了主要的精力——然而甚至是在這裡也沒有什麼很新的東西。他們建議為了提高效率要把較小的煤礦合併起來：加強煤礦和其他有關工業部門如煤氣、電力、化工、鼓風爐業和煉焦業之間的聯繫；但委員會並未建議樹立國有制，似乎報告中所計劃的都是私人工業卡台爾。委員會極力主張從科學方面去解決煤礦問題，要求在國家幫助下進行研究工作，還建議在分配制度中作全面檢查。為了長期計劃，它提出了下列的建議：把工作日固定為七小時半，組成礦井聯合委員會、生產紅利、分享利潤計劃，最後還慷慨地提出“當繁榮回到煤礦工業中時，應當建立每年工資照付的休假制度”。這是一層糖衣，因為委員會在解決“當前問題”的建議方面，它毫不含糊地主張“在規定日期終止時（即四月三十日）津貼應當停止，今後不應再採取這種措施”。

報告接着就作出了最後的致命的判決，即必須削減工資。他們認為，為了這一工業部門的利益，這是“必不可免的”。根據委員會的報告，在一九二五年的末一季，如果把津貼扣除，那末百分之七十三的煤炭，都是在虧蝕的情況下生產的。所以，依照他們的邏輯，生產費用必須要縮減，而削減工資則是唯一可行之道。在補充條款中，委員會又建議，如果礦工們寧可選擇延長工作時間，而較少地減少工資，“議會將無疑地予以批准”。這種貌似寬大的壓力，也是賽繆爾委員會的一個特點。在每一步驟上，毒藥都加上了

糖衣，然而毒性的強度絲毫未減。該一報告甚至說在他們的安排之下，某些地區的礦主們仍然沒有“適當的利潤”，而在大部份的地區毫無利潤可圖。但是隨着貿易情況的改善和價格的提高，他們是可以獲得利潤的——不然的話，礦主們也會在煤礦中提高工作效率而獲得利潤。當然這是一個罪惡的循環，因為對於礦主們來說“效率”意味着在人道範圍之內——或人道範圍之外——盡一切可能去榨取一個礦工的勞動。

在這一點上，把一九一九年桑基報告——該一報告被勞合·喬洽東諸高閣，再也沒有拿出來過——所作的結論與之相比較是很有趣的。桑基委員會說：“在煤礦工業中目前的所有制和工作制度是該受譴責的，必須以某種其他的制度替代之，應當用國有制的辦法，或者是國家收購，或共同管理的辦法，或者用二者結合的辦法以替代之”。可是賽繆爾委員會在這方面如何提出建議呢？答案是毫未涉及。在許多方面，赫伯特·賽繆爾爵士所領導的皇家委員會所作的分析要比桑基報告少得多，當然它的建議也沒有桑基報告所作的建議那樣的進步。賽繆爾委員會宣布“這一工業部門正臨近一種災難”，但它卻沒有去探討政府有關出口貿易的外交政策。它並不敢於去批評某些事實：如對蘇貿易關係的中斷（蘇聯為英國煤與煤產品的大主顧）；德國對協約國的賠款——在道威斯計劃的財政支援之下——以償付煤炭的方式支付。所有這些極為重要的因素都被小心地省略了——這是偶然的嗎？

要明了削減工資對於一百十一萬二千名礦工究竟意味着什麼，就必須要了解一下當時他們的經濟情況。他們每天的平均收入從八先令五辨士至十先令四辨士不等。這比

一九一四年七月时的工資水平約增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然而官方的生活指數却比一九一四年的水平高出了百分之七十五。礦工聯合會的書記阿瑟·杰·柯克在一九二六年三月號“勞工月刊”的一篇文章中寫道：“礦工每周平均實際收入不超過四十八先令六辨士”。要記住，這就是如賽繆爾委員會所說的，在一百多年來曾是“國家經濟實力的基礎”的工業部門的生產單位中一個工人的工資。毋庸爭辯，某些其他的工人比礦工們所得更少。

然而，在另一方面，礦主們還在訴說着他們的貧窮。他們一口咬定在煤礦中無利可圖，他們為了支持工業，不得不拿出本錢貼補，虧蝕甚多。讓我們來分析一下這種論據。首先必須要認識到，有些人他自己既是煤礦主（如鮑爾溫）而又在其他需要使用大量煤炭的工業中，或在與煤炭有關的工業中擁有產權。因此甚至是煤炭工業中的盈利數字都不能精確地表示出這些僱主們從他們投入的資金中獲得了若干的利潤。以下為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五年每年煤礦中所獲利潤的數字（以三月三十一日為年度之末計算）：

年份	英鎊	
1913	16,900,000	盈利
1914	21,100,000	盈利
1915	13,900,000	盈利
1916	26,200,000	盈利
1917	39,800,000	盈利
1918	26,300,000	盈利
1919	22,300,000	盈利
1920	41,800,000	盈利
1921	3,100,000	盈利
1922	1,800,000	虧損

1923	15,800,000	盈利
1924	28,800,000	盈利
1925	6,900,000	盈利 [⊖]

除了煤礦主的利潤外，這一工業部門還向皇室提供了巨額的租金及道路使用費[⊖]，總數在大不列顛全部每年約達六百萬英鎊之多。在這些領取款項的皇室人士中，如標特侯爵在戰後六年間，平均每年為十一萬五千七百七十二英鎊。英國國教的教務委員所得最多平均每年達三十七萬英鎊，其他的還有漢彌爾登公爵，十一萬三千七百九十三鎊；特立得嘉勛爵，八萬三千八百二十七鎊；諾森勃蘭公爵，八萬二千四百五十鎊等。所以當賽繆爾委員會述及工業中的困難情況並建議進行長期的、大規模的全面改革時，他們對於煤礦工業的財政基礎的某些最重要和基本的狀況却置若罔聞。

但是它和資本主義的許多其他的堡壘一樣，一旦你要去解開這個結，就分外看得清楚，沒有一次根本的變革不能在基本上挽救它的。在一九二六年的英國工業中，沒有任何部門比煤礦更能適用於這一標尺：沒有一個部門比它更加需要，不僅僅是改革而是從根本上去改變其社會形式。誠然，工人運動中很少有人——特別是礦工——期望賽繆爾委員會提出這樣的建議。可是職工大會的最高委員會却一直有这样的印象，即在賽繆爾委員會提出報告前，工會運動不應當有任何“激動”的行為。職工大會的領導以假裝着尊敬的样子等待着這個報告，最高委員會的領導也曾表示

⊖ 阿·杰·柯克在“勞工月刊”一九二六年三月號一文中摘引該數字。

⊖ 自礦井向外運送煤炭經過私人地產時所繳納的費用。——譯者

过在礦工的生活水平方面将采取毫不妥协的态度，但后来还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作为他们的缺乏准备和背叛礦工的借口。在工党和职工大会上層人士中，藍姆賽·麥克唐納先生对报告的評論态度是很典型的——他說，“这是政治思想史中的一个鮮明的标志……偉人們依次地为我们而战斗”。可是熟知麥克唐納先生的过去的讀者是不会感到驚訝的：十二个月以前，这位工党領袖在議會中就曾嚴肅地宣布：“对于我國來說，沒有任何灾难比巨大的工会集团和資本集团双方在工業上从事了一次自取滅亡的戰爭中更大了……”。

政府对于賽繆尔报告的解釋是建立在一個主要的論點上——礦工接受削減工資。这是鮑爾溫的態度的主要之點。正如礦工們所說：“如果委員會的报告有所成就的話，那只是为政府和雇主向礦工的工資作預期中的進攻提供了必要的論据”。[⊖] 庇·亞諾在他的“总罢工”一書中，更是嚴加譴責。他寫道：“參加报告的人們希望分裂工人运动，說服那些准备被說服的人以及那些比較不大願意被說服的人，使他們相信礦工們的工資应当减少，而其他的工会如果再重复他們在去年七月的行动，那是不正当的。这个报告在削弱工会的斗志这一目的方面是完全成功的。如果不是由于礦主們在三月下旬开始了他們的后备战略、提出新的建議，那末煤礦工業史的一九二六年的一章就会以各工会接受皇家委員會的报告，并拒絕支持礦工們反对削減工資的斗争而告終”。

为了处理一九二五年七月的危机而建立的职工大会產

⊖ 礦工联合会关于一九二六年总罢工的报告(第五六四九一号——第六頁)。

業委員會，當時的成員計有阿瑟·潑夫（后為爵士），主席；杰·勃羅姆萊，議會議員；愛·海戴，議會議員；喬治·希克斯；艾·俾·斯威士；杰·赫·湯瑪士，議會議員；班·鉄勒特；愛·格·華克登；以及華爾特·默·西特林（現為勳爵），代理書記——他們在賽繆爾委員會提出報告后之次日舉行會議，但是由於已和礦工們約定直至他們考慮報告的全部內容完畢后，暫不加以評論。次日——三月十二日——礦工聯合會召集了特別會議，明確地表示他們不接受委員會的結論。然而，在這次特別會議上并未重新表明立場，而議決在短時期內由各代表收集各礦區礦工們的反應，向四月九日的全體代表大會彙報。

在大会召开前，礦工們明確地提出他們迫切要求的就是职工大会果斷的決定。籠統的和含糊其詞的陳腔濫調早已不能適合需要了。最高委員會準備如何？這就是礦工聯合會提出的問題。政府方面當然已經催促礦工接收賽繆爾委員會的調查意見，并和礦主們勾結，勸誘礦工為了工業的長期利益，目前應當削減工資。在最高委員會的幾個薄弱的環節中已經出現了不穩的征象，他們又在搬弄着與礦工領袖們之間舊日的齟齬，并私下鼓吹礦工聯合會方面應當作“有秩序的退却”。然而任何神志正常的人能夠想像礦工的領袖們到煤礦城鎮去宣傳降低工資——甚至這種想法能令人滿意嗎？工會的負責領袖夢想出這樣的建議，那真是荒誕。

在賽繆爾委員會報告后的第十天，湯姆·曼在一次少數派運動的大會上致詞——與會的計有八百八十三名代表，代表着差不多一百万工會會員。這次會議被稱為全國行動大會，而其參加的代表人數開創了少數派運動會議的新記

錄。湯姆·曼以主席身份發言，大聲疾呼地認為工會運動要排除萬難去支持礦工，這是生死攸關的問題——他的意見大受歡迎。一位來自南威爾士礦工聯合會的羣眾領袖阿瑟·霍納說：這是“必要的，應當把工人階級運動中的一切力量動員起來，在一個中央的領導下，擊退進攻，並爭取實現每一部門中工人們的要求”。大會並催促各地的各業理事會應當動員該地區工人階級運動中的一切力量組成行動委員會。而職工大會的最高委員會則應當建立全國行動大會。這些都是有力的詞句——但它們也是可以實現的。只有那些最不可救藥的工人領導者們才把這樣的論調認為是挑釁性的。這不是進攻的論調而是自衛的要求。政府在許久以前早就暴露了它的意圖，而工人階級現在在這最後關頭才極力爭取動員和團結他們的力量，準備對資本家的國家機器，在絕望的危機來臨時所進行的猛烈攻擊抵抗到底。

我們還記得礦工代表大會是定於四月九日召開。但是到了四月八日，最高委員會尚未作出最後決定。自賽繆爾委員會的報告公布之日起，到四月八日之間，報刊上充斥了最高委員會不再支持礦工而尋求“妥協”的論調。這些報導，絕大部份都是出諸於想像，然而無可置疑，其中的某些也反映出是“事出有因”的。不難理解礦工聯合會是急於知道最高委員會的立場的。最後，在四月八日，產業委員會作了下列決議：

“本委員會和礦工聯合會的代表就煤礦工業的目前情勢進行了討論，特別是關於礦工們的某些看法——有關各煤礦主對煤礦委員會所持態度的聲明——本委員會重申以前的聲明，支持礦工們為爭取公平解決這一重大的困難而

努力。本委員會的意見為煤礦協會與大不列顛礦工聯合會之間的會談應當毫不拖延地繼續進行，以便在有關煤礦委員會的報告方面達成諒解，尽可能地減少雙方的分歧。本委員會並準備盡其所能予以協助，使能圓滿地得到解決”。

伴隨着這一決議的是代理書記華爾特·西特林的一封信，它說：

“最高委員會的產業委員會已經仔細地考慮了你們代表提交給今天（四月八日）會議的報告，其中你們要求委員會宣布，在煤礦主企圖實施下列措施時，支援你們聯合會：

- （1）恢復區域合同。
- （2）延長工時。
- （3）減少工資。

“委員會充分認識到目前形勢的嚴重性，但認為事態的發展尚未達到最高委員會需要最後地宣布其政策的階段”。

該信接着就重復委員會決議的一些措辭。

沒有人會用這一個答复來欺騙自己，礦工們更不會受騙。這並不是他們所要得自最高委員會的。這是一次十分明顯的退却——並且是一次重要的退却——自二月底他們的答复所承擔的障地上退却。這一裂痕現已成為公開，然而如果說它在這時才開始，那就錯了。四月八日的信件仍然是總罷工歷史中的一個關鍵，從那時起，某些職工大會領導人的叛賣才第一次公開地暴露。最初的裂痕自何處開始以及它是如何確切地發生，那是無法斷言的。它們也許是在三角同盟失敗時，或在那流產的工業同盟中，或者是

在各工会之間的許多次比較細小的競爭、摩擦和猜忌中就已播下種籽。

但是最高委員會的作用如何呢？一九二五年的斯卡巴羅大會會上的發言和決議就曾顯示出戰後以來最左的趨勢，但在實際行動中，它是顯然不夠勇敢的。例如在最高委員會的權力這一關鍵問題上，大會就曾建議要把當屆最高委員會建立為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機構——這實在是一個致命的錯誤的判斷。因為在這新選的委員會中加入了恩斯脫·貝文——初次當選——以及杰·赫·湯瑪士，他在一九二四年的工黨政府中擔任了一段時期的職務後，又以鐵路工人代表的身份再度當選。而希克斯、灑賽爾和鉄勒特等人只是少數。向右轉的運動已經開始了。

總罷工的失敗在最廣的意義上來說，實際上就是領導的失敗：它不僅是最高委員會中某些個人的失敗，也是其中大部份人所代表的整個右傾趨勢的失敗。理事會中相當一大部份人是共濟會會員，這一事實仍然不能有助於他們的戰鬥性；這是一種总的心理上的趨向的表現。自從“紅色星期五”以來的幾個月中，在工人運動中的各個職位上，右翼的力量顯然加強了。在各業委員會、各工會支部、工黨的地方組織和合作運動中——不論情況如何，都沿着這一條路線發展——這種趨勢已經發展到使得右翼的人士獲得了某些有權威的職位，並幫助造成了這一件巨大的叛賣事件。

當然，把對於這種政策的責難加諸於某一個人的肩上顯然是把事實簡單化了。但是在最高委員會中所發生的許多事實都是受到了杰·赫·湯瑪士強烈的影響的後果，因此對總罷工作任何真實的分析時，也是不可能符合於拉丁諺語 *de mortuis nil nisi bonum*。⊖

这个人(湯瑪士在当时,一九二六年时,为五十一歲)誕生于普法战争之后:生長在紐堡特的陋巷之中,他在九歲时,就在一家藥房担任清扫雜差的童僕,每周工資四先令,其后又做过布店助理員、引擎清潔工人和地方工会會員。这位杰姆斯·赫利·湯瑪士在二十九歲(一九〇四年)时就成为全國鐵路工人工会的前身,混合鐵路僱工协会最年輕的主席。他为人有野心,坚决而狡黠:在四十二歲时,他成为全國鐵路工人工会的总書記。当工人们正在摩拳擦掌准备总罢工时,湯瑪士却效法麥克唐納,正忙于和高级社会中的人士結交。甚至是菲力浦·史諾登——他决無理由把他自己置于遭受反攻的地位吧——在他述及湯瑪士时也說^①“我曾計算过,他每年化費整整三个星期参加工党會議,化費一百五十天去参加各种社团的午宴和晚宴。我还曾計算过”,史諾登接着說,“在这些会上,他一共喝了九加侖的香檳酒,他漿洗襯衣的洗衣費每年达十八英鎊”。

絕大多數的湯瑪士的傳記作家都一致同意他從來也不會是个社会主义者,而且他也相当小心地從來沒有以一个社会主义者自居。他的气度好像是个皇帝、王子、百万富翁、公爵或大使,而從來也不是工人的。他經常吹嘘他在“內燃机踏板”旁的日子——但是他却害怕回到这样的生活中去,他已确定决不会有这样的事發生。保守党人也認識到他的价值,他的朋友(确实如此)白肯漢勳爵曾給予他一个双关的評語,他把湯瑪士描寫成为社会主义者所培植出的一个最机灵的政客。还有誰能比白肯漢更能知道他呢?

四月九日礦工会議召开了,通过了一項決議:即对任何

① 对已死的人只說好話。

② 赫·勒·斯·菲耳德特:“杰·赫·湯瑪士傳記”,第五頁。

增加工作日長度的提議都不予同意；應該堅守全國合同的原則；不能接受任何有關削減工資的提議；該決議并被分送往各地區。

當礦工與煤礦主在四月十三日舉行會議時，已經可以明顯地看出，戰鬥已迫在眉睫。在會議上，煤礦主協會的中央委員會通知礦工，他們將在各區進行談判和簽訂合同，并廢止他們和礦工聯合會所簽訂的全國性的合同。會議在結束時已完全陷于僵局，與會雙方離開會議後，暴動的烏雲已經充滿在煤田的上空。次日礦工們再度與職工大會的產業委員會會晤并報告他們和礦主們會議的經過，委員會發出了一個令人鼓舞的聲明，“委員會重申以前的聲明，全力支持礦工們反對降低生活水平并在關於工資、工時和全國合同等問題上爭取公平解決”。這和僅僅在六天以前所採取的態度是大不相同的：的確，在事態的表面上，它重申了二月的聲明并与“紅色星期五”的精神相符的。至少，這是礦工們對決議的解釋。同時國際礦工聯合會又重申它的保證，即在煤炭供應中斷後，將實施禁運，阻止其他煤炭替代英國煤炭。

但是力求達成協議的工作仍在進行。在產業委員會發出支持礦工的聲明的同一天，鮑爾溫召見了職工大會和礦工的領袖。鮑爾溫極力使自己以“和平尋求者”的姿態出現，但是對請求繼續發給津貼的呼喚却毫無反響，四月二十二日他再度主持了一次煤礦主和礦工聯合會的聯席會議——這是總罷工開始前最後一次雙方出席的會議。但仍未達成任何協議——的確，在這個階段，是很少有可能達成任何協議的，因為雙方都已走向極端，政府雖有種種迫切尋求和平的表現，但已准备好這次暴風雨的來臨。

可是狂热地尋求擺脫絕境的產業委員會，在礦工與礦主的聯合會議陷于僵局和破裂以後，於四月二十二日晚再度往訪首相。他們極力懇求鮑爾溫親自干與并“更堅定地控制該一問題”。他們請求他，再和雙方會晤，并在他親身指導下恢復談判。首相為了答复這一呼吁，在四月二十三日確曾再度召見雙方，但情勢已是無能為力和毫無希望了。礦主們已經拒絕討論任何建立在全國合同基礎上最低工資的問題——或者甚至是在全國水平上，各地區的工資標準。顯然這是僵局的主要方面。

正如阿瑟·潑夫先生後來在他的報告中所說“事態已完全陷于停滯狀態”，就在這個時候特別產業委員會召集了藍姆賽·麥克唐納和阿瑟·漢德森出席處理煤礦危機的聯合理事會的一切會議。首相後來在述及這一系列最後的接觸時說，整個問題都是圍繞着延長津貼期限——甚至只延長半个月——在這期間，可能通過某種戲劇性的努力來達成一項臨時條款。僅僅一星期以後，杰·赫·湯瑪士就在下院承認職工大會請求首相在形勢發展到不可收拾前想點辦法。湯瑪士說，“我們商議了十天，在十天中我們向政府說‘你們迫使煤礦主向我們提出一些條件，不拘是些什麼條件，或者它有多糟。讓我們能夠繼續談下去’。他們說‘不，這樣不行’。”（着重點是作者加的）鮑爾溫認為，在礦工們同意接受在全國範圍內減少工資百分之十三又四分之一以前，沒有可能使礦主接受賽繆爾報告。

在四月份的最后幾天來臨時，已經不再有人對於問題的結局懷疑了。“每人都知道在五月一日危機一定要到來”，當總罷工開始時，湯瑪士在下院也這樣承認。礦工們決定在四月二十八日星期三召集一次特別代表大會，并且

議定职工大会于次日举行所属各工会执行委员会的紧急会议。但是在这两个重大的会议前，在产业委员会和鲍尔温之间还曾进行了一些新的会议。在四月二十六日星期一和四月二十七日星期二，还曾努力促使煤矿主与矿工重开谈判。鲍尔温要求职工大会帮助他扫清恢复直接谈判的道路，并请矿工们在鲍尔温主持下与煤矿主进行谈判的矿工的九人谈判委员会中容纳几名产业委员会的代表。对于这一要求泼夫说，“职工大会不难向首相保证我们不仅是愿意，甚至是迫切希望接纳这两项意见”。但是次日（四月二十七日）鲍尔温和矿工们谈判后，向职工大会谈，矿工们通知他，他们不愿意在谈判中有“第三方面”的参加。

但是究竟鲍尔温——或者他的内閣——对于寻求和平的谈判的诚意如何，这点可以由四月二十六日——即首相召见职工大会领导人的那一天——所发生的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件来加以衡量。那一天保守党的中央办公室向各报编辑发出了一封密件，其内容如下：“無疑地您正忙碌于預算辯論的問題。也許您能將附件轉交給貴處勞工問題通訊員。政府特別急切地想使公眾注意到煤炭工業中經濟狀況的嚴重性，上周提交下院的統計表已公布了在虧蝕的情況下所生產的煤炭的百分比。关于工時問題的論述也是有利的，希望在这方面能比减少工資的問題更加集中注意力”。（着重点是作者加的）

这有趣地反映出不受“外來”影响的出版自由以及作为一个政党的保守党和在政府中的保守党的区分（这是欺人之谈），除此以外，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的时刻，把这样一个特殊的备忘录送交给弗利德街的各办公室，而这位保守党的领袖和首相斯丹莱·鲍尔温又正在煤矿主与矿工之

間扮演着主要調解人的角色，還向职工大會發出呆板的求援呼喚。這就是在初步廝殺末期的氣氛。

在倫敦，法靈敦街，紀念大廳中所舉行的一次值得記憶的各工會執行委員會大會是“四月的日子裏”的高潮。但是實際上這是一次怎樣的會議呢？這是一次軍事戰略家們在一個能夠把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在頃刻之間動員起來的偉大行動計劃上作最後商討的會議嗎？這是一次手拿着劍等待着驚人的號召“拔出鞘來”的工人階級作戰人員的聚會嗎？很傷心的答案卻只能是令人垂頭喪氣的“不”。工人們只是在精神上有了準備，並且也是有足夠勇氣的，但是這樣卻不能，也永遠不足以向資產階級國家有組織的力量作戰。在倫敦所召集的各執行委員會的巨大的聚會正是處於礦工與煤礦主和政府之間的談判和职工大會的往來折衝的最後階段。誠然這次會議最後作出了主要的決定——“罷工”。但是缺乏準備的程度，直到好幾個月以後，都沒有充分顯露出來。一九二七年一月，在對總罷工事件的審查中，最高委員會向工會執行委員會報告，恩斯脫·貝文說：①

“關於罷工的準備工作，直到四月二十七日尚無準備，我也不希望任何人在離開當時的會議時獲得這樣的印象，即最高委員會已經有了一個特定的計劃來進行這次運動。實際上最高委員會直到四月二十七日他們被召集時，並沒有草擬計劃……”

在這會議上也暴露了當時职工大會的代理書記華爾特·西特林在聽到了邱吉爾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的臭名昭彰的演說後，曾經準備了一個行動備忘錄。但是最高委員會

① 一九二七年一月，职工大會最高委員會，會議報告，第一〇頁。

却駁斥了这个备忘录，其理由是“在現階段採納这样的建議是不合时宜的。”

这些事实当然都沒有在四月二十九日的工会执行委员会的會議上报告。但是幸而我們在追溯时，可以不由事实發展的先后順序去观察它而能加以分析。这是历史学者的任务——特别是社会主义的历史学者。特別會議自四月二十九日开始，并一直繼續至五月一日星期六的下午。在它進行的兩天半中，議論紛紛。这个运动中的一些大雄辯家們——如貝文、湯瑪士和藍姆賽·麥克唐納之流——在有組織的工人領袖前口若懸河滔滔不絕。这也是一个極為激动的时刻。在會議开始之日，最高委员会的主席阿瑟·潑夫追述了自“紅色星期五”至賽繆尔报告公布这一时期內的糾紛，以及后来与鮑尔溫先生的商談。从他所引用的賽繆尔委员会报告的一段文字中，也就可以看出最高委员会对该报告的态度，这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引文說：“在要求工業部門中的有关人士作任何牺牲之前，他們首先要同意应当尽速地，在条件許可下采取一切可行的办法來改進其組織和提高效率”。关于这点，潑夫指出：“現在有关这一問題的一切討論应当服从这一先决条件。从这点來看，談判早就应当开始。当报告書成后，我們之間的許多人都希望直接有关的各方面能够协同努力在我們所引用的一段文字的精神之下，使委员会的調查結果和建議能够付諸实现”。

可以看出最高委员会确曾对礦工們接受該一报告——及其削減工資的建議——寄予極大的信心与希望。在主席演講的最后一部份中，即有关和鮑尔溫談判的部份，他說：“目前的形势是在談判中還沒有任何肯定的結果，但是我个人認為前途是有希望的”。但是潑夫演講之后，在最高委員

会所提出的建議中却出現了(在第四節中)⊖ 与此相矛盾的論點：“從我們的觀點看來，煤礦工人的工資和工作條件已經是如此之低下，以致必需要從除了降低生活水平以外的方法中去尋求補救之道……”這是與賽繆爾報告的主要建議很不相同的。

最高委員會繼而要求休會至星期五早晨，以便與鮑爾溫繼續商談。

要求暫時休會的決議是由杰·赫·湯瑪士所動議而由恩斯脫·貝文所附議的。礦工的書記阿瑟·柯克在談到決議時說，他對它的解釋是：它意味着“肯定二月二十六日所發表的聲明”。“我們要求你們發表聲明”，他接着說，“而你們說，在增加工作時間、全國合同和減少工資等方面，你們會支援我們”。除了湯瑪士、貝文和柯克以外，在那天的辯論中，另外只有一個參加者——即維·杰·勃朗先生，當時的機關職員工會總書記——他的發言也是其中最具有揭發力量的。杰美·湯瑪士所強調的主要是要撤回把礦工關閉在外的停業通告這一點。貝文則以其粗糙的聲調，更進一步地在會議上說：“你們正面臨一種特殊的情況，因此從今后的二十四小時內，你們要不再成為分散的各工會。你們必須成為一個聯合會而放棄自主。礦工們必須把他們的命運和總的運動的命運聯繫在一起，而總的運動也必須要負責到底”。這些言詞比湯瑪士所用的更為強硬——但是他們都沒有超過維·杰·勃朗，那時他的表現比他當時的政治態度還要更左一些。他指出了一個相當觸怒了主席台上人們的和不受歡迎的事實，即這次會議的情緒不如一九二五年七

⊖ 礦業情況——職工大會，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及五月一日執行委員會會議報告，第三——四〇頁。

月三十日的那一次集会那样高涨。“我比较了这次会议的气氛和九个月以前的气氛。这里没有一个人不感到一种冷冰冰的气氛”。

对于勃朗的这个评论，在代表中有人发出“不”的叫喊声。但是他已经击中了痛处。他继续批评了最高委员会没有领导这一运动的拖延态度。“我要向会议提出，有一件事对于谈判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最高委员会应当清楚地表示对运动的立场究竟是怎样……据我看来，我们已经犯了错误”，他说，“据我看来，宣布我们行动的时刻是现在，而不是在麻烦的事情开始了以后”。没有任何人能够去责难维·杰·勃朗是希望加速最后冲突的来到。他毫不含糊地说他和其他人一样地希望能获得令人满意的解决。但同时他还可以看到在领导方面商谈中所发生的一些情况。他能够看到最高委员会正固执地拒绝采取明确而决断的立场，因而削弱了整个运动的勇气。杰·赫·汤玛士沉痛地回答说：“羞耻之心应当阻止勃朗先生发出他的谬论”。这点充分地说明了勃朗已经碰到了最高委员会的痛处。勃朗还批评了工党议会党团——汤玛士也憎恨这一点。但最紧要的是这位机关职员的首领击中了最高委员会最弱和最敏感的一条神经——缺乏决断。所以汤玛士才严加申斥。

在会议暂时休会后的一个夜晚以及第二天整整一天——四月三十日星期五——产业委员会、矿工领袖和首相在这漫长而麻烦的时刻中企图找出能和矿主达成共同协定的某些基础。他们分析了一个又一个的建议——一个又一个的公式由于受到这方或他方的批评而丢开了。在这像海潮一样的建议和反建议之中出现了两件重要的事实。第一件，也无疑是最执拗的，就是鲍尔温现在已公开地站在雇主这

一边了。第二件，就是產業委員會極力盼望避免最后的破裂，他們以礦工們准备考慮減少工資这一点來欺騙自己——假設賽繆尔報告是完全可以履行的。这后来也是礦工領袖和最高委員會爭端中的最为棘手的一件事实，礦工們否認他們曾对这样的問題加以考慮。但是產業委員會已經处于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之下，他們准备接受任何的錯覺，只要这种錯覺能够替他們提供一条从表面上看來似乎有理的撤退道路。至于鮑尔溫的战術，当时拉斯基教授曾寫道：“他要求礦工們接受增加工时的要求，而煤礦委員會又認為并無必要；他要降低工資，而又不能保証在今后三、四年內該業有任何好轉；他甚至不能肯定煤礦委員會羞怯的建議會以任何全盤接受的方式被採納；明知道对礦工的工資的進攻將是对工人們的生活水平总攻击的开始”。

在星期五那天，即四月份的最后一天，职工大会的產業委員會和鮑尔溫進行了十二小时以上的緊張談判。其时，执行委員會大会耐心地等待着主席台上的由艾·艾·潑賽尔先生、議會議員、最高委員會成員之一所作的，大約每隔一小时一次的新聞報告。例如在下午七时十五分，潑賽尔先生走上主席台在極其寂靜的气氛中說：“我剛从下院的會議室來，至于特別委員會在什么时候才能一定來到这里，还無可奉告。在特別委員會、首相、白肯漢勳爵和奧斯汀·張伯倫爵士之間所進行的歷时甚久的會議，現已与礦工代表恢复會談。報告會議的內容并非我的職責，但是我有义务要告訴你們，形勢極端嚴重，我們都应当留在这里或者在附近的地区，这点是極為重要的”。

時間一刻一刻地过去，半夜來到了，參加會議的工会領袖們就以合唱來打破这种單調的場面。最后，在下午十一

时二十五分，談判委員會回到法灵頓街去報告——已成僵局。

职工大会的主席阿瑟·潑夫先生向大会揭露了一封首相致礦工(联合会)主席赫伯特·斯密司先生的書信。这种書信的往返对于总罢工开始前的最后談判是具有如此决定性意义的，为了要了解斯丹萊·鮑尔温先生当时是如何考慮的，把这些信件全部引用是有必要的。

首相致礦工联合会主席的書信如下：

親爱的斯密司先生，

为了節省時間我現在以書信和您連系。我現在已經得到了煤礦主方面提出的建議，这点我昨夜曾告訴过您，这是他們和各地区的代表共同考慮的。他們的提議如下，即在一个統一的八小时工作日的基礎上(地面工人的工时也相应地增加)，全國工資最低額統一为一九一四年水平的百分之一百二十。(北威尔士的代表并不希望置身于全國性合同之外，但感到該地区的礦井在这样的最低工資額上，仍無法維持。)在向您提出煤礦主的建議时，我願意提醒您，如我昨天向您所解釋过的，我考慮一九一九年(七小时)法案应当保留在國家法令大典中，而另外立法規定暫時地增加工作時間。政府当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建立一委員會，由該一機構根据工業的改組或貿易情况改善的結果或二者共同的結果，提出建議是否適合于在煤礦工業中恢复标准工时。当然还要有一个依据礦主們的草案的全國性合同，該一草案業已提交給您——然而，已經加以修改，提出了全國最低工資額。我希望能獲悉您考慮后对于該建議的看法。可以看出如果目

前对工作時間作一些修改的話，一个統一的全國性最低工資額是可能的。可是，如果不能暫時地修改工作時間，那末，礦主們認為不可能再提出不同于以上的建議。無論如何，他們準備就該項問題根據賽繆爾報告和您商談，首先是全國性的問題。如已經談及的，當然還要有一前已述及的全國性的合同。政府已經宣告對皇家委員會的報告全部接受，并假定它也為礦主們和礦工們所接受；雖然，很不幸地，礦主方面和礦工方面并不是在同樣程度上無條件地加以接受，尽管如此，政府仍然願意表示它希望報告中的建議得以實現，我們相信這將對工業有利。政府特別提出，不論在任何情況下，应当立刻安排一次權威性的調查，研究如何最好地貫徹委員會所建議的有關將機構出售和合併等事宜。如果目前提出的建議不能為您所接受，我將樂于收到您的任何反建議，只要您通知我，您準備作進一步的討論時，我準備再度與您會晤。本函副本一件將送交潑夫先生。——您的非常忠實的，斯丹萊·鮑爾溫。

礦工們考慮了首相和煤礦主的新的動議，赫伯特·斯密司先生立刻答复了唐寧街：

親愛的首相先生，

今天下午通信員送來的煤礦主的建議已經由我們的執行委員會加以考慮，并且也由大會加以考慮，如您所知自星期三起大會已在倫敦進行，我們被授權對該建議作如下的答复：礦工們遺憾地注意到雖然煤礦委員會的報告是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發表，但礦主們却遲至四月三十日的下午一時十五分才提出了全國工

資合同和全國統一最低工資額百分比的建議，此時在煤礦區中至少已有三分之二的礦工已經由于煤礦主所採取的停業辦法而停止了工作。該一建議簡單地述及了回到一九二一年的最低工資額即比一九一四年的標準工資增加百分之二十，這就意味着把礦工們的标准工資一律減少百分之十三又三分之一，加以這是在為期三年之間延長工作日的條件之下，而要在一九二九年的十二月才能考慮調整。

因之，在目前的形勢之下礦工們考慮了這些建議，提出答復如下：他們一致認為建議是不能接受的，但是另一方面，覺得職工大會所提出的建議的說明（見附件）提供了一個談判和合理解決的基礎。我們對於延長工時的看法已為您所熟知，我們只需要說目前的工作時間：

(1)其長度已足夠提供市場所能容納的全部用煤；

(2)對於從事於一種危險而費力的職業的人來說，工作時間已是夠長的了；

(3)在目前的情況下延長工時只能引起失業行列的擴大；

(4)增加工時將招致我們的外國競爭者採取同樣的措施；

(5)這一建議是與皇家委員會調查的結果相反的。

至於反建議，我們只能說我們將與政府和礦主們，在進行委員會所建議的改組工作中最大限度地合作。直至這種改組為工業帶來更大的繁榮，不應當要求礦工們在他們的不適當的工資和工作條件方面作任何的讓步。代表礦工聯合會——您的忠實的赫伯特·斯密

司(主席),德·李查茲(副主席),維·庇·李却遜(司庫),阿·杰·柯克(書記)。

在紀念大廳的主席台上,阿瑟·潑夫說明談判並沒有在任何基本問題上破裂而問題只是在有关政府对礦工們答复的解釋方面。然而事实却是已經形成了完全的僵局——礦主們的停業通告已經在執行。全國的礦井中已經寂靜無聲。当杰美·湯瑪士在那天的特別執行委員會大会上作最后發言時,已經是過了半夜而進入了五月一日的清晨。他嚴肅地說:“过去從來沒有過,而我希望將來也不再會有這樣嚴重的危機,這一危機不僅是面臨着工人運動,在此刻也是面向着國家”。湯瑪士雖是如此嚴肅,却並沒有忘記他所扮演的角色。他實在還是一個害怕負起領導責任的領導者。“我的朋友們”,他說,“当談判記錄寫成時,我相信經常批評我的人要說湯瑪士几乎是跪了下來,這是真的。在我長期的經驗中——我曾經進行過許多次談判——我從來也沒有像今天這樣整天地乞求和呼吁過,我的呼吁不僅是為了礦工們……而是因為深信我对國家的責任也要求我這樣”。

湯瑪士在結束時說:“明天將要要求你們重新考慮一下形勢。將要要求你們執行委員會作出最重大的決定,這是過去任何工會工作者所從未考慮過的。不要在激動或狂熱之下進行考慮。不要認為這件事是輕而易舉的——這不是僅僅靠流利的詞令就能辦到的,也不是急性人所能辦到的,因為無論其結果如何,以後仍然要遇到無情的、艱巨的經濟問題。不要張皇失措。我們曾經斗爭過,我們曾經呼吁過,我們還會乞求過和平,因為我們要求和平。我們仍然要求和平。民族要求和平。那些要戰爭的人必須要負責”。

這是拖延甚久的談判的一個可悲的終局。這位大談判

家——一个大工会的領袖——一个巨大力量的团体的領導者——在工人羣众行动的远景之前，他却是在蠕动着。使湯瑪士憂慮的并不是談判的失敗——而是总罢工对領導人物的影响究竟怎样。因而他就退縮了。

第二天早上——一九二六年的五一節——在正午后不久，大会复会。前一晚，談判委員會自議會回來后就是一份印好的，簡述协同罢工政策的声明發給各工会。实际上，这是最高委員會的动員命令。准备停止工作的計有运输業（各种运输業），印刷業（包括新聞报纸），“生產性企業”（如鋼鐵、五金、重型化工和机械業），建筑業（住宅和医院建筑除外）。还悬請有关煤气和电力供应的工会“進行合作，停止动力的供应”。但也指示各工会在有关健康、粮食和衛生方面应繼續供应全國需要。虽然要求各工会“把权力交付給最高委員會手中”，但各个單位确切的罢工号召还是留待各工会自由行动。要求各業理事会帮助組織罢工，鑒于政府一定要雇特务故發出警告，要嚴防挑衅。最后，最高委員會要求“各工会的执行委員會明确地宣布，在采取行动而工会协定遭受阻难时，肯定地同意，直到該协定全部被承認，决不恢复工作”。

当八百八十四名代表的大会在星期六上午复会时，主席阿瑟·潑夫要求允許最高委員會暂时引退，以便“考慮所作出的决定的政策”，并由各工会对最高委員會的备忘录進行投票。一小时以后，大会复会，結果公布了——拥护最高委員會政策的計有三、六五三、五二七票；反对的有四九、九一一票。

这是一个極令人激动的时刻。恩斯脫·貝文先生宣布备忘录所列各工会將自五月三日，星期一半夜起停止工作，

然而，总罢工实际上就在这一瞬那間，在紀念大廳开始了。没有一个参加会议的人能忘記这一景象——一排排緊張而又沉靜的工会領袖們聚精会神地注意着主席台上向他們發出的每一个字。这一排排的人們將要立刻去領導英國有組織的工人進入一次劳資冲突，其程度之深与范围之廣使他們之間任何一个人在当时都不可能充分認識到这一时刻的重大意义。然而没有一个讀了主席台上講詞的人，甚至是在今天，能够怀疑这些人在某些方面是覺察出全國正处于重大的一瞬那間的。

最高委员会發出他們的罢工备忘录并不是事出無因的。当潑夫公布了投票結果之后，恩斯脫·貝文在主席台上披露，直至前一晚(星期五)。当產業委员会得悉了政府的倉卒行动，簽署了实施緊急权力法的命令，并在报刊上登載了招募“供应維持組織”人員的廣告后，才准备該一文件。各地方机关也已得到指示，立即采取前已述及的臭名昭彰的衛生部六三六号通告中的各項緊急措施。

貝文声嘶力竭地說：“我們認為，我想是正确的，當我們的人在那里时，我們一点也不知道發生的情况，这說明了政府在幕后动員着战斗的力量。常言道操刀者必死于刀，我們一致認為政府昨晚的行动正如諾斯勳爵和乔治第三的行动[⊖]同样的蠢笨，其結果必然要發生如我國歷史上乔治第三的行动所引起的同样嚴重的后果。

“我們不是向人民宣战”，貝文繼續說，“战争是在卑污的資本主义驅使下的政府宣布的……”。

⊖ 諾斯勳爵为美國獨立战争时期的英國首相，他也是英王乔治第三的一个柔順的工具，此处指北美獨立战争时期英國錯誤的政策。

对于所屬各工会的巨大的反响，貝文談了以下这段話：“我們認為你們的‘同意’意味着你們为了这一偉大的运动，把自己放在祭壇上，并且不惜把每一文錢都化上去，把每一件財產都投入，歷史將要最后寫出，这偉大的一代，为了不願看到礦工們像奴隸一样地被驅使着，准备如此去做”。这一發言掀起了代表們巨大的热情。他們欢呼了好几分鐘。恩斯脫·貝文，他在当时，和現在一样，能够制造出这种“激动人心”的效果，使得这一羣工会的听众差不多是自动地匍伏在他的脚下。貝文的結論說：“我以最高委員會的名义信賴这一階級中的每一个男女，为了勞工的灵魂和拯救礦工而战斗”。

机車司机和加煤工人协会的約翰·勃罗姆萊，議會議員，述及了机車工人也是“突击隊”的一部份，礦工联合会主席赫伯特·斯密司在动人的演說中說，他自己的工会以及最高委員會已經竭尽一切可能去挽回局勢，他对这种努力表示滿意。

其后就是最后的發言——詹姆士·藍姆賽·麥克唐納被邀請演說。在任何一个英國的社会主义領袖之前，從來也沒有过比这更好的机会，而像藍姆賽这样的一个出色的机会主义者就双手抓住了这一个机会，發表了一篇流利的演說。当然其中用的是麥克唐納式的含混的詞令，在末尾的特別重要的一段話是很典型的：“在星期一”他說，“我們將在下院展开辯論，但是我希望，我仍然在希望，我相信，我也必須相信，在那时候以前，將要發生某些情况，这些情况將使我們在下星期中愉快地熱心地和滿怀希望地走向工作”。是的，藍姆賽仍然希望着——仍然祈禱着會“出現”某些情况來阻止工人运动投入某种行动之中，这种行动在他

內心毫無愉快可言，在他的言詞中沒有真正的情熱，在他的社會主義者的靈魂中沒有真正的信服。

事實上當代表們在一九二六年的五一節唱着“紅旗歌”走出紀念大廳時，英國工會史上的第一次總罷工已被宣布了，但是他們好像是被麥克唐納這一雄辯家的符咒所催眠了似的，這羣工會領袖中沒有一個人知道蓋姆賽·麥克唐納站立在主席台上把他們送往戰鬥中去時，他的內心到底蘊藏着些什麼。他的傳記作者寫道：“他在這一盛大集會中是孤立的，他不僅是絕對地反對會議的宗旨，而且也反對他剛才還以巨大的熱情加以贊同的決定。但是在現場上並沒有人從直覺或自然感应的識別力中警覺到他們都被導入歧途，演說者並不是如他們想像中的那樣。直到事後，他們之間的某些人才認識到他們是受了欺騙，某些人才不再欣賞這種欺騙的方法和手段……麥克唐納的演說本來是被期望用以影響他的聽眾來支援這一号召同情罷工的動議：然而他既沒有在會議上，以後也沒有在下院中說過一個歡迎這種罷工的字眼”^①。

那麼，既然他是如此地反對這一次罷工，為什麼麥克唐納不憚其煩地接受邀請來講話呢？他的傳記作者這樣解答：“他沒有其他的辦法。整個工人運動是站在礦工這一邊。湯瑪士先生也是反對罷工的，但是全國鐵路工人工會却是全心全意地贊成。如果湯瑪士要想保存他的職位，那就必須順從他們的政策。如果他沒有這樣做的話，那末他的總書記的職務應當在一九二六年就被罷免了，如同五年後他加入國民政府時被罷免總書記是一樣確定的。”

① 勒·麥克尼爾·韋爾：“蓋姆賽·麥克唐納的悲劇”。

这是特殊情况。也是一件怪事。整个的工人运动为了这一战斗而紧张起来：这不是由于加速革命来到的愿望而引起的，而是如上所述的各种事件和形势的后果——才发生了这一运动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然而，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没有领导的群众运动——或者至少是缺少甘愿负责的领导。金斯莱·马丁^①写道：“职工大会在这场强加于它的战争中以战士姿态坚持立场，但它担虑是否能获得战争的胜利。工人的军队是由社会主义改良主义者所统率的，而政府的军队是由具有强烈的阶级意识并相信冲突不可避免的人所统率的”。

政府在各地都已准备好了。哨兵已在各个岗位上警戒。储存的煤已足敷应用五个月之久；一直到和平的最后一刻为止全国警察的力量仍有增加。可是职工大会除了在四月三十日半夜向各工会领袖提出备忘录和印发罢工通告外，并未作任何的准备。“在这一运动的每一处，共产党人都敦促为斗争而准备”，金斯莱·马丁又说，“他们要求组成工人自卫团，扩大宣传，特别是在陆军和海军，在工厂和作场中组成委员会，在各合作团体和工会中缔结个别的协定。他们认为，职工大会确实应当像一个相对抗的政府那样行动”。

当第一“枪”尚未放出以前就已经令人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即职工大会的领袖们战慄的罢工号召只是“虚张声势”，这使矿工领袖们也发生怀疑。他们知道矿工们自一八八九年以来从僱主或政府（或自二者）方面所取得的胜利都是经过艰苦而持久的罢工斗争。但是职工大会的缺乏准备造成

^① 金斯莱·马丁：“英国的公众与总罢工”。

了一种無可辯駁的印象，即他們从一开始就是反对为了同情礦工而進行罢工的。而当他們最后面臨现实时，他們唯一的願望就是設法迅速求得妥协——不願对礦工們是如何地不合適——以免羣众运动的發展超出他們所能掌握或發展成某些实在危險的情况……那就是，真正地动摇社会的現狀。

这就是开始时的气氛——对于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來說，这几乎是一个难以肩負的重担。倫敦以一次空前盛大的示威慶祝一九二六年的五一節——海德公園中到处都是游行的工人——工人“部隊”的士气極为高漲。但是在幕后，湯瑪士、麥克唐納等“元帥”却已在策划着無条件投降。

第四章

战斗开始了

从最初就可以看出在职工大会的首領和礦工之間，在关于進一步談判這一問題上，存在着一个嚴重的根本的分歧点。对于某些產業委員會的成員——特別是杰·赫·湯瑪士——來說，在紀念大廳中所採取的決定，其目的是在于作为一个買賣經理人的政府。他考慮到，仍然有可能对鮑爾溫、邱吉爾和內閣中其餘的人士進行恐嚇。但是這一次，甚至是湯瑪士也過低估計了他的保守黨中的朋友。他們不準備來這一套虛張聲勢的把戲。他們熱中于抓住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機器，並把它敲開。礦工們總是在懷疑着像湯瑪士那樣的人的更深的動機。他們回憶到早期的三角同盟和以後的工業同盟。就為了這個重大的理由——如果沒有其他理由的話——赫伯特·斯密司和阿瑟·柯克，在委托最高委員會全權代表他們和鮑爾溫以及內閣進行談判這一點上，是很審慎的。但這恰巧是最高委員會所要求的。他們辯稱，從執行委員會三天的會議上所作出的決定，一般推論是整個的糾紛現已完全托付給最高委員會，通過產業委員會，最高委員會有權“在時機來到時”和政府達成協議。礦工們答復既然整個糾紛是圍繞着他們的生活水平這一中心問題，那麼在接受或拒絕任何新的提議時，他們應當有最後發言權。這一爭執一直沒有解決，而戰鬥已經在彼此懷

疑、猜忌和不安的狀態中开始了。

在总罢工的宣布到真正成为事实的一瞬那，其間有二十六小时半的間隔。如何利用間隔時間这一問題，比任何事实都足以說明最高委员会和礦工执行委员会之間的分歧。礦工的領袖們在工会执行委员会大会結束后，立即回到他們自己的地区去。他們去作斗争的准备，因为他們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一斗争将是長期而艰苦的。过去的經驗教導过他們。礦工的書記阿瑟·柯克在其描寫罢工的一本書“九天”中寫道：“他們進行他們的工作，并确实感到政府已屢次拒絕考慮任何对礦工公平合理的条件，經過了長時間的談判，工会执行委员会差不多是全体一致决定去战斗，而职工大会負責不在沒有我們參加的情況下進行談判，他們可以安心地离开倫敦……”

但是在礦工們剛剛轉身离开倫敦时，最高委员会就和鮑尔溫通信，伸出手來并准备在任何时候重新談判。西特林送了兩封短簡到唐寧街。在第一封中他寫道：“我必須要通知您，职工大会所屬各工会的执行委员会，包括大不列顛礦工联合会在內，已經决定將糾紛交給职工大会的最高委员会处理，有关的談判也將由最高委员会負責。我奉命發表，如果政府希望進一步討論該一問題，最高委员会將隨時准备効力”。

几小时后，鮑尔溫又收到了來自西特林的另一短簡。它寫道：“親愛的先生，我奉命通知您，在职工大会所屬各工会为支援被封鎖而停止工作的礦工所進行的罢工中，最高委员会准备參加主要食品的分配等工作。如果政府希望就該一問題与最高委员会討論，他們准备効勞并将乐于知悉您在这方面的意見”。

柯克曾說過，他直到星期六晚上將近九時左右，他才知道這兩封函件，而那時職工大會的談判委員會已在唐寧街和鮑爾溫以及他的顧問們進行秘密會談。但這顯然是由於一個誤會，如果在分析時不加苛求的話，應當承認職工大會在同意與首相再度會晤時未必是故意地不把他們的意圖通知礦工。西特林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向全國罷工特別會議（一次調查會議）上說最高委員會在那個星期六下午三時三十分決定會見首相，“在作出決定還不到兩分鐘時，就派我們的同僚之一把這一決定以電話通知柯克先生，並將送交首相的函件的抄本親手送交柯克先生處”。而柯克并不在他的辦公室中，因而，由於這一“偶然的情況”，柯克直到那天晚上才發現西特林的來件。

在那個星期六晚上，當職工大會人士去會見鮑爾溫之前，政府正在對它所準備的“防禦措施”作最後的布置。鐵路的裝載量達到了容量最大限度，糧食、燃料和人員被運送到全國去。各個崗位上都已布署了人員，而這個設在白廳里的總樞紐是由維·密契爾—湯姆生爵士、從男爵、大英帝國武士、議會議員、警察總監、來指揮的。衛生部已經把各專員及其僚屬和他們地址的名單通知了各城、鄉、大都市、邑和區的市政委員會的職員們。在密契爾—湯姆生統轄之下，計有少校菲利浦·沙遜爵士、溫特敦伯爵、克拉蘭敦伯爵、斯丹霍普伯爵、金斯萊·伍德爵士和杰·特·斯·慕爾—勃拉巴松中校（現為勳爵）。英格蘭和威爾士被劃分為十個區域，每個區域由一名密契爾—湯姆生的人員管轄。蘇格蘭有其自己的組織，由蘇格蘭最高司法官指揮。軍事行動已經準備就緒。

五月一日下午八時，首相邀請職工大會前往唐寧街。

領袖們結隊而入，對立的兩方面仔細地互相估量着。一方面是有準備、有布置和性急的；另一方面是畏怯的、冷淡的，但是却願意在虎穴中進行一次恫嚇。還有一幅景象是：代表們從三天的會議中回到英國的各個角落里，緊握着計劃，準備去領導一支巨大的工人階級的隊伍走向礦工這一邊。而作戰的最高指揮——却笨拙地在和敵人周旋。

整整的一個夜晚直到五月二日星期日的早上，後來又拖到五月三日星期一的破曉之前，最高委員會在搬弄着一套又一套的逃避辦法。最後鮑爾溫却在他們卑賤的面孔前關上了這道門。

當職工大會代表進入唐寧街的內室時，他們一行九人，而鮑爾溫方面約有六人。鮑爾溫認為人數太多在各方面都不宜於談判的進展，他建議每方組成一個較小的三人談判委員會，外加職員一名。鮑爾溫建議每方再向他們的較大的“內閣”請示。職工大會方面由湯瑪士、西特林和激夫三人組成。這一組坐了一夜和他們的良心作鬥爭。鮑爾溫要求對賽繆爾的報告全盤接受。他提出了下列的談判基礎：“首相和職工大會代表交談後確信如果談判繼續進行（雙方并諒解，各通告停止有效），職工大會的代表有信心在半個月內可以依據報告的精神達成協議”。（着重點是作者加的）次晨——五月二日星期日——柯克被召至愛克勒斯頓廣場（職工大會總部）與次一級委員會會晤，並得到通知三人“核心內閣”已在前一晚與鮑爾溫會晤，並且未曾通知就接受了一個令人難以相信的公式：

“我們將敦促礦工授權我們進入談判，並且在這樣的諒解之下，即他們和我們都接受報告（即賽繆爾委員會的報告）作為解決問題的基礎，而我們在開始談判時也理解到這

可能涉及工資的減少”。

柯克猛烈地抗議這一“基礎”，并告訴湯瑪士和談判委員會的其他人士——“你們沒有權利在我的同僚們缺席的情況下前往會談。你們沒有權利把我們牽連進去，因為你們知道我們對報告的答复，在你們手邊就有”。

委員會要求他把執行委員會召集至倫敦，而柯克也同意了。柯克回憶起在他離開會議之前約翰·勃羅姆萊（機車司機和加煤工人協會）和杰·赫·湯瑪士（全國鐵路工人工會）向他所作的聲明。“兩個人都認為他們不得不同意削減工資，而礦工們也同樣應當如此”。[⊖] 星期日晚上差不多全部的礦工執行委員都回到了倫敦，當柯克述及了他們遠在各區時所發生的情況，他們極為憤怒。他們同意柯克的立場，并立刻與最高委員會聯繫。但是令人驚訝的事尚不止此。當柯克以電話通知愛克勒斯頓廣場他的執行委員會已經抵達時，他得到通知，整個的最高委員會正在唐寧街，包括詹姆士·藍姆賽·麥克唐納大師本人。三人委員會也與首相進行了會談。

和首相的談判主要是根據這樣的一個公式，即礦工應當同意在報告所提出的條件下進行談判，并承認這將涉及工資的削減。礦工的領袖在星期日下午十一時被召至唐寧街，在抵達時，整個最高委員會和談判委員會都在一起。職工大會的主席阿瑟·漢夫立刻開始提出問題。他們都指向一個方向……礦工們對於在報告的基礎上，重開談判的態度如何？赫伯特·斯密司、礦工聯合會的主席——這一個壯健的約克郡人，當他在唐寧街時總喜歡戴上一頂凱爾·

⊖ 阿·杰·柯克：“九天”，第一一頁。

哈迪式的布便帽——直率地告訴他們，礦工們不準備在減少工資或作任何其他犧牲的條件下去恢復工作。其時，鮑爾溫正在等候着答復。時間一分分地過去了。其時事態又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在佛利德街背后的卡曼利德街上，第一版的“每日郵報”即將付印了。它刊載了一篇社論——“為了英王和祖國”——這篇社論把總罷工的威脅與一次對外的戰爭相比，並號召“一切守法的男女們”作好準備幫助“國家”反對紅色叛亂者的進攻。“每日郵報”的社論說這次罷工是“一次旨在使社會上廣大的無辜羣眾遭受苦難的革命運動”……必須要把一切的資源交給社會支配以便對付它。

一切都已就緒，只等報紙的印出。報紙的大樣卻漏到了機器房中，印刷工人和機器房的工人都圍集在粗糙的大樣左右讀到了這些枯燥的字眼。全國印刷工人協會的人員召集了一次印刷房會議，經過簡短的討論後，他們通知“每日郵報”管理當局，他們不同意參予印刷這樣的材料。如果要希望發出報紙的話，這篇挑釁的社論必須要抽出。這是一個令人驚異的自發行動。在“每日郵報”的其他部門中，印刷工人和機器工人也得到了鑄造工人和裝包工人的支持。艾倫·胡特寫道^①：“在整個的總罷工中也許沒有任何其他的單獨行動，在這整個工人階級的運動中曾激起這樣普遍的歡欣”。

在唐寧街職工大會和礦工們仍然在爭辯：鮑爾溫吸着他的煙斗耐心地等待着時間一分分地過去。那時“每日郵報”印刷工人行動的後果也波及了緊張的談判。當他們還

^① 艾倫·胡特：“戰後英國工人階級史”，第一三三——一三四頁。

在和礦工們爭辯時，最高委員會收到了一份文件——該一文件現在已是總罷工史料的組成部份之一。該文件如下：“英王陛下的政府認為在解決煤礦的困難中，除了真誠地接受委員會的報告，是不可能獲得對各有關方面既實際可行而又榮譽的辦法的。上述的‘接受報告’這一點，包括即將付諸實施的工業改組，以及在那種改組獲得成績之前，臨時地調整工資和工作時間，俾能使這一工業在經濟上有可能繼續維持。

“目前，如果礦工或者是代表他們的職工大會坦白地表示他們願意接受這一建議，政府就準備恢復談判並繼續津貼半个月，但是自礦工們和工會委員會的人員進行討論以來，據政府知悉，不僅在職工大會最高委員會所召集由各工會執行委員出席的會議上曾發出特別的指示，指令他們在國家某些極重要的工業和公用事業部門中的會員，在下星期二進行總罷工，而且已經採取了公然的行動，包括對出版自由的惡毒的干預。這種行動是對憲法權利和國家的自由的挑戰。

“因此，英王陛下的政府，在繼續進行談判前，必須要求工會委員會拋棄上述已經發生的行動，並立即無條件地撤回總罷工的指示”。

這些調停者和恫嚇者都被陷於極度的混亂和失望之中。鮑爾溫在他們的面前砰然關門。

這一文件直接的效果就是使得某些最高委員會的成員願意奔向鮑爾溫，並否定“每日郵報”印刷工人的行動。最高委員會指示談判委員會再度覲見首相並解釋這一問題，聲明印刷工人的行動和他們無關。但是這已經太晚了。他們被很有禮貌地通知，鮑爾溫先生已經上床睡覺，十號的燈

光也已昏昏欲滅。當這些神情沮喪的職工大會領袖們踏出首相的官邸時早已過了午夜：湯瑪士轉向阿瑟·柯克辛酸地說——“柯克，我們現在必須為我們的生命而戰鬥”，他又向一個新聞記者評論道——“政府已經宣戰了”。湯瑪士很拙劣地隱藏了他的失望。結果是一小部份的“每日郵報”的印刷工人而不是鮑爾溫促成了他的恫嚇，這是非常特殊的巧合。如同他是一個“優良的工會活動家”一樣，湯瑪士，就為了那個理由也特別痛恨了這種行動。

五月三日星期一的上午三時三十分，最高委員會發出了對鮑爾溫午夜的措施的復信。以常情而論，對首相聲明的答復將是強硬而堅決的。然而恰恰相反，職工大會的短簡卻是謝罪式的。他們向鮑爾溫說，“最高委員會驚異而遺憾地收到了您的來信。

“工會代表們極為驚駭地獲悉，政府方面沒有任何的警告，只是為了您信中所述及的理由，突然中止了已恢復的會談，而這一會談又是為全面的，不受牽絆的談判鋪平道路”。

繼而最高委員會極其謹慎地解釋了他們在紀念大廳對工會執行委員會的指示是“沒有什麼不尋常的”。

“……作出該一決定的特殊理由是為了使礦工們能從僱主那里取得同等的權利，正如僱主們堅持從工人那里取得同等的權利一樣，換言之，談判應當在不受罷工和停業氣氛的影響之下進行。

“至於第二個理由”，最高委員會的復信繼續說，“關於已發生的公然的行動，包括對於出版自由的惡毒的干涉一點，很遺憾地在您的來信中並未述及具體情況。最高委員會尚未獲悉有類似事件的發生，而最高委員會的決定是肯定地禁止任何類似的獨立的和未經許可的行動。最高委員

会尚未觉察已有上述行动发生。它不能对此负责，并正在采取措施以防止任何不守纪律的行动发生。

“最高委员会没有机会对所述事件进行调查和处理，而政府已以此为借口，使正在进行的谈判破裂，委员会对此表示遗憾。公众将从政府在这一事件中所采取的危险的和惹起灾祸的决定来判断政府的意图，我们惋惜最高委员会所参加的，为了求得光荣的协议的工作，已被政府史无前例的最后通牒所破坏”。

最高委员会的两面手法是整个纠纷中最令人惊异的特色。一方面，它的领袖们以激盪的声调述及现在即将到来全国的巨大斗争：引用着某些最伟大的社会主义先驱者的言论，汤玛士与贝文之流敦促工会运动要在矿工这一边进行战斗。另一方面，他们一旦离开了工人阶级会议的强有力的气氛，就匍伏在鲍尔温之前：用谦卑而温和的詞令绝望地寻求妥协——如汤玛士后来所承认，任何的妥协——只要是使他们能不去领导一次群众性的工人斗争。

在工人中间已经产生了一种感觉，他们的领袖太不像样了。这种感觉并没有被负责人士所忽视，五月三日星期一的早上“每日先驱报”发表了一篇重要的社论，题目为“信任你们的领袖”。“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先驱报规劝道。“为了胜利这是不可缺少的。不要听信任何毁谤领导的人和那些甚至是‘暗示怀疑或吐露不满’的人——不论他们是公开的敌人或是伪装的朋友。最高委员会已经警告过我们要提防奸细，提防那些煽动暴乱和对人身或财产进行攻击的恶徒。

“要立刻对付这样的坏人——不管他们是受资本家津贴的或者由于其他的动机而企图滋生是非。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現在我們要拋開一切的懷疑以及恐懼。這點在領袖們之間已經做到了。一切的宿仇和私人的怨隙都被忘却了。讓羣眾之間也是如此吧。如果我們的努力应当獲得勝利，那必定如此。任何企圖散布不信任的種籽的人是工人最惡毒的敵人，比任何資本家還惡毒。因為資本家可以被辨識并與之鬥爭的。這些敵人是偽裝起來的。如果他們設法使他們的陰謀發生作用，我們也要來對付他們”。

對領導的不信任是普遍的。最高委員會的領袖詭譎而狡詐地通過代言人提出了他們的勸告：但是追溯起來，他們的用心是顯而易見的。那些詞句如“任何企圖散布不信任的種籽的人是工人最惡毒的敵人，比任何資本家還惡毒”是很能說明領導的態度的。他們害怕“暴民”更甚於害怕國家機器。這裡的人希望保持對“局面”的控制，而不希望把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領導起來。他們和鮑爾溫一樣，害怕在一次總罷工中將發展出“某些更大的事件”。儘管如此，最高委員會却必須不落後於它的會員的要求。當整個的肢體要求行動時——首腦就被迫以某種方式來予以滿足。星期日的深夜，當鮑爾溫正準備破壞談判時，最高委員會也在準備一篇後來印發的宣言。他們獲悉甚至是當談判還在唐寧街十號中進行時，內務大臣已經指示警務總署辦公室向全國發出指令“必須準備應付星期一晚上在許多工業部門和公用事業中將要發生的總罷工”。它宣布政府正採取一切辦法維持各種供應，志願人員招募站將在星期一早晨開始工作，所有的“忠誠的公民”應當準備去幫助政府。

最高委員會的宣言述及了他們即礦工和首相之間歷時已久的談判已經失敗。該宣言說，最高委員會是“被迫組織聯合的抵抗，反對用犧牲礦工工資的辦法來強行解決煤礦

中的問題”。他們又說，工會否認它要对“現已迫近的灾难負責。这些行动并不是指向公众的。在一次总的停工以后所引起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其責任是全部在于礦主和政府”。宣言再度地指出礦主們直到發動攻击前的几小时，当数以千計的礦工已被关在礦外时，才提出建議。宣言說，在整个的危机中职工大会曾屢次向政府呼吁，爭取更多的時間來商討一个可能解決問題的基礎。“甚至在現在，当運輸和生產性企業的总停工已經在望时，工会代表們相信还可以达成一个無損榮譽的协定”。其后就是最重要的一段：“但是在他們看來，絕對重要的問題是，政府要求礦工領袖在談判之前要先同意减少工資，这一点必須收回，而(停業)通告也必須收回以便使談判能在沒有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進行……”

这点和湯瑪士以及勃罗姆萊向柯克所說是完全不同的。这是否意味着最高委員會对于礦工接受减少工資這一問題的态度已有所改变？或者是为了使宣言的对象——即羣众們——易于接受，所以最高委員會才急切地表示了坚决反对向礦工生活水平的任何進攻？从鮑尔溫、產業委員會和礦工之間过去的一切情况來观察，就不能不認為后者是更近于事实的。

当工人运动的產業的一翼小心地掌着舵駛过風暴时，它的政治的一翼正准备着罢工前夕下院的重要辯論。藍姆賽·麥克唐納和阿瑟·漢德森已被选入最高委員會以应付緊急情况并准备把這一問題在下院提出。这是工党領袖重新起來領導國家的一个最好的机会——在每件措施上去揭露鮑尔溫政府——揭露邱吉尔的花言巧語，并尽他們之所能地介紹出这个一直在策划着要以軍事机器來粉碎組織起來

的工人的人。如果不是为了这种揭露，那么下院的用处又是什么呢？如果计划进行战斗的话——如果真正希望这次战斗成为一次工人阶级威力的显示——五月三日星期一下午和晚上的辩论就会成为一次号召。而事实上，从劳工的观点来说，它却是一个趣剧：对鲍尔温来说，这是一次毫无疑问的胜利。

首相作了极长的发言。他不仅叙述了纠纷的历史，并且也述及了煤矿危机的背景。^①他述及了每周七十五万镑的津贴使许多没有津贴就不能开工的矿井得以开工。在这方面首相辩称目前所维持的矿工工资水平是“基于占领鲁尔区时的非常情况，^②并且在经济观点上这是不正确的”。鲍尔温宣布，“我们不能够再牺牲一般的纳税人而继续把工资付给矿工，把利润付给矿主，因为毕竟在一般的纳税人中，有绝大多数人他们的工作时间更长，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的收入还没有这样多”。对于这一点，在工党的席次中发出了“不”的喊叫声。

当首相自己描绘出他和职工大会的谈判，并述及“每日邮报”的事件时，他的语气变得更为激怒。他控诉职工大会的行动，没有在会员中进行投票，因而是违宪的。他对他们的罢工号召的描写是：“这种专制权力……被放入伦敦的一个小小的执行委员会手中……这种不负责任的权力是对任何民主原则的一种恶毒的歪曲”。他叫嚣着说这威胁了“有

① “下议院辩论报告”，英国国会议事录，一九二六年五月三日星期一。

② 一九二三年一月法国和比利时军队以德国未及时偿付赔款为借口占领鲁尔区，德国采取消极抵抗的办法，工人拒绝采煤，当时英国煤的出口市场得以扩大。——译者

秩序的政府”的基礎，並且是“比我們過去的幾世紀來任何時期都更近乎宣布內戰”。他凶惡地瞪着麥克唐納，並且引用了麥克唐納過去反對“同情罷工”的言論。麥克唐納却木然不動。首相在他的結論中又以他的莊嚴自誇的語氣說：“今天在英國已經很少有人能心情愉快……現在受到危害的不是工資；而是我們憲法上的自由”。當他坐下時，保守黨人都歡欣鼓舞。在主席轉向工黨席次時，杰·赫·湯瑪士起立發言。議會再度沉寂下來。每人都亟盼知道湯瑪士要說些什麼。

在該一星期的後幾天，湯瑪士在這同一個議會中曾經說：“在星期一晚上的最後時刻，我或許已經為了和平而匍伏；我會向財政大臣（邱吉爾）匍伏，因為我恨戰爭……”而現在他却是在回答鮑爾溫關於談判的指控。他說：“每人都知道五月一日危機一定要來到……”（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承認）。在回答鮑爾溫對礦工工資尖刻的評述時，湯瑪士說在南威爾士有四萬工人每周工作五日，每日所得還不足七先令。[⊖]“我們商議了十天”，湯瑪士說，“在這十天中我們向政府說‘你們迫使煤礦主們向我們提出一些條件，不拘是些什麼條件，或者它有多糟，讓我們能夠繼續談下去’。他們說‘不，這樣不行’。而一直等到星期五的一點十五分，才提出……”當時工人們已因封礦而停止工作。湯瑪士呼喊道這不是革命。他說如果在英國的人民中進行投票，不會有百分之二以上的人擁護革命。他以同情的態度述及了鮑爾溫“困難的處境”，並且把兩臂伸出國會中的橫木，低聲地說“無論在最近的將來發生些什麼情況，不要讓我們之間存在

⊖ “下議院辯論報告”，英國國會議事錄，一九二六年五月三日星期一。

着仇恨”。这个重要的工会领袖：他和麦克唐納、斯諾登同为工党三巨头之一：在同一天早晨要求“先驅报”刊载一篇要工人们信任他们领袖的人就是他：他就是这样说的。而对方无法抑制地发出了微弱的笑声——而且是嘲讽的笑声。

藍姆賽·麥克唐納所說的内容也和湯瑪士相似。他否認這是一次革命事件。他述及了礦工的工資并引用了某些數字(与其說是去影响对方毋寧說是在影响議會后座人士),在六个礦井中的每周工資是：一鎊八先令九辨士,二鎊零九辨士,二鎊十一先令二辨士,二鎊一先令三辨士,一鎊五先令五辨士和一鎊五先令五辨士。

勞合·喬治說,“我們正面臨着在這個國家中從未發生過的一些事情”。勞合·喬治很老实地承認煤礦工業中的問題要追溯到戰前(第一次世界大戰)而沒有任何單純屬於戰后性質的問題。“在整個工業中就有着某些固有的錯誤”,他的發言比湯瑪士或麥克唐納都要誠懇些。羅伯特·霍恩爵士,這一個和煤礦利益有關的保守黨有力人士怒目地向職工大會挑戰——他們把這個國家中的一切合宜的東西都連根拔除——這羣無法無天的黨徒。

溫斯頓也發了言。財務大臣說每年的津貼使國家虧損二千四百万英鎊,這是他肩上的一个無法負起的重担。它已經“接連兩年破坏和动搖了財政……”关于這一工業的國有化,他战慄了一下說:“要找到一億英鎊或者更多的錢从礦主那里買下使用礦山的專利權这种办法要影响到我們的負債,深深地危害到我們的整個在轉變中的情況”。他同情礦主,因為他們每年虧蝕六十万英鎊,但是如果撤消停業通告,他害怕政府就不得不繼續支付津貼。

阿尔佛列特·蒙特爵士(后为梅尔乞特勳爵),即在几年后提出合股經營工業計劃的人,他說停業通告并不是真正的停業通告——这僅僅是“通知在某一特定的日期停止工作并自該日起,將在某一特定的工資額之下繼續工作……”(当然是在更低的工資額之下)。由于工党領袖缺乏勇气,要使辯論回到现实問題还得依靠工党議席的后座人士。

礦工的國會議員們極為憎恨和憤怒。奇·霍尔先生以強烈的仇恨說:“养活一个囚犯的費用和某些礦工們整整工作一个星期所得差不多”。他說,南威尔士在雇主們提出的新工資率下,將是受害最大的。在南威尔士,每天生活所需約达八先令又四分之三辨士。在新的工資率下一个有家室的人每天所得为五先令再加百分之五,以及生活補助費一先令又五辨士,这样他的工資每天只有六先令八辨士,而根据一九一四年的合同則为八先令又四分之三辨士。

霍尔先生說,一个計件工人每周的損失將达二十二先令之多,或每班減少三先令七辨士。在蘇格蘭这意味着每班減少兩先令,在諾森勃蘭則为二先令四辨士,在杜尔漠則为二先令十辨士。从全國來說,这意味着全國工資的減少約为百分之十三又四分之一。

熟知財政情况的霍尔向邱吉尔反击,并說國家預算中每年为了償付國民公債的利息,要付出三億零五百万英鎊,为了公債还本要付出五千万英鎊。而一九二五年全部礦工的工資所得僅为一億四千二百万英鎊。他說:“这实际上意味着那些从債務中提取利息的人和从公債还本中收回达五千万英鎊之多的人,他們所得兩倍半于礦工所得……一个能够以这样巨額的款項付給公債持有人和償付債務的國家不应当期望它的礦工在目前可憐的工資之下進行工作”。

馬蒂·瓊斯先生，這位來自南威爾士的礦工國會議員，更是狠狠地攻擊。“不論是在這一個國家里，在工業的美洲或是在工業的歐洲，不論是在戰前或是戰後，從來也沒有這樣的先例，即工人們同意在一次大大增加勞動時間的情況下再降低他們的生活水平……在這個國家中向礦工們的攻擊只不過是向有組織的工人進行總攻擊的一部份”。

另一位礦工的國會議員，喬治·巴克先生說在這個國家里沒有任何一伙人曾經像礦工們一樣，自從一九二一年開始，在五年來作了那樣多的犧牲。“在一九二一年”，他說，“他們被迫同意一周減少三十先令，在這短短的五年期間，他們已經忍受了數達三億七千五百萬英鎊的損失。他們已不能忍受任何進一步的削減了”，巴克先生怒吼着說。“礦主們作了什麼犧牲呢？礦山專利權的所有者作了什麼犧牲呢？在十二年期間礦主們的利潤達到了二億三千二百萬英鎊……”

他說煤礦中的問題是生產的煤超出了所能銷售的數量約二至三千萬噸。“這不僅是在這個國家中的情況”，他又說“也是每一個歐洲國家中的情況”。要解決這問題，巴克說桑基報告的建議應當加以補充——六小時工作日，老年人退休并取得養老金，並對這一工業進行計劃。

但是時間已經太晚了。整個的英國工人階級已經整頓好隊伍。各業理事會已建立起應付緊急情況的組織，並組成了各地的行動委員會。所有的軍隊休假都已停止，英王已經在樞密院中簽署了一項命令應用緊急權力法。對付罷工的組織也已經建立起來，“供應維持組織”也把整套的機構交付給政府——法西斯份子一應在內。

行動的時刻已經來到了。

第五章

九 天

“这是一个奇特的功業，这是一个奇特的成就，它断然地証明了工人运动中有这样的男女，他們在危急时，有能力管理國家。誰能忘却摩托車輛上貼着‘經职工大会許可’的紙条的印象？政府和它的‘供应維持組織’完全涣散了。尽管那些志願人員，工賊和特別警察制造事端，但到处都呈現着信心，沉靜和秩序。工人們像一个人一样地行动着。了不起的紀律！了不起的忠誠！”

——阿·杰·柯克著“九天”。

在一章的篇幅內，要詳細地叙述在这九天的罢工中在廣闊的战綫上的全部事蹟，是不可能的。

罢工普及到每一个都市，市鎮、村庄和小村落：有时候僅僅是受到罢工的影响，但更多的却是發生了直接的罢工。我們今天有些人还怀疑不列顛性格在一旦被激起时的战斗性，对于这些人來說，这九天就是一个啓發。同样的，我們之間有些人認為英國的司法和“法治”具有資產階級民主制的一切优点，这一段罢工时期也是一道驅除幻覺的灵符。

當日的英國政府以一個警察國家所有的殘酷，和法西斯主義所有的罪惡的狠毒，應用了緊急權力法，便能用恐怖戰略來威嚇工人。男男女女輕易地就遭到拘捕，經過一次虛偽簡單的審訊後就被判處監禁。它不斷地用恐嚇的辦法迫使工人屈服：整個國家機器已被完善地組織起來，無情地和有效地用來針對一個明確的目標。雙方的情況是很不相同的。邱吉爾以他清晰的感覺和軍事頭腦，掌握時機，確切地知道如何使用他所統率的力量。而職工大會的最高委員會却在懸崖邊上發抖，雖然也應該承認他們也曾作了勇敢的努力——特別是恩斯脫·貝文——來建立一個臨時性的機構，但顯然他們不能和有周密計劃的政府實力相匹敵。正如格·德·赫·柯爾教授所說^①：“在有關的工業部門中罷工號召得到普遍的響應……（但是）顯然，最高委員會的產業委員會為進行罷工而作的準備是十分不夠的：組織工作的重擔主要是落在地方上的各業理事會或者是臨時性的地方行動委員會身上，它們中的絕大部份都表現了出色的能力，能夠迅速作出決定並付諸實行。”

這些各業理事會——差不多有一百個以上——在許多地方，都成為那一區的總指揮部。在那些原來只有骨幹組織的地方，它們這時發展成為強大的單位，而在其他的原來完全沒有各業理事會的地方，它們也在戰鬥的時刻中誕生。當最高委員會發出它的罷工號召時，各業理事會的任務主要是主持該地區所屬各工會的每月代表會議。差不多在所有的地區都沒有專職幹部，很少的理事會有他們自己的房屋。“除了極少的例外，理事會所發揮的力量和主動性

^① “一九一四年後的英國工黨史”。

确实使那些以前就知道这一组织的人大吃一惊。那些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的理事会，那些被认为是垂死的理事会，以及那些在正常地活动着的理事会——都好像得到了新的灵感，发展了新的组织形式和活动形式，吸收了新的助手，并且第一次在他们的历史上……成为地方运动的真正表现。”^①

正规的新聞报纸都停刊了。但是，在邱吉尔的编辑之下，政府接收了古老的“晨报”的办公室，雇用工贼出版了“英国公报”。职工大会批准发行他们自己的出版物“英国工人报”；但是除了这两份报纸以外，所有全国性的大报纸都默默无声。某些报纸如“泰晤士报”和“每日快报”则设法出版小张报纸，但不能保持经常，并且当然也只限于在大城市中发行。在当时英国的一千八百七十家报纸中，只有四十份继续出版。“每日邮报”则设法运入他们在巴黎印刷的大陆版以冲破这一防线。

报刊的被迫停顿，对中等阶层和自由职业者的影响，也许要比任何一个其他的因素更大，他们认为“革命已迫在眉睫”。事实上，某些工会领袖也曾争论过，他们说，单单为了要使全国人民相信这不是一次革命或企图推翻宪法的行动，因此不应当号召印刷业罢工。但是社会主义者对于报馆们的怀疑一向是很深的，而且应该如此。金斯莱·马丁在他的“英国公众与总罢工(1926年)”一书中写道：“今天的出版自由意味着俾微尔布魯克勳爵、罗斯弥耳勳爵和其他少数人的专制权利，他们可以选择新聞并把他们的意见强加于被他们欺骗的購買他們新聞和接受他們意見的人身上……”

^① 爱弥尔·明斯：“一九二六年五月的总罢工：各業理事会在行动中”。

在这样的情况下，工党的追随者认为要谈‘出版自由’，未免有点可笑……”但是在报刊停顿之前，最后的攻击是极为毒辣的：这比任何其他的事例都更能清楚地说明，在过去几天中，阶级战争已经明朗化了。例如，“每日电讯报”就在它的标题上叫嚣着“战争”。它说，一次总罢工在本质上就是“内战”，因为它把国家分成了忠诚的人与不忠诚的人两部份。它又说，职工大会的罢工号召有着一切“外来根源的真正气息”。甚至“泰晤士报”也在罢工前夕使用了类似的词句。

政府当然已经征用了英国广播公司，像利用“英国公报”一样地利用它来散布反对工会的论调。敌对双方都进行了数以千计的地方性的或全国性的油印品。

五月四日星期二的早晨，全国已经完全停顿下来。全国工业的心脏几乎已经停止了跳动。巨大的机器寂静无声：五月的微风拂过工厂时，使人感到好像是在星期天早晨。电车停驶了，公共汽车排列在车房中。煤气和电力发出微弱而愁闷的火光。但是全国并不是在静止状态中。警察和罢工者冲突着，制止工贼的纠察队受到了法西斯分子的攻击——在全国工业走向停滞时，阶级战争却活跃起来。不再有什么谈判。双方都已退回自己的堡垒并忙于准备战斗。没有晚报，因为它们首先是停刊的。铁路上没有客车，在全国各地只有很少的公共汽车和电车，在伦敦的街道上甚至连出租汽车也是很少和稀疏的。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已经作了巨大的响应，他们实在使他们的领袖惊异。甚至于无组织的工人在许多情况下也响应并加入了罢工者。少数的工会落在后面，主要是由于组织上的原因，但是总的来说，来自英国各地的报告说出了我国工人阶级史上最富于历史性的时刻所发生的事蹟。实际上所发生的就是几百万

工人自發的創造性和影響力量，這種力量即使不是完全地、至少也是部份地補救了上層領導缺乏準備這一弱點。因為無疑勞工運動中的許多右翼領袖當時還抱着“又是罷工”的態度。可是還有什麼比工黨議會黨團的領袖在鬥爭開始那天早上所發出的言論更令人驚異和沮喪呢？“就我們所能看到，我們將繼續下去，我不喜歡總罷工。我也沒有改變我的意見。我曾經在下院這樣說過。我不喜歡它。老實說，我不喜歡它。但是又有什麼辦法呢？”這就是五月四日早晨“每日先驅報”所引用的傷感的詹姆士·藍姆賽·麥克唐納所說的話。這就是在这次偉大戰鬥開始時所決定的方針：

在全國的許多地方，工人們所需要的推動力和領導有待於共產黨來提供。黨的中央委員會發出了動人的罷工前夕的號召：

“不減少一文錢的工資，不增加一分鐘的工時。

每城一個行動委員會。

和士兵們做朋友。

人人都來支持礦工。”

的確，共產黨人在九個月來曾向工人提出警告，這一個對礦工然後是對整個工人階級的進攻即將到來。正因為如此，共產黨的領導人現在才遭受着牢獄的磨難，威廉·加拉赫在他的“雷聲隆隆”一書中記述着：“在各地，最輕微的借口就足以把罷工者拘捕和投入獄中。他們被源源不絕地投入溫茨華斯監獄。每天在‘體操’時可以看到新的面孔和聽見新的聲音在體操場叫喚着‘老華爾’。在溫茨華斯監獄的一段時間中，華爾·漢寧頓是最受歡迎的人……”加拉赫又談到了人們探視共產黨領袖和他如何獲悉“外界”的情況。當工人們如何起來響應的消息漏進了這人數眾多的監獄的

牆內，他們的精神振奋了，一股歡欣的情緒瀰漫在監獄之中，使監獄當局大為驚惶失措。

在罷工的第一天，又有兩名共產黨領袖被捕。斯·沙克拉特瓦拉，北貝特西的共產黨議會議員，他由於在海德公園作五一節的演講而被捕，並被處徒刑兩個月（“演講者的角落”並不見得是“英國民主的范例”）。曼徹斯特的共產黨領導人斯多克也被拘捕，並被處徒刑兩個月。在那一星期的後幾天，倫敦區共產黨的組織工作者，勒·維·羅布遜又被處勞役六個月。伊薩貝爾·布朗也在龐蒂法拉克脫因進行“煽動性的演說”被捕，處徒刑三個月。

在總罷工的第二晚，兩名蘇格蘭警場的偵探和一隊特別警察襲擊了柯文公園的共產黨總部。他們帶了鐵桿，棍子和其他的家伙打開了門戶。他們沖入了書店，把書籍弄得狼籍不堪。他們從上到下搜索和劫掠了辦公室。他們帶來了一份特許狀，要沒收任何出版罷工報紙或油印刊物的器材（共產黨的“工人公告”是一份流通於倫敦的油印日刊，政府對它比對“英國工人報”更為焦慮）。

但是警察在共產黨總部所找到的只是一部陳舊不堪和多年未曾使用過的羅尼渥牌的復印機。既沒有拘捕任何人，也沒有簽發任何拘票。警察們愠怒地離開了。

其時在愛克勒斯頓廣場的職工大會中建立了一個應付形勢的總參謀部。但是這些計劃是在戰鬥開始兩天以後方才擬就，這一事實也足以說明上層中所存在的組織上的混亂。罷工組織委員會經過了兩天才認識到這一巨大的任務需要有某些次一級委員會來處理枝節問題。所以最高委員會建立了五個委員會，分別處理：（甲）交通運輸，（乙）情報，（丙）糧食供應，（丁）管理指導，（戊）財務。罷工組織委員會

在它的富有活力的主席恩斯脫·貝文領導之下努力進行工作。他們的任務極為巨大：甚至在一切罷工准备工作都已完竣后，他們的困難仍然是很大的。應當記住，在最初的階段中就已經有必要全部地或部份地把八十三个各別的工會在罷工方面的行動和政策聯合起來。行業偏見很深的工會都被要求和總的產業工會共患難。私人之間的對立——這種情況在工會中並不在少數——被暫時擱置在一邊或是裝成這樣。“舊的行業間的意氣和成見，地方主義的整個傳統，對自己工會的忠誠和對自己領導和執行委員會命令的忠誠高於一切的傳統，阻隔了總的團結路線。在有些情況下，工會的罷工委員會與各業理事會發生了重疊。在印刷業中特別麻煩，有幾次，要經過許多的勸解和冗長的談判才能使他們承擔印刷最高委員會機關報的地方版的工作。……”^①

所以，當我們衡量罷工的勝利時，在最初的幾天中，已經可以看出，將近三百萬的工人進行了罷工，對於一個第二流的領導來說，這是聲勢浩大的響應。

前面談到的礦工聯合會和職工大會的最高委員會之間意見的分歧，從一開始就會對罷工領導的士氣起了嚴重的影響。在防禦布置好以后，情況更為惡化。從鬥爭開始的第一天起，礦工們在最高委員會中就沒有代表——而最高委員會在整整九天中不斷地進行了會議。經過情形是這樣的：礦工代表之一湯姆·李查德因病重不能出席；另一人，鮑勃·司密利，國會議員，在星期一的晚上已到蘇格蘭去了，他認為到蘇格蘭礦工中去是極其必要的，並希望他在

^①胡特：“戰后英國工人階級史”第一四二頁。

职工大会中的同僚將“以直接了当的光明正大的方式”^①繼續斗争。

赫伯特·斯密司和阿瑟·柯克以及礦工联合会的會計被允准出席最高委员会，但只是以观察員的身份参加，这意味着他們無权参与辯論和表决。柯克向委员会請求允准联合会的兩名替代的代表暫時被选入，但是这个請求遭到了拒絕，特別是杰·赫·湯瑪士頑固地加以反对，他以最高委员会的憲章和这將开創先例为理由來爭辯。

这簡直是令人难以相信，在整个的罢工期間，礦工們——全部糾紛的根源——在最高委员会中竟沒有代表。也許有人認為，这并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礦主或政府提出解决的建議时，最高委员会是要和礦工們充分地商議的。但是正如事实所証明，这种論点是沒有根据的。在前面的分析中已經指出，在真正的談判中，在作真正的决定时是并不和礦工們商量的。这些都是关起門來進行的，絕大部份是秘密的，其中有不少的陰謀和欺騙。关于这九天中最高委员会的筹划，柯克寫道：“这不僅是对工人們的一次教育，如果能印出全部情况的書面报告，这也是能在我們將來的斗争中指導我們方向的材料。很不幸的是，他們决定不作任何速記記錄。所以恐怕全部真相將永不会暴露出來了……”

“英國工人报”的第一期——五月五日星期三晚上發行——上刊载了來自最高委员会的一則消息，它小心地強調指出“这是一次劳資糾紛”。这就是对叫囂着憲法和政府受到威脅的“英國公报”的答复。“英國工人报”繼續寫道：最高委员会“希望每一个参加的會員在他們的行动中应当

① 柯·杰·柯克：“九天”。

是堪为范例的，并且不要给予警察干涉的机会。任何紛擾的發生对于勝利地結束糾紛的远景是有害的——委員會要求糾察隊特別避免糾紛，并嚴格執行他們合法的任務”。在整个時期中，職工大會的報紙一直是採取守勢：它总是以謹慎的措辭抵禦“英國公報”每次的攻擊。但是它自己從來沒有進攻過。它揭露過工人們被警察毆打的情況，但從沒有利用這樣的事例來控告政府。

這份報紙的誕生是非常令人激動的。星期三晚上八時，一切都已準備就緒，許多的問題都已解決，報紙的最后一行也已編好。最后的鉛版已經鑄好并裝在滾筒機上。機器房正在等待着最后的號令。這時，從卡曼利德街對面筑成一半的“每日郵報”新建築物內出現了一排警察，有的徒步，有的騎馬。他們把工人們從機器房中推出去，并看押在警戒綫內。一個偵探上前宣布不許開動機器。他向工長解釋說，內政部發給他指令要搜查并沒收全部五月四日的“每日先驅報”，和出版該報的全部器材或者是可能用以出版任何文件的器材，只要這種文件的目的是在於阻礙重要共事業的維持。然而，警察們顯然對五月五日的“英國工人報”要比五月四日的“每日先驅報”更感興趣。檢查者要求先印出十二份送交市政專員批准。經批准后，報紙才可以發行——如果不准，他只聳了聳肩頭……

他拿了十二份報紙去，留下警察們守衛機器。當時一部份工作人員就到愛克勒斯頓廣場去，片刻之後，華爾特·西特林，班·透納和波溫先生就代表最高委員會出馬。工黨議會黨團也立即收到通知，藍姆賽·麥克唐納和阿瑟·漢德森就與政府取得聯繫。禁令被撤消了。當警察們離開，巨大的滾筒機開始轉動印出一份份的報紙時，工人們唱着“紅

旗歌”。“工人报”出版的第一天就印發了三十二万份。

“英國公报”的事蹟当然也是傳奇人物溫斯頓·邱吉尔的事蹟。編輯这份报纸曾使他富于幻想的心灵激动。在許多年以后，他描寫了在一家报纸的大办公室中当“机器撞击着并發出响声”时，他所感觉到的激动。他承認这使他感到像是一艘出色的战艦和一次出色的总选举的混合物——这無疑是心理分析家的一个有趣的綫索。这是邱吉尔第二次編輯报纸——在学校时他編过一份名为“批評家”的校刊。但是“英國公报”則不僅僅是一个批評家——它是政府方面的仲裁者。从一九二六年五月五日的第一張單頁到五月十三日的四頁，这一份政府破坏罢工的报纸的發行数由二十三万份增加到二百二十五万份。这一驚人的上升当然是邱吉尔和政府竭尽全力來阻碍“英國工人报”并同时推廣“英國公报”的又一反映。由于他放肆地使用这份报纸——他从来也不讓一条客觀的新聞進入它的篇幅，他毫無顧慮地把它只用以報導政府方面的情况——邱吉尔在各階層中也增加了不少敌人。自由党人虽然在表面上和鮑尔溫政策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幕后在某些問題上是分歧的。爱士葵斯派和劳合·乔治激進派之間嚴重的分歧也有反映。也許这就因为这才促使劳合·乔治在論及邱吉尔的主編时說：“在第三流新聞学的鮮艷外衣內包含着头等的輕率”。

下院在罢工的第一天只進行了很少几小时的會議，經一致同意，对爭执的問題不進行辯論。由于印刷所已經停頓，故僅有二十份議程表在議院的大廳中傳閱，而國會議員們似乎也乐于离开下院。但是在罢工的第二天，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旧日的兇悍又恢复了：情緒激动，怒气冲冲，彼此交換着刺耳的言詞。这种現象的意义虽不大，但这却是

好的景象。总檢察長陶格拉斯·何格爵士要求國會依据緊急權力法的一項條款授予新的範圍甚大的權力。他要求——并且后来也得到了——准許政府有权根据一个人的“查明屬实的面貌”……拘捕任何擾乱“法律和秩序”的人。换言之，如果这人的“面貌”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的面貌，那末根据这一事实，如果政府当局認为他在某种場合下的出現会威脅到法律和秩序的維持，他們就有权把他逮捕起來。

这当然是純粹的警察國家的恐怖策略。工党人士激烈地在这一点上進行爭辯。总檢察長否認这种明顯的事实，他說这不是政治性的立法，但又相当愚蠢地說，这当然意味着將用以对付在煤礦中阻碍工作進行的糾察隊——根据“他們的查明屬实的面貌”。关于这一点，南威尔士的礦工國會議員，馬蒂·瓊斯以他天生的开尔特人的热情反駁說：“我要告訴总檢察長和政府，我和这个議會中所有其他礦工議員將要尽最大努力來阻止任何一个礦工在任何一个礦中和工賊一起工作。这些条文对礦工們來說，不过是一些廢紙罢了。我向总檢察長担保，我們要記住他的話，在周末时要在全國重复地提出。正直而高貴的紳士們既然首先开始挑战，我們便应战，政府將要因此而感到遺憾的”。乔治·第·哈第，另外一名工党的后座人士，为热情所激动，怒視着政府席，不断望着保守党中第一流的縉紳，粗声地說：“我真願意把你們每一个人都裝在礦工的豎礦升降机中，沉下去兩個鐘头，由我來當你們的老板……这种用暴力來粉碎礦工的办法所化的錢比兩年的津貼所花費的还要多……礦工們每天是在冒着生命的危險……为了什么呢？在拉那克夏就是为了一星期三十六个先令”。

但是总檢察長終究达到了目的。下院又通过了另一个

法令，允准警察進入任何房屋和場所，只要是這些場所是用以印刷、制作、出版和散發任何旨在或可能在警察、軍隊、消防隊或（這是最關重要的一點）普通百姓中制造叛亂、煽起暴動和混亂的文件。除此以外，內務大臣威廉·喬遜—希克斯爵士還通過“英國公報”和英國廣播公司向全國呼吁招募特別警察隊。對於這點，最高委員會通過“英國工人報”所作的答复又是防禦性質的。他們懇求大家不要“被內務大臣挑釁性的言論弄得驚惶失措”。“他在星期三晚上所作的關於招募特別警察的廣播詞中所說的工會運動破壞法律和秩序的論斷是非常不公正的。僅僅在同一个下午，事實上，最高委員會……曾正式要求所有參與糾紛的會員，其行動應當是堪為范例的，並不給予警察任何機會造成事端”。這些就是它自始至終的聲調。這就是對內務大臣充滿了階級仇恨的廣播的平凡而陳腐的反駁。

最高委員會在更大的事情上也是用類似的語調。在星期三下午鮑爾溫在下議院說：“沒有一個政府在任何情況下會向一次總罷工投降。只要罷工一旦無條件地停止，政府就準備恢復談判”。一個戰鬥的領導對這種聲明是無須考慮的：對於如何回答和說些什麼也是沒有什麼可疑的。但是最高委員會柔順地反駁說：我們是“隨時準備為了光榮的解決而恢復談判。它（指最高委員會）在這個問題的任何方面都不提出和政府恢復初步談判的任何條件”。

和它的態度相反，共產黨人繼續鼓勵採取戰鬥性的措施。在“工人公告”這份不願警察干擾而繼續發行的油印品上，共產黨人指出了“總罷工的政治意義”。黨警告工人們要“反對把鬥爭局限於先前的那種抵抗資本家進攻的自衛性質範圍之內的企圖。一旦戰鬥已經開始，取得勝利的唯

一办法就是向前推進，狠狠地打”。[⊖] 共產黨指示它的黨員并敦促工人們，在還沒有行動委員會的地方要立刻組織起來：把所有的強壯的工會會員組織在一個工人自衛團中來對抗“供應維持組織”和法西斯分子：與合作社系統作出有關糧食的安排：舉行羣眾集會，并使士兵知道這些情況。要求無償地把礦山收歸國有，要求鮑爾溫政府辭職并建立工黨政府。

五月五日國內已可以見到緊張的罷工景象。在坎勃威爾，倫敦的市政委員會設法在六輛電車中配備上志願人員，在他們工作時并有警察守護駕駛員和車務管理員。但是一羣羣的工人走向他們，用石頭打碎了車窗并抓出了工賊駕駛員和車務管理員。護送的警察就無情地使用了他們的警棍，七名罷工者受到重傷——但是電車回到了車廠。

在格拉司哥、愛丁堡和李茲，一羣羣的工人也給那些在公共汽車上工作的工賊造成極大的困難，他們毀壞了內燃機和切斷油管。某些區——如漢彌爾登——已完全不能由公路或鐵路前往，曼斯菲耳德，犀菲耳德和巴恩斯萊等地企圖行駛公共汽車，也因工人們在路上用肉體進行封鎖而未能成功。在全國公路的干綫上工人們成羣結隊地阻止通衢大道上的運輸，未經許可不准通行。在礦山地區，沒有一輛非官方的私人車輛可以通行無阻。任何企圖冲破封鎖的人立刻就要遭到困難——有一兩個人的車輛被放火焚燒。

政府企圖使倫敦人相信鐵路運輸仍照常進行，便在當時自維多利亞到克蘭漢交叉站之間的南方鐵路上弄出一套假的“服務”。但是這種虛張聲勢很快就被拆穿了。這是一

⊖ “工人公告”——一九二六年五月五日。

次異乎尋常的工人階級團結的聯合陣綫。

这时对罢工的支援已从世界各地涌到。甚至远自日本，世界工会运动都送来了支援和祝贺的信息。德国鲁尔区工人們的領袖說，如果英國职工大会要求他們作出行动上的支援，他們將停止工作。从荷蘭、爱尔兰、美國和加拿大来了温暖的支援的信息并願意提供援助，俾能使这一事件得到勝利的結束。國際运输工会要求所有的工会不要把煤調往英國去或者是替任何通常是运煤到英國去的船只裝煤。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是第一个不僅送来了同情的激励的电报并且也送来了現款的單位。它指示要支援苏联港口內船只上的英國工人，并要求和英國進行貿易的苏联船只上的人員作積極的支援。苏联的职工大会还捐出了二百万盧布（当时約折合十萬英鎊）作为最高委員會的罢工基金，但这筆錢被拒絕了，因为职工大会的領袖們害怕担上这一污名——“莫斯科的黄金”。甚至在当时正处于英國最殘暴的統治之下的印度，工会活动家也送来了他們的支援。國際工人階級在英國工人需要的时候都來支援：國際團結的偉大傳統正在确立。

國內的战斗变得更为劇烈，更为凶殘。在坎寧城和波普拉，約有五万名工人糾察着通往碼头的道路，阻止未經許可的車輛运入（除了被职工大会所允准的重要食粮以外的）供应品。非武裝的工人不时受到揮舞着警棍的警察攻击，受伤者数百人。在利物浦，政府又派遣了增援的軍隊。战艦被用以裝卸供应品。在格拉斯哥，巷战的結果是六十六人被拘捕，許多人受伤，在愛丁堡二十二人被拘捕。發展的速度在加快着——到第三天（五月六日星期四），更多的工人投入罢工。总数將近四百万人。

麥克唐納與漢德森在星期三的晚上曾試圖與邱吉爾晤談，但是沒有成功。兩個人中是否有一人曾秘密地與他會見，這一問題迄未弄清。但是當工黨的兩位領袖正設法和政府破壞罷工機構的主要負責人會晤的消息傳出來，反應是極不愉快的。我們現在當然知道，某種私下的，以個人身份進行的會晤肯定地是舉行過的。後來罷工在最巩固的時刻却被停止，這種陰謀在其中起了多大的影響，讀者可以自己加以判斷。在當時，以及許多年以後，有關秘密會晤的報導一直是被竭力否認的。

到當時為止，有關罷工的法律問題尚未進行過辯論。誠然，政府曾宣布這種停工狀態是違反憲法並且是違反民族利益的。但直到約翰·西蒙爵士（現為子爵）於五月六日星期四在下院宣布罷工是“十分非法的”以後，這種新的歪曲論調才大肆猖獗。約翰爵士，這位顯赫的律師向下議院追述了一〇六六年征服者威廉所通過的一項法案，一切罷工者在法律上應受監禁處分。差不多與此同時，阿斯脫波萊法官先生批准了一項對付海員工會塔山支部的臨時訓令。但是把將近四百萬的工人加以囚禁，甚至對鮑爾溫與邱吉爾說來也是難於處理的，所以他們認為由自由黨——西蒙派——保守黨的律師約翰爵士搬弄一下法律固然不錯，他們自己却寧可循其他的途徑來解決這一問題。當這位勇敢的武士正在法律歷史的篇頁中搜尋着先例時，鮑爾溫却在製造着先例：在那天的“英國公報”上首相宣布“立憲政府正受到攻擊”（這點後來職工大會曾以最傷心的聲調完全加以否認）。次日即七日，星期五，政府又發出一個發動屠殺的宣言。它說：“英王隊伍中的一切官兵們，現在通知你們，凡一切你們認為是忠誠地援助民政機關所必須採取的行動，在

現在和以后都会得到英王陛下的政府的全力支持”。如果約翰·西蒙爵士以他所具有的搜尋法律先例的敏銳感來搜索这一条的先例，他或許会在查理一世对他的沮喪的騎士所發的誓令中發現这样的宣言。給予武裝部隊这样的自由行動權，在現代史上还是相当独特的。

內政大臣也以再度召募五万名特別警察并在星期一以前完成來支持这一宣言。“事态是緊急的”，他向全國廣播，“我們能愈早得到一支堅強的并且确实是龐大的隊伍，我們就能愈早為大家提供保護，特別是在整個倫敦地區”。召募的目的是破壞糾察工作：這就是內政大臣所提供的“保護”的含義，而他也承認了這點。然而來自整個英國的報告顯示出不願政府的威脅和警察行動，罷工在開展着，罷工機構也組織得更好。密得蘭的鼓風爐已停止工作；倫敦所有的電力站的工人都已罷工；倫敦罷工委員會撤回了供應下院電力的工人；紡織工業受到了嚴重打擊；格拉斯哥的新聞工作人員因拒絕當工賊而離開了工作。工頭、經理和校對員等人印出一份臨時的報紙，但是某些報紙分銷員拒絕接受，送報人拒絕分送報紙。在東北一帶和約克郡沿岸的機械業和造船業地區是“團結得像一個人”。各地區罷工組織的形式是各不相同的。在以某一項工業為主的較小的地區就由一個組織中的工會委員會處理停工後的一切；在其他的各工業部門并存的大的中心，就由一個周密組成的行動委員會通過當地各業理事會的機構把各工業部門聯合起來。它們有自己次一級的委員會和上層組織，仿照着最上層的模型。有時候，執行的權力甚至是在更大的機構中——例如，在諾森勃蘭和杜爾漢建立了一個总的罷工委員會以配合整個大工業地區的行動。它獲得了很大的成功，在紐開司爾，

“供应維持組織”完全瓦解了。这一运动在东北地区的成就可以和一种苏維埃形式的控制相比較，这种勝利是如此之大，以致金斯萊·伍特——他是該地区政府的行政負責人——向罢工委員會呼吁，請他們帮助分配重要供应品。金斯萊爵士提出撤回“供应維持組織”并建議建立共同管理的制度。但是委員會拒絕了，因为它已建立了自己的機構向普通老百姓供应必要的供应品。紐开司尔各業行动委員會所發行的“工人紀事报”是一份非常成功的油印的罢工報紙。东北地区的領導是第一流的——羣众的情緒是高漲的。这是一个像北極光那样閃爍着的例子——一个光芒盖过了爱克勒斯頓廣場死气沉沉的領導的例子。

在爱克勒斯頓廣場那里，总罢工和总停工这样的名詞都被認為是危險的和“挑衅性”的，他們为这一糾紛取了一个更体面和較少顛复性的名称——“全國性的停工”。“总罢工”这一名詞，像“莫斯科的黃金”一样引起麥克唐納和湯瑪士內心的恐怖。

“这些人”是否知道他們所領導的力量？他們是否明了巨大的人类羣众在掙扎着站立起來，企圖掙脫社会罪惡的傳統，这种社会罪惡在工業革命每一新的階段，随着技術發展与社会發展不平衡的擴大，年复一年地增長着；在政治上他們的武裝是薄弱的，他們奸詐悖謬，反复無常，他們叛賣的影响是極為巨大的。然而“这些人”却是当时劳工运动中的首腦——这些腿桿軟弱和麻木不仁的人。尽管如此，在艰苦的階級战争中，总罢工还是更加坚强起來。在街道上和英國每一所房屋中，社会变革的閃光在放出火星，而的确因為他們害怕这些星星之火，“这些人”就潰敗逃竄，在从怠惰的墳墓中昇起的工人階級的正义和精神之前萎縮下。

去。

在倫敦，志願警察是特別地橫暴和胡作妄為，這正是反映着他們的階級地位，恰如同工人階級的團結反映着他們的階級地位一樣。警察在公共汽車和地下電車的前后警戒着。公共汽車的車窗都用木板遮住或是以鐵絲網包住，車上的引擎廂蓋也用鐵絲網封住。倫敦的這些事實……而且也只不過是在倫敦……意味着政府在這個大都會中已支配了一切，并設法把破壞罷工的戰術發展到比各省更為露骨的程度。

糾察隊被志願警察的隊伍——準備將法西斯主義付諸實行的托利派青年紳士——無情地攻擊着，他們乘坐着車輛沖到“肇事地點”然後下車揮舞着警棍奔向非武裝的罷工者。在坎勃威爾發生了毆打，在斯特潘尼是一片殘酷的景象。有一段時期，倫敦各地區的一般公眾對罷工者并不同情，而政府的策略却促使他們倒向工人這一邊。的確，同情也來自陌生的和意想不到的地區。

全國各市鎮的市政廳都變成了罷工破壞者的臨時召募站——但是反應却并不是如政府所期望的那樣。沿着北街延長綫，有些工賊的車輛企圖未經許可而通過，受到一羣工人們的伏擊，被石頭打得停止行駛。杰·特·茂菲在從犀菲爾德經萊設斯特和德培到倫敦的旅途中寫道，[⊖]他在路上只看見六輛公共汽車，除了那些標明是運送糧食的而外，沒有電車，只有兩列火車，幾乎沒有什麼乘客。各省——特別是大的工業地區——是穩定而堅決的。

全體人民，總的來說當然是被事態發展的迅速所震動。

⊖ “總罷工的政治意義”，第九二頁。

由于缺乏報導(全國廣大地区缺乏任何新聞,或者最多也不过只有片断的新聞),因而無綫电收音机的銷售量大为上昇,当时还是一种原始的礦石收音机。許多不法商人也看到了他們“生財”的机会,因而在某些地区,無綫电收音机在几天內就出現了黑市价格。

七日,星期五,拥有英格蘭教会全权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出來調停罢工,要求双方“以团結合作的精神为共同的利益……”而靠攏。大主教和各基督教会的領袖举行全体會議后,他建議以下列几項为协商基礎——(甲)职工大会取消总罢工,(乙)政府重新提出在一定的短期內補助煤礦工業的建議,(丙)礦主收回最近所頒發的新的工資标准(即停業通告)。使大主教自己也驚訝的是,“英國公報”竟拒絕公布他的呼吁——英國廣播公司对此也保持絕對的沉默。只有“英國工人報”刊登了他的宣言全文。最高委員會在為這一宣言而作的序言(一九二六年五月八日)中說:“最高委員會并不一定是同意这些协商的条件,但是要喚起公众注意政府对于这种为謀求和平而作的努力所抱态度的嚴重性”。

在下院中,邱吉尔为了未曾公布大主教的呼吁而受到攻击,但是他辯称該一材料的到來已經太晚,不及公布。

在工会运动內部,关于談判是否正在進行这一点仍然是众說紛紜。这并没有被麥克唐納星期五的声明所緩和。他說:“我正在尽一切力量保證把每一分鐘都用以爭取和平解决这一冲突并达成協議”。也許是由于領導人自己的这一宣言引起了“英國工人報”在同一日發出了一篇“我們站在哪里”的声明。該報宣称,“不断地有人說,藍姆賽·麥克唐納先生、赫伯特·斯密司先生、阿瑟·柯克先生和其他的工会領袖們曾經为了考慮結束总停工而努力設法重开談判。

最高委員會希望大家清楚地了解，這一論斷中是沒有任何真實情況的。並沒有任何個人或一些人不論獲得或未獲得最高委員會的同意曾向政府正式地或非正式地提出過談判的建議，最高委員會自從向政府發出了一封函件強硬地抗議內閣破壞正在進行的和平談判的盲目行動後，就沒有與它直接的或間接地聯繫過。

“最高委員會的立場可以用簡單而明了的語句來表明。他們隨時準備在有關取消停業通告、結束總停工和為了光榮地解決煤礦糾紛而恢復談判等方面進行初步的商談。這些初步的商談必須是不受任何條件束縛的……”該一宣言再度提到並沒有對憲法進行攻擊。

鮑爾溫對這點的答复是星期六晚上在廣播中說，在政府可以重開談判之前，罷工必須停止。雖然僵局還在持續之中，最高委員會的宣言確實表現了工人階級領導方面的態度已經變得較為強硬了。從他們明確地聲明初步商談“必須是不受任何條件束縛”這點看來，似乎暗示着他們已經放棄了先前的主張，準備接受委員會的報告作為談判的基礎，因為他們知道這——如湯瑪士向柯克所說——“可能牽涉到減少工資的問題”。

政治的壓力與日俱增。在禁止“英國工人報”的出版這一意圖未能得逞——或是經過慎重的考慮決定取消這種做法——後，內閣在星期五晚上停止了印報紙的供應。政府用征用一切印報紙的辦法，就能對很少幾家尚在出版的報紙掌握殺大權。當然，這也使得邱吉爾的得意工具“英國公報”處于一種壓倒優勢的地位。雖然“英國工人報”的新的印報紙都在政府監督下積存在碼頭上或是工廠中，但它仍然能用它現有的儲存材料繼續出版，只是報紙的篇幅由八

頁減少為四頁。

政府日益增加的压力並沒有引起最高委員會態度的改變。他們無論在答復鮑爾溫的聲明或是在反駁邱吉爾的“英國公報”篇幅中每天針對他們的“革命”的指控時，仍然全無明顯的仇恨。星期六，當一隊在武裝衛護之下的糧食運輸隊——配備了裝甲車和戴了鋼盔的士兵和警察——從碼頭被護送到海德公園里政府的臨時倉庫後不久，鮑爾溫在廣播演說中攻擊總罷工是一件政治武器。不論他們對於作為政治武器的罷工的看法如何，很少有明智的工會領袖們曾認真地斷言勞資事件與政治可以分開。這二者是不可避免要聯結在一起的，要為一次像罷工這樣的產業中的行動辯護，很難否認它是具有一定的政治性質，應該就政府的經濟政策方面來確立這一行動在政治上的正義性。可是這並不是最高委員會的觀點。五月九日星期日的“英國工人報”公布了最高委員會對首相在廣播中的攻擊的答復，它首先引用了下列矛盾百出的一段文字：“工人們必須不被鮑爾溫先生昨晚發出的新攻擊導入錯誤的方向，他把這次罷工看作一項政治事件。工會正在為著一個目的而戰鬥，並且只是為了這一目的——保衛礦工們的生活水平”。

這一答復繼而重復提出最高委員會準備“隨時”和政府接着上次中斷了的談判來重開談判。最高委員會憤怒地抗議，根本談不到向憲法挑戰的問題。“最高委員會並不向憲法中的一條規則、法律或習慣法挑戰：它所要求的只是礦工們應該得到保護……”這種以妥協的調子來駁斥政府指控的有點急燥的態度，招致了來自羣眾的不少批評——的確這種語調幾乎是在譴責政府竟會懷疑職工大會會有這種瘋狂的意圖！共產黨的“工人公告”對這種急燥態度的反應是指

出“‘英國工人報’要使每個人都確信這次罷工是一次單純的勞資糾紛，這種熱望几乎是令人感動的。僅就最高委員會的意圖而論，這一論述確實是真實的，但是政府却每時每刻地使它成為一項政治問題。他們擱取印報紙的存貨這一事實不僅證明他們在走向極端，也證明在緊急權力法之下，‘憲法’只是政府可以恣意玩弄的東西。根據官方的報導，已經有一百起以上的逮捕案，每小時都有關於襲擊和逮捕的消息——在軍隊的行動方面也是如此……”

如果最高委員會在正式的公告中很少給予正在進行罷工的四百萬工人任何有力的領導的話，那末在其個別成員的聲明中，有力的領導就更少了。在同一个星期日，杰·赫·湯瑪士先生在漢默斯密司罷工者的集會上說：“我從不掩飾我不贊成總罷工的原則”。湯瑪士先生完全有權利提出他個人對於總罷工原則的看法，但是提出的時間却特別不適當：正當這個歷史性的罷工運動達到了威力的最高峯；正當運輸和普通工人工會前任主席哈里·高士林說：“我很高興能活着看到這種團結的壯麗的表現，這在世界歷史上是空前的”（這些言詞振奮着人們，使他們不怕犧牲）——而同時，湯瑪士這個在整個工會運動機構中的重要人物却發表了只能使罷工的敵人和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敵人歡呼喝采的言論。

在最高委員會五月十日星期一的通報中實在包含了不少的反諷意味——“一切良好”。委員會在罷工進入第二周時記載着：“每個城、市和郡向最高委員會的總部作出的報告敘述着羣眾的團結巩固……第二個星期開始時的指令是‘要堅定’……要忠實地執行指示并信任你們的領袖”。工人們是堅定的，這點完全正確：正在動搖和——如以後的事

實所說明——已經動搖了的是他們的領袖。

全國工人感到一種強大無比的勇氣和巨大的期望。在“工人們關於大罷工的歷史”^①一書中把第二周的开始描寫為這樣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工人們“達到了新的發展高度。如許多的報告所指出，他們‘剛剛开始’而他們的全副攻擊力量也僅僅才开始被感覺到。在廣大的地區出現了羣眾性的糾察隊、自衛團、宣傳工作、糧食站和聯盟組織——這一切都剛开始應用”。

確實，正是這種感覺使他們的領袖感到焦慮。他們完全了解，這一罷工的政治性質正在增長，隨着更多的工人參加罷工——機械工人和造船工人在第二周也被召加入罷工——這一鬥爭的政治性質將變得更加強烈。這一切積累起來會造成怎樣可怕的后果呢？將來會發生怎樣的流血革命呢？是否工人們會在革命熱情到達最高峯時，不僅掃開了無形的紀律的束縛，甚至也掃開了他們的領袖呢？這些可怕的問題在第二周开始时侵入了不少最高委員會人士的头腦。他們考慮，不敢放鬆那牽絆住罷工的韁繩。必須不惜任何代價保持妥協的聲調。不能失去和政府商談并結束這一糾紛——甚至是不能令人滿意的結束——的機會，以便制止住“野人”的橫冲直撞。這是他們的哲學，也是他們的指針，在三天的時間內將把他們導入向政府無條件投降的安全港口，而把工會運動引上災難的暗礁。

從五月八日星期六起，最高委員會差不多是集中全力于旨在結束罷工的“幕后”談判。像時常發生的情形一樣，進行的真相在一份美國報紙上洩漏出來。在這個星期六的

① “工人們關於大罷工的歷史”，伊林·威爾金森、傑·弗·荷拉賓、勒·維·普司蓋特著。

“紐約世界報”上刊載了一則該報駐倫敦通訊員發出的消息，揭露了藍姆賽·麥克唐納在下院私人接見記者，這位工黨領袖談到他和鮑爾溫先生保持着經常的聯繫，在解決罷工的問題上“每小時都進行了會商”。該美國報刊又說這一報導造成了“英國工人報”的主編如此“即時和深刻的驚恐”以致權威方面禁止發布該一消息。

政府主要的全權代表不是別人，就是赫伯特·賽繆爾爵士，即臭名昭彰的煤礦委員會報告的主席。赫伯特爵士這位具有極高個人威望的人材和出眾的政治家顯然是接受了一項——在犧牲礦工的情況下——尋求擺離絕境的任务。政府了解罷工是何等的巩固團結，他們知道必須作出某些驚人的行動以制止罷工運動威力的增長。關於賽繆爾從國外回到英國——他在意大利休假——并返回糾紛的舞台一事，阿·杰·柯克曾寫道：“我不知道究竟他是被召回來的或是自動回來的，但是事實却是，在他剛回到英國時，他就接見了可尊敬的杰·赫·湯瑪士和其他人等，并且私下開始了談判。那些曾經不願意參加罷工和對此表示躊躇的人不斷地在尋求擺脫罷工的道路”。

當這些極端秘密的會談正在進行時——往往是在遠離罷工現實或甚至罷工心理氣氛的勳爵們隱蔽的別墅中進行——工人們的鬥爭絲毫沒有鬆弛，反而變得更加堅強有力。政府害怕勇猛的工人們造成麻煩，不得不在倫敦的碼頭區周圍樹立起一道警戒綫。罷工已經以其直接和間接的影響掌握了整個的工業，“紐約先驅論壇報”的通訊員在該一周末寫到了“罷工對於工業的緊扼”已開始被十分清楚地感覺到了，各廠相繼地停工，這些工廠的雇工們並沒有接到罷工的命令，而是由於缺乏運輸工具，因此在沒有燃料和原

料的情況下無法開工……一般來說，國家正常生活的脈息是在明顯地遲緩下來。街上的交通減少到和洪水在主要干綫上泛濫時的情況差不多了……”隨着全國的工業部門和公用事業脈息的遲緩，雙方情緒的高漲，在第一周的灰燼中再冒出巨大的火燄并燃成熊熊大火的可能性，顯然是更加大了。

這就使得工會領袖們向工人們發出警告，要他們離開街頭，自己進行文娛活動或者是留在家裡。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加迪夫地區的中央罷工委員會所提出的勸告，它向工會會員呼喚，保持和平。它敦促大家“保持微笑，不要受到挑釁。回到你們的園子中去。看看妻子和孩子們。如果你家沒有園子，那就到郊外去，到公園和公共游樂場去。不要在市中心游蕩。到郊外去吧，沒有任何活動比散步對於健康更為有益了”。該市的八個公共機構都為了罷工者的文娛而開放，雖然契夏團的士兵在全市巡邏，而他們和工人之間却仍然保持着好感。總的來說，工人們的紀律是極為良好的。只是在偶然的情況下他們才為挑釁所激動，並且也只是在非常稀有的情況下他們才作出了真正的過激行動。

運輸和普通工人工會的總書記和主席，恩斯脫·貝文和哈里·高士林，在罷工第二周開始時向他們的全體會員發出通告，宣稱第一周的立場是要求勇氣和不怕犧牲。通告繼續說，“今天，我們的立場和以往一樣是堅定而強硬。如果需要的話，我們必須作出甚至是更大的犧牲。礦工們一定不能被壓倒。不要混亂。要忠誠地和穩定地堅持下去。不要退縮”。這一簡單而又動人的通告沒有暗示、也沒有泄露出領袖們之間的實際情況。“英國工人報”完全沒有報導賽繆爾談判，或者甚至是赫伯特爵士由國外匆忙地回來的消息。

只是在“英國公報”上顯現了一些跡象，可以看出事態的變化，但这也只有極端敏感的觀察家才能察覺到。邱吉尔突然放棄了他的那種關於“革命”和全國面臨內戰的叫囂。但是最高委員會這種虛偽的路綫是如此奇特地不忠實，以致在停止罷工的前一天，“英國工人報”還在第一版上以有力的大號字標題要求——“不要鬆弛”——“罷工者的人數沒有減少：它是在增加着。自從罷工開始以來，參加罷工的人從來也沒有現在這樣多”。在運輸和普通工人工會向其會員發出的另一通告中也宣布：“我們將要繼續不變地為了公平和正義而堅持立場”。當然這也是為罷工組織委員會的首腦，恩斯脫·貝文所批准的。

雖然賽繆爾的調停建議的消息在星期一已經洩漏出來了，可是“英國工人報”仍然沒有發表任何的聲明。此時調停建議已經進入高級階段。赫伯特爵士草擬了一個報告，而職工大會的產業委員會和礦工執行委員會在五月九日星期日就討論過該一文件。礦工們拒絕接受，並強硬地反對接受賽繆爾備忘錄——一般對該報告的稱呼——中所包含的對工資的任何削減。赫伯特爵士自己再三地否認他是在政府的命令之下或甚至是在政府的同意之下進行工作的。他向產業委員會說：“我是完全自動地出來進行工作的”。可是無論赫伯特爵士如何來解釋他的調解，却無法否認他的公式和鮑爾溫先生所提出的毫無不同之處。

五月九日，十日和十一日這幾天進行了多次的會議；職工大會的談判委員會和赫伯特·賽繆爾爵士進行了歷時甚久的談判，進行情況的消息間或也洩露到礦工委員會去。然而，在全部談判中，只有一次礦工們被邀參加——即在五月十日，星期一，赫伯特·斯密司（主席）、阿·杰·柯克（書記）

和李查德孙先生(司庫)断然拒絕了罢工应当停止以便使談判能在削減工資这一基礎上繼續進行这一建議的那一次。阿·杰·柯克寫道：“这十足証明了这些討論和兒戲談判已經达到了这样的一个階段，即談判委員會和工党的領袖們認為已經獲得了某些成就，足以使停止总罢工的动議成为理直气壯”[⊖]。

柯克指出他和湯瑪士以及勃罗姆萊的商談，使他相信最高委員會的某些成員只是利用賽繆爾談判作為他們停止罢工的借口。“某些个別人士”再度催促礦工考慮減少工資的建議，职工大会的談判委員會又試圖起草新的方案。柯克寫道“这看起來实在可怕，我們不僅要和政府以及煤礦主作战，还要和某些劳工領導作战……”

罢工的猛烈程度并未衰落，但是在口号和鼓吹的幃幕后面，职工大会的產業委員會正在計劃退却，在全國上下，許多人被逮捕和拘押。在賽繆爾談判达到高潮时，即在五月十一日星期二，过去几天中被逮捕的人数增加到三百七十四人：僅在格拉司哥一地，自罢工开始后已逾二百人；在北明翰，六名共產黨人因出版一份罢工公告而被逮捕，而礦工联合会执行委員會委員之一諾·亞·阿勃勒特也被逮捕，被道具結和罰款十英鎊。

在罢工停止的前一天，麥喬麗·波立特夫人——她是哈里·波立特的妻子，而哈里·波立特已和其他的共產黨領袖們一同被关進了溫茨華斯監獄——也因發行共產黨的傳單“工人公告”而被逮捕。但是警察無法找到該公告的出版地点，所以它仍能繼續出現。当时以傳單形式繼續出版的

⊖ 阿·杰·柯克：“九天”，第一八頁。

“每日邮报”在其社論中大声疾呼，要求逮捕职工大会的最高委员会。遏止罢工的措施每一小时都在增加着。由于全国海员和消防队员工会主席海夫洛克·威尔逊先生请求禁止该工会各支部向其会员支付罢工费用，最高法院便宣布总罢工是不合法的。海员和消防队员工会的某些支部未经执行委员会的许可进行了罢工，而威尔逊就向法庭提出该一问题。阿斯脱勃利法官先生节外生枝地说——“职工大会委员会号召的所谓总罢工是不合法的，并且是完全与法律相违背的，那些掀起罢工和参加罢工的人是不受一九〇六年产业纠纷法保护的……”约翰·西蒙爵士也接着在下院中说这次罢工是属于“一种完全违宪和非法的性质的……每一个劝诱和鼓动罢工者破坏合同的工会领导人要拿出他财产的最后一文赔偿破坏的损失……”

这里可以不無俾益地指出，甚至“法官杂志”这份声誉卓著的法学周刊，在当时也表示完全不同意约翰爵士的看法。该杂志评论道，“这位博学的高级顾问没有为这一概括的声明提出理由和权威论证，而我们认为这种理由和论证也并不存在”。尽管政府的攻势尚在增长，罢工的基础仍然是非常坚固。“第二线”——机械工人——也已投入罢工（要注意，这是最高委员会所号召的），在职工大会正式退却的前夕，英国广播公司还宣布：“迄今还很难看出罢工有总崩溃的征候”。

在和赫伯特·赛缪尔爵士进行谈判的最初阶段，“英国工人报”丝毫没有透露出这一消息。的确，如前面所指出的，在星期二晚上，当谈判达到高潮时，“英国工人报”在付印时还在第一版上以大号字刊印着——“不要松弛”。对于这种谨慎，最好的解释就是没有一个最高司令部会让它的

尙未战敗的軍隊知道停战談判已在進行。这一羞辱实在太大了，而軍隊的士氣，不論是如何地堅強，也會受到致命的打擊。問題還不在於不讓工人們知道，而是在於當戰鬥進行到最艱巨的時候，當政府的實力正表現出被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空前的團結所震撼的跡象時，當勇猛而強有力的領導再向前挺進一步就能使鮑爾溫政府垮台，不用不合憲法的方法，不用革命——流血的或不流血的——的方法，而僅僅用議會鬥爭的方法就能取得罷工的勝利時，工會領袖們竟然認為去和敵人談判是合乎理想的。而公眾輿論这幅奇異的矇矓影象反映着它對罷工者的同情和對鮑爾溫政府冷酷的馬基雅弗里主義的憎惡。

事實上，到五月十一日星期二的晚上，赫伯特爵士已經完成了另一份備忘錄的草案并把它提交給最高委員會。會議舉行的地點是現在已故的南非億萬富翁阿比·倍萊爵士(杰·赫·湯瑪士的私人朋友)的住宅中，這位爵士好意地為最高委員會莊重的會談提供了合適的場所。他們稍事考慮後，一致決定接受該草案作為停止罷工的基礎。然後把礦工們找來。當天，在這以前，礦工的執行委員會曾舉行會議并研討了各地區的形勢。他們在辯論罷工的形勢時已經知道，在他們的背後正在進行着停止整個罷工的談判。礦工們仍然是堅決的——決不退却，不作可耻的投降。八點鐘，聯合會的執行委員會全體人員被最高委員會召見。氣氛是緊張的。當最高委員會主席阿瑟·潑夫開始唸他的材料時，他知道礦工們已經覺察出所涉及的問題了。這一大規模的斗智，這一巨大的恐嚇和反恐嚇的戰鬥，堅強者和軟弱者之間的戰鬥，快要結束了。潑夫主席告訴礦工們最高委員會已經作出決定。他宣布接到赫伯特·賽繆爾爵

士的建議，談判委員會已經予以同意。

关于这时的情景，沒有比阿·杰·柯克的“九天”一書描寫得更好的了。

“在漫長的發言中，潑夫先生庄重而嚴肅地宣布最高委員會已經決定礦工代表必須接受這些建議作為談判的基礎，他們並將命令停止罷工。他們已經得到了使他們滿意的保證，政府將接受這些建議，並在罷工停止時撤銷停業令，礦工們將在維持現狀的條件下回去工作（當然在恢復工作後的未來將減少工資）。他告訴我們，這些建議是不可變更的，是不能修改的，我們必須全盤加以接受，這是職工大會一致的決定。赫伯特·斯密司、我自己以及我的同人們繼續追問潑夫先生以上所說的保證究竟是什麼以及誰提出這些保證。我們沒有得到答復。但是在我問杰·赫·湯瑪士政府是否會接受賽繆爾建議以及他的保證是什麼時，他親自向我說：‘你也許不相信我的話，可是你能不接受一位曾任巴勒斯坦總督的英國紳士的話嗎？’

“我們的主席，我自己和同人們提出了一些其他的問題：詢問其他工人對於過去所作出的一致決定——我們應當一齊回去工作，彼此保護不受迫害并使一切工人都能在和離開工作時同樣的條件下回去工作——所採取的態度如何。他們對我們談：‘那沒有什麼問題’。我們繼續追問這點，杰·赫·湯瑪士的答復是：‘據我看來，鐵路上的人員將得到保護’——其含義就是我們不需要去多管其他工會的事”。

柯克以一種明顯的深切的感情寫到在他自己和他的同人們面前的一個“無底深淵”。他們所力爭的一切似乎已在那黑暗的时刻消失在一片擴張着的陰影之中。如他所說，“這是日復一日的怯懦的頂點”。礦工們要求最高委員會暫

时休会，便退出到与爱克勒斯頓廣場职工大会的建筑物毗鄰的工党办公厅的一个房間中去。

午夜过后不久，他們回到了职工大会，拒絕了最高委員會的建議。礦工們的決議說，这些建議在最好的情況下也意味着减少許多礦工的工資，这是与礦工联合会多次的宣言相違背的。它又說，他們对于礦工的代表們在事先未能得到机会去考慮建議的草案一点表示遺憾。它接着說“此外，如果这种建議的提出是作为停止罢工的一种手段，那末采取这一步驟的責任必須完全由最高委員會担負”。

当談判委員會已經安排好在那晚去会见首相这一事实暴露后，最高委員會卑鄙的投降就更加顯而易見了。但是礦工們的頑強反对打破了这一計劃。在礦工們退出考慮賽繆尔备忘录时，唐寧街还曾打來了一个電話，問華尔特·西特林“談判委員會什么时候可以办好”。

星期三的黎明前，礦工們离开了爱克勒斯頓廣場。柯克說：“我們又疲倦又憂慮，几乎是气馁而又沮丧，但是我們的信念是坚定的，坚信我們所做的是正确的，我們仍然是忠誠的和無愧于上百万的工人和他們的家屬交付給我們的囑託，并且也相信我們运动中的全体羣众会出來保衛礦工們的生活水平”。

在这一天，这一措施被簽署和批准了。五月十二日星期三的正午，最高委員會会晤了鮑尔溫先生并告訴他，他們已經决定停止总罢工。在他們晋謁首相之前，談判委員會會再度与矿工会晤，懇請他們支持停止罢工的号召。这次礦工們只經過几分鐘的考慮就以下列詞句答复这一邀請：“听到职工大会代表的报告后，我們重申我們五月十一日的決議并向所有停止工作支援礦工生活水平的工人們表示深

切的敬意，他們表現了驚人的忠誠，我們負責向一次尽可能及早召开的大会提出报告”。当时并没有提及矿工们所感到的仇恨——但是柯克写道：“再稍过几天，政府、資產階級、財政巨子、寄生虫和剝削者們就要被迫向矿工們求和。这样我們在煤礦工業中所獲得的解决办法就会是有助于提高英國工人运动的榮譽和威信的，这也是工人們所表現的團結应有的報酬。他們(領袖們)丢开了这个比英國勞工过去所獲得的任何一次勝利都要大的勝利的机会”。

鮑尔溫以顯而易見的冷漠态度接納了最高委員會停止罢工的消息。在潑夫代表职工大会發表意見后，首相告訴談判委員會他当时不想發表長篇的声明，而要立刻召集內閣會議。湯瑪士和貝文請求他作出保證，他将利用他和僱主的关系來防止發生磨擦，或如湯瑪士所提的：“有一件事我們絕不应当有，那就是游击战。”鮑尔溫隨便地答称，他一定会“考慮”這一問題。湯瑪士和貝文的懇求就十分清楚地說明他們在“不作牺牲”這一問題上從來也沒有得到任何保證，他們星期二晚上是向矿工們說了謊。

貝文不断地企圖从鮑尔溫那里得到一些零星的讓步，但他始終毫無進展，最后鮑尔溫以極度的輕蔑來对待他們，对职工大会的委員會澆了一头冷水。首相說：“潑夫先生，現在，如我以前曾說过的，我們彼此都有許多事情要办，并且是許多令人憂慮和困难的工作，我想如您能愈早从事于您的工作，我能愈早从事于我的工作，就愈好。在这样一記羞辱的耳光之下被斥退了的委員會悶悶不乐地走出唐寧街。据報導，湯瑪士看起來像是一个“既惶恐又沮喪”的人，这是毫不足怪的。可是湯瑪士是个能屈能伸的角色，單單是首相这种使人畏縮的輕蔑是打他不倒的。他認為在自己

的範圍內，他仍然是一個有力量的人物：他確實也是。他是一個既有力量又危險的人。

鮑爾溫召集了他的內閣，然後到下院宣布他的勝利是“常識的勝利”。“英國工人報”在當日下午和晚上出了三版，一版比一版更詳細地敘述了事件的日程。可是職工大會的這份報紙卻沒有一版暴露過一件事實——最關重要的事實——礦工聯合會曾發出了一項聲明，宣布他們并“沒有在任何形式下參與了”停止罷工的号召。星期三晚上最後一版“英國工人報”用了一長串的大標題——“罷工今日終止”——“職工大會最高委員會對礦工今後將得到公平待遇表示滿意”。該報第一次提到了賽繆爾談判，並刊登了職工大會和赫伯特·賽繆爾爵士之間往還的某些信件。一封日期為五月十二日的來自赫伯特爵士的信件上有下列一段話：“我從一開始就已向你們的委員會明確表示我完全是自動地在進行這一工作，政府並未授權予我，我也不能代表他們提出保證”。這樣，政府就兩面沾光。他們已經大大成功地“利用”了赫伯特爵士而又無須乎付託給他任何作出讓步的權力。賽繆爾備忘錄是直接造成停止罷工的工具，也只是由於這一事實，才使它成為一個歷史性的文件。其內容如下：

1. 應恢復有關煤礦工業情況的談判，延長津貼期限至一為進行談判所需的合理的時期。
2. 除去在礦主和礦工之間單獨舉行會議以外的其他解決煤礦工業中糾紛的辦法之外，任何談判似都不可能獲得成就。因此應當建立一全國工資理事會，其中包括雙方代表、中立份子和一位獨立的主席。
3. 參加理事會的各方得提出他們認為與討論項目有關

的任何問題，而理事會必須對這些問題加以考慮。

4. 以前的工資標準不應加以修改，除非能充分保證委員會所建議的改組工業的措施將被採納。應當如首相所建議成立一個委員會，其中應當包括負責與政府合作擬定所需要的立法與行政措施的人員的代表。該委員會，或工資理事會，應當保證決不對有關煤礦工業內部的各項問題所必需採取的步驟棄置不顧或不適當地加以拖延。
5. 在上述各點都已獲得同意以及煤礦全國工資理事會考慮了應付當前存在的財政困難的切實可行的各項辦法後，如該理事會認為絕對必要，它可以進行達成工資協定的準備工作。
6. 該工資協定應當：
 - (1) 如實際可行，應比過去各方案更為簡易。
 - (2) 不在任何方面損及收入最少的人員的工資。
 - (3) 確定合理的數字，凡任何一級的工人在正常的和習慣的情況下每周工作所得低於此數者，在任何情況之下，其工資不得減少。
 - (4) 在新的調整的問題方面，規定工資理事會在事實證明有此需要時，應隨時提出進行調整。
7. 在還存在有失業礦工時，應當採取措施阻止招募年逾十八歲的新工人。
8. 對於因不經濟的礦井的停閉而失去工作的工人應當作如下的安置：
 - (甲) 根據皇家委員會的報告所建議，在可能需要的政府的協助下把可以遷移的人轉移到別處去。
 - (乙) 對不能如此調動的和不能找到其他職業的人，

在一規定的時期內維持其生活：這項生活維持費系在失業保險法所規定的現有失業補助金數目之外，根據協議再增加若干。該項額外的費用應由國庫撥發。

(丙)迅速修建新房屋以安置調動的工人，職工大會將和有關方面商討合作以便利該一工作的進行。

在本質上，這一備忘錄的建議和皇家委員會的建議并無不同之處。隱藏在所有這些漂亮詞句后面的是一个關鍵問題——削減工資。再度提出在談判期間支付津貼并不是一個新的讓步——鮑爾溫在罷工開始前已經同意了這一點。這個備忘錄的主要特色是它的時機，而不是它的內容。它的提出正是在最高委員會和礦工之間猜疑最深的時候。它利用了其中的一方面對付另一方面。在湯瑪士、勃羅姆萊小心的誘導之下，最高委員會終於同意了這樣的想法，即礦工們的态度是過於強硬和不妥協，他們對同伴們的要求也太過份了。羅勃脫·默·雷納指出說：“柯克的口號不增加一分鐘的工時，不減少一文錢的工資，開始對他的同盟者發生一種激怒的而不是鼓動的影響，共產黨人熱烈地支持這個口號，也是使他們不能加以讚許的原因之一，委員會中極可尊敬的人士們尤其渴望把他們自己以及他們的運動與共產黨人分開”。^①

當號召停止罷工的通知開始發往各地區時，各地完全陷於紛擾與混亂之中。這一命令的突然來到好像雷擊一樣地打在那些正準備着前進而不是退却的人頭上。英王從白

^① 羅勃脫·默·雷納：“工會運動史”，第二六二頁。

金漢宮中向他的臣民發出了一個宣言號召說，既然現在鬥爭已經過去，全國已經渡過了一個“極可憂慮”的時期，他們應當拋開一切仇恨和敵意；英國廣播公司也向全國各地發出歡樂的新聞，廣播它對上帝的感謝；而鮑爾溫先生也在勃萊克最後總結說，要在英國的王道樂土上建立人間天國。……

然而在工人們的心中却是惶惑、憤怒和交雜着的悲痛和幻滅。共產黨作了一切的努力來使罷工復甦和提起有組織的工人們的精神。“工人公告”向他們呼吁要“支持礦工”。共產黨人要求立即召開有所有的罷工委員會和行動委員會參加的緊急會議，以考慮繼續鬥爭并迫使領袖們也如此做。他們敦促同時召開罷工委員會代表的全國會議以及各工會執行委員會會議，為繼續戰鬥提供領導。“工人公告”鼓勵道，“拒絕回去工作，不承認賽繆爾各忘錄。”

但是浪潮已在低落下去。鮑爾溫談論着全國有責任“忘却相互之間的攻訐”。他說僱主們要慷慨大量，工人們要全心全意忠於職責。他說：“全部英國人民不应当向後看而應當向前看，要以一種合作和善意的精神來恢復工作，拋開一切惡意和報復，這是極其重要的”。但是首相却忽視了資產階級的某些基本特點。現在工人們是在退却中，而全國各地的僱主們却企圖狠狠地報復一下。數百萬工人得到允許回去工作——但是在更低的工資條件之下。某些工人甚至被解雇。在私人企業中所發生的這種迫害當然是無可置疑的——可是在國家機關中，做法也恰恰相同。海軍部的一個通告宣布，在另行通知前，職員暫停工作。陸軍部則宣布凡留在工作崗位上的和在星期三以前回來工作的人員，不拘其服務年限的長短和工作成績如何，將被優先錄用。在下院中，杰·赫·湯瑪士——就是他向礦工們說，他担

保不使任何人遭受迫害——吐露出有四百万人仍然在罢工中，因为僱主們企圖在他們回去工作时强迫他們接受不可能的条件。他吐露出一家大运输公司(卡特·彼德孙)如何向它的僱工說，只有接受更低的工資他們才能回去工作。

在铁路、碼頭、旅客运输業和印刷業方面，僱主們乘机利用了当时的局面。当减少工資和增加工作的威脅像斧头一样地懸挂在头上时，在工人面前擲下了侮辱性的文件，要他們簽字。其結果就是罢工又非正式地繼續了几天。实际上直到下一个星期一，这种“扫蕩”才告結束，工会和僱主之間达成了新的協議。鮑尔濫假裝对于所發生的情况感到痛苦和震驚，并把它描寫为非常不幸。最高委員會感到憤怒并抗議說，首相良好的信义正在危險中。全國铁路工人工会(湯瑪士的工会)、运输工会和全國普通与市政工人工会命令他們的會員繼續罢工直至事件解决为止。“紐約先驅論壇报”把这一局面描寫为“英國僱主对工会的战争”……“罢工已經过去，但停業却已开始……現在輪到僱主們來罢工了”。“紐約时报”駐倫敦通訊員也發出了类似的消息。铁路公司所提出的要求遭到工人們猛烈反对，他們正如全國铁路工人工会主席西·特·克蘭普所承認的，發覺自己正“懸挂在中空中”。但是最后铁路工会被迫簽訂了虽沒有削減工資却是極為屈辱的协定。工会簽署的协定把罢工叙述为反对公司的一种“錯誤行动”，并且还包括了禁止工会將來号召某几类的工人進行罢工的条款。这就是湯瑪士在星期二晚上对礦工的声明：“据我看來，鉄路上的人員將得到保护……”

礦工們沒有接受賽繆尔备忘录的消息——这点“英國工人报”在取消罢工的一版上曾小心地避免承認——增加

了全國上下的痛恨和憤怒，電報紛紛湧到最高委員會，要求正式恢復罷工。最高委員會對於批評的答复是很典型的。星期四晚上的“英國工人報”刊載了下列聲明：“總罷工已經結束。它並沒有失敗。它使煤礦工業中的談判的恢復以及在談判期間政府繼續支付津貼成為可能”。聲明的結尾也和開頭的一段同樣惡毒地不誠實——它警告說：“不要簽訂個別合同，要和你們的工會幹部商量並執行他們的指示。你們的工會將保護你們，並將堅持一切以前生效的協定都要被完整無損地維持下去……”（着重點是作者加的）。

“英國工人報”再度確切地完成了它在罷工最後的日子裡所擔當的任務。他刊載了最高委員會“戰鬥”的通告——而略去了幕後實際發生的情況。而且這是在全國各地的工人面臨着充滿勝利感的僱主們所提出的報復性要求的時候完成的。五月十五日星期六職工大會的報紙對批評進行了反擊。他們為自己的行為辯護說，“最高委員會在結束這次停工中勇敢地行動着”。但他們承認迄今尚無官方的允諾和正式的擔保。最高委員會說，不論如何，這種情況是使“關心謀求和解的高尚人士”滿意的。

五月十七日星期一早上——“英國工人報”的最後一期——該報才在第一版刊載了一項消息，洩露出礦工們仍因停業而留在礦外。被導入歧途的沮喪不堪的工人們才慢慢地明了所發生的情況帶來的打擊。他們都已回去工作——可是礦工呢？礦工們現在又是孤獨的了。

政府為礦工們制訂了新的條件——對賽繆爾備忘錄作了微小的修改——可是在五月二十日的一次代表會議上，礦工們拒絕妥協並向他們的老伙伴鐵路工人和運輸工人工會求助，來支援一次煤炭停運——但是沒有得到響應。這

些工会好像白蟻一样正在掘自己的洞穴，而顧不上看一眼从工人階級史上光荣的一面的和諧中所產生的混乱，惶惑和破坏。

第六章

余波……

“最重要的事实就是現在人民親自知道和感觉到他們自己的力量。真正的階級意識在十天的罷工中和罷工停止后的三天中產生了……总罷工造成了一個統一的工人階級”——引自一九二六年六月“劳动妇女”(工党刊物)。

最高委員會的分析中有一個重要的方面是極其正確的——罷工不是一次失敗。甚至是最苛求的批評者也必須承認(在总数五百五十万工会會員中)四百万有組織的工人如此團結的表現在英國史上是相當獨特的。這一事實本身就不是失敗的标志。這是左派的一個巨大的收获;但对右派來說，這是一次恐怖的演出。总罷工的反对者——其中包括工党分子和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認為这种先例是嚴重的憂患。每一個政治集團都亟力要制造出一種解釋，作一種因果的推斷，在相當的一段時間內理論家忙碌于尋找各種論点和反論点，大家搜求各種各樣的解釋。而反对者為了現已很明顯的理由，更是特別急急于告訴工人們這實在不是什麼重要的事情：不論怎樣，我們不是已經用我們典型的英國方式——妥協的方式——解決了問題嗎？現

在，讓我們拋開仇恨，回到工作中去罷。罷工的崩潰也复活了下列的問題：總罷工作為一種革命鬥爭的方法來說，是不是一件有效的武器，或者它的目標是否受到高度發展的工業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家機器力量增長的限制，特別是在英國。

理論上的爭辯繼續了几个月之久——與此同時，事實的教訓蒙混過去了。而最有揭露力量的評論卻是來自正統的工黨人士——來自像阿瑟·漢德森那樣的人，他總算比他的某些同僚還更加誠懇些。漢德森指出了這次罷工开辟了當時社會和政治秩序崩潰的“可怕的遠景”。鐵路工人的主席，西·特·克蘭普先生叫喊著“決不要再這樣做”而駭人所聞的是麥克唐納差不多完全把總罷工的實踐從他的勞工綱領中刪去。他警告說，除非有武力的支持，這是一件既不能為勞資糾紛的目的或政治的目的而使用的武器，而且因為它是針對著“社會”的，而“社會”（即國家）就要被迫起來自衛。這種鼓動性的詭辯出諸洛錫茅斯的煽動者之口，是在意料之中的。我們要公正地來判斷麥克唐納，他從來也沒有掩飾過總罷工是不合他的口胃的。在貴族的公館中和一些不太挑剔的貴族們喝鷄尾酒，他會更覺自在，蘭姆賽對於一次真正成功的總罷工的思想總是感到戰慄的。這樣的事件就要意味著工黨領袖不光榮的下野。

但是比工黨右翼領袖的失敗更嚴重的是左翼威信的降低。現在危險是在於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對某些在早期曾與麥克唐納和湯瑪士之流作過鬥爭自稱為左翼的領袖人士的喪失信心——後來只是借助於圓滑地訴之於“理性”的請求所說服了。大部份的憤怒是指向這些人的——特別是在黑暗、蕭條和飢餓像致命的毒霧一樣弥漫著的煤礦區村落中。

礦工們在單獨進行斗爭。他們要求團結的呼聲在工會運動的走廊中空洞地迴響着。只有一片寂靜和政府令人驚恐的冷淡態度。

共產黨人規諫礦工們不要把他們的工會的同志設想得太壞——而要責難那些“出賣”罷工的不忠的領導者。可是很難以這樣的理智去向那些面臨着飢餓的人們呼聲，他們在不久前還感到勝利即將到來而現在却絕望地凝視着黑暗的未來。

在遠離這些村落，溫暖而舒適的下院中，溫斯頓·邱吉爾在收回這次總罷工的開支。他說直接的開支耗費了國家大約七十五萬英鎊——可是間接支出的就多得多了。至於工會方面呢？全國鐵路工人工會據稱至少付出了一百萬英鎊。除開其他工會的捐款以外，最高委員會曾付給礦工聯合會六萬三千英鎊，礦工征集了九萬三千英鎊特別基金——這和他們的需要比較起來是少得可憐的。這次罷工中各立案工會付出的巨額糾紛開支比以往任何一年為多。他們的公積金從一千二百七十五萬英鎊減少到八百五十萬英鎊。而僅僅在一九二一年各工會的財源就曾受到這樣的損失，支出了七百萬英鎊失業金。而政府在海德公園所建立的供應都會地區的牛奶站到停工結束時就盈餘了七萬三千英鎊，這點他們在當時並未承認。

總罷工被出賣以及它在整個工人運動中所造成的沮喪與混亂無疑地要關係到工會會員人數的大大降低，從組織觀點上來看更其嚴重的是工會基金大大地減少。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四年間工會運動的實力是直線下降的。納·巴魯教授寫道：“在二十年代早期猛烈的戰後危機對工會來說是很嚴重的——要遠超過一九一四年——一九一八年

期間。可是在兩次戰爭期間的年代中，最堪注意的特点就是工会會員数字在以后經濟恢复期(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間的直線下降。無疑，一九二六年总罢工之被击败也許是二十年代后期工会發展最大的障碍”^①。

今天沒有人會認真地懷疑，这是由于总罢工的失敗和(工人)运动沒有去全面分析这一教訓——以致嚴重地削弱了工党和工会以及整个工人階級的組織。在日益众多的失業之下，它鋪了一條使工人的抵抗支离破碎的道路，并最后導致工党分裂和藍姆賽·麥克唐納在一九三一年的叛賣。整个的运动以后不得不为它的領袖在总罢工期間和总罢工之前的錯誤付出更大的代價。

我們也將看到总罢工的失敗——虽然在政治上廣义地來說，这一斗争不是一次失敗，但在勞資糾紛中它确实是一次失敗——給工人运动帶來了多么重大的負擔。工会运动被不堅決的領導的行動所削弱，因而驟然低落并且为政府向工会各种权利展开猛烈和报复性的進攻扫清了道路，这种進攻就是臭名昭彰的一九二七年產業糾紛法——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在任一保守党政府中所曾推行过的最具有报复性的政治立法。他們小心地准备論据，准备工作是經過慎密計劃的。和对付总罢工一样，政府事先經過清晰地考慮：他們可以看出工人們的情緒，只要給予一絲有力的領導，总罢工的重演是不会很久的。重要的是要在其發展之前就去制止它：在它蓓蕾時就要摧毀它。政府所用的剪刀就是一九二七年的法案。在一九二六年，罷工中損失了一億六千万个工作日；鮑爾溫和他的內閣決心不再要这样

^① 納·巴魯：“英國工会运动”，第八七頁。

的年头出現……

有一件事情——單單就是这一件——延緩了政府的反攻，礦工們持久的抵抗。当礦工們尙在作战时沒有一个政府敢于提出这种报复性的立法，因为这会促使它所力圖扼殺的东西——工人階級的團結——重現。礦工們在漫長的異常艰困的六个月中的斗争本身就值得單独寫成一本書。在一九二六年的十一月，当他們最后因極度的飢餓和精疲力竭而回去工作时，他們結束了一篇工人階級斗争中的最壯闊的史詩。要記住，礦工們在总罢工开始以前的几天就因封礦而關閉在外：他們承受了一切苦难的冲击；而在他們回去工作时，囊空如洗，非常痛恨并且帶着至今当人們提到“糟糕的旧日子”时仍然会在礦工眼中燃燒起來的憤怒。

在其他各業复工后，不久又有新的动議促使礦工和政府接近。可是在五月十七日，主持煤礦事務的常务次長發表了一个关于賽繆尔备忘录的有趣的声明。他告訴礦工联合会：“政府的建議应当被認為是完全獨立于賽繆尔备忘录中所包含的建議之外的：后一文件在官方看來是并不存在的，礦工們如果是在政府也已經接納的理解之下而加以接納，那就要在各有关方面形成一种無法处理的情勢。”^①（有着重点的句子完全推翻了最高委员会所曾用以停止罢工的任何事实根据）

僅在兩天之前，一名工党國會議員魏特萊先生曾經詢問过首相，是否在总罢工期間的任一时候他曾說明他願意接受赫伯特·賽繆尔爵士的备忘录作为解决煤礦糾紛的基礎。鮑爾溫先生答称：“答复是否定的”。

^① 英國礦工联合会——“关于一九二六年五月总罢工的声明”，第一四頁。

礦工們從來也沒有被來自官方或非官方的允諾所迷惑。他們以前已經經歷過多次。可是這兩個聲明使他們幾乎對任何一個動議都要加倍地懷疑。

他們決然地拒絕了鮑爾溫另一個“提議”，即政府將履行賽繆爾皇家委員會報告的其他各項建議——如果礦工們同意普遍降低工資百分之十。在首相宣布該一提議的次日（六月一日）緊急權力法又被延長了壽命。它在礦工進行抵抗的整個時期內一直是生效的，並在一九二六年一年中製造了六千件罪案。

半个月后政府又采取了最可恥的倒退，它廢除了一九一九年七小時工作法案，這意味着礦工們現在不僅要被迫接受更低的工資，還要加上更長的工作時間。這是完全與皇家委員會報告的建議相違背的。此外，更長的工作日要把數以萬計的工人完全逐出工作——“在某些地區，管理當局會小心地注意到那些在罷工中起主要作用的工人應當首先被解雇”[⊖] 工黨的國會議員們公開地指責首相已被礦主們所“操縱”。他就回答說，如果雙方能夠接近的話——換言之，即礦工屈服的話——他將提出改組（而非國有化）煤礦工業的立法。

政府放肆的行為還不止於此。它用盡一切方法破壞罷工：數以百計的糾察隊和罷工積極支持者被逮捕和拘押。使用警棍對礦井會議進攻，毆打礦工，而最狠毒的行動就是阻止國內外的救濟到達飢餓的礦工和他們家屬的手中。

地方機構受到警告，不與救濟井停止一些福利事業，如對赤貧嬰孩供給免費牛奶，和就學兒童的免費膳食。甚至於

⊖ 羅勃脫·默·雷納：“工會運動史”，第二六四頁。

还通过了一项法案授权卫生部对于不服从白厅断绝救济的指示的监护理事会得暂时停止其职务。但是贫困的现象是如此严重，以致某些理事会违抗了卫生部还是参予这一工作。它们立刻就被封闭了。这种毒辣手段还不限于国内。一九二六年八月在矿工代表团抵达美国的前夕，鲍尔温向美国当局发出一信，声明在英国煤田中并没有令人震惊的需要。在首相的支持下，全国禁止虐待儿童会发表了一个报告说明矿工们的儿童并无迫切的需要。在“妇女与矿工们的封矿停工”^①一书中，麥丽恩·菲利浦斯博士引用了全国禁止虐待儿童会一名干部的话，这位干部曾被一位新闻记者询问该一报告的作用是否在于制止国内外对矿工们经济上的援助，他答称：“其目的就是在此”。

并非所有的人民团体都这样支持国家的。很大一部分的援助是由普通老百姓携往英国煤田的峡谷和村落中去，他们被这些把自己的一切都牺牲在工人阶级斗争的祭坛上的卓越的男人——和妇女——所深深感动。

以麥丽恩·菲利浦斯博士(工党的重要妇女干部)为首的妇女救济矿工家属委员会，执行了一个杰出的任务。她们除了把救济品分送到矿工家中去而外还募集了三十一万三千英镑。尽管政府方面封锁外国的援助，来自苏联、美国和欧洲各工会——特别是比利时——的援助还是到达了矿工手中。苏联职工大会的捐款远超过了其他的捐款，它捐助了大约一百万英镑给矿工的救济基金，这是在苏联工人中志愿捐募而收集到的。矿工联合会，不像最高委员会那样，并没有被把他们的救济金诽谤为“莫斯科的黄金”的威

① 第六〇——六二頁。

脅所嚇倒。

在六月之初，最高委員會決定召集工會執行委員會會議對總罷工進行調查。最初他們是不願意的，但是在所屬各工會的壓力之下，最高委員會同意了，各工會認識到需要中央的指導以應付在羣眾中廣泛散布的不滿。共產黨人和少數派運動早就要求職工大會發起向全體工會會員募捐，並對進口的外國煤實施禁運。到一九二六年職工大會的波內茅斯會議時在這方面還毫無結果，可是逐漸地來自下面的壓力變得極為強大，因而召開了一次特別會議，同意進行志願捐款。在兩個月中募集了四萬三千英鎊：“而以前在十九個星期中最高委員會正式募集的礦工基金只有九千五百二十五英鎊”。[⊖]有關外國煤的這項問題則被擱置起來，而最後就無聲無臭了。九月間，國際礦工聯合會曾以發動國際罷工的威脅來響應，只要英國職工大會給以必要的鼓勵，但是國際礦工聯合會的提議始終未被採納。

其時在六月中，工會運動焦急地瞻望着執行委員會會議，屆時整個的問題就能被弄清底細，罷工是如何地，和為什麼被停止。會議日期已經確定——六月二十五日——最高委員會準備了一篇向工會執行委員會提出的長篇報告。然而事情又起了變化——在開會前三天突然取消了這次會議。並宣布在職工大會和礦工聯合會之間已達成了一項協議將“調查”推遲至礦工們的封礦停工結束之後。並說採取這一步驟是為了在鬥爭期間不致發生任何足以削弱礦工的情況。它辯稱在當時召開一次會議必然要暴露出一些對雙方都不利的事實和觀點。所以雙方同意在封礦期間停

⊖ 艾倫·胡特：“戰後英國工人階級史”，第一六七頁。

止相互批評，礦工書記阿瑟·杰·柯克应当停止出版他的暢銷的罷工小冊子“九天”（該書嚴厲地譴責了最高委員會），而他方也不应当採取任何不利于礦工的行動。主要的考慮似乎是在當時還不應當提出任何問題以供公眾討論。但是也有人同樣有力地辯稱工會運動有權立刻知道它自己的處境。每一個在九天中參加罷工的男子和婦女有權听取他或她的最高司令部的報告。兩種說法都有某些理由，然而很難看出，礦工們在一次向公眾的攤牌中會有什麼不利。然而在他的執行委員會指示之下，柯克的态度是即使沒有因對最高委員會作戰而引起的麻煩，單只封礦停業就已經使他們忙于应付了。而妥協的辦法就是進行一次執行委員會不公開的會議——至少暫時是如此。

誠然，由於“六月公約”（職工大會——礦工協定的名稱）的存在，直到職工大會九月間的波內茅斯大會，沒有任何一次工會會員的大的集會能夠對罷工加以討論——其時大家只是推斷而已，因為“六月公約”的禁令也同樣地籠罩着大會。然而，它却沒有阻止最高委員會繼續向礦工們的“态度”進行攻擊，在原來應該提交給延了期的六月會議的報告上，出現了這樣的對礦工們嘲笑的指控：“只是這一項理由就足以停止罷工，即鑒于礦工聯合会的态度，罷工的繼續將使其目的成為毫無價值”。這全部是多麼的堂皇而荒謬。像天使一樣地來宣布礦工們應當不去理会使其大部份成員工資大大削減的远景而只是为了同意最高委員會的叛賣。這就是去同意一種，如事實所證明，沒有任何官方保證的退却政策。

而阿瑟·潑夫在他的波內茅斯大會的主席致詞中，實際上却敗壞了他的委員會的論點，他說：“煤礦糾紛直接的影

响确实是重大的而它还只是某些比它本身更加深入的事件的高潮。罢工反映了工人们对于工业制度的整个机构和政策日益增长的不满以及他们决定抵制传统的观念，这种传统观念就是经营不善的企业可以仅仅用加速降低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方法，就能使它成为良好的企业，获得经济上的活力，使该一工业处于健康的条件之下”。很不幸，这恰巧是与最高委员会在罢工期间所采取的态度完全相反的。

杰克·泰纳，当时的混合机械工人工会的一个左翼领袖曾动议查问该一报告，以便在大会上对总罢工进行讨论，全国铁路工人工会的威·西·洛勃附议这一意见。但是这一意见却被严重地击败了，主要是由于阿·杰·柯克的干与，他要求代表们尊重“六月公约”。柯克当时的威信是很高的。如果他当时要取消“六月公约”，他一定能得到大会的支持——但是矿工们是尊重他们的协定的，并且无论他们在后来的事件中是如何地不智，没有人能够否认他们的诚实是出众的。

鲍勃·斯密李，国会议员，他自己从前也是矿工，他是最高委员会成员之一，他动人地呼吁要加倍努力地为矿工和他们的家属募集捐款，使大会为之涕下，他大声疾呼地说：“我看到每一个煤矿的城市和村落——在好几处我亲眼看到——当丈夫由于家庭的情况，而表现出退缩时，我听见他们的妇女说：‘不要后退一步。直到获得满意的解决，一定不要回去……’”

其后就发生了一幕在任何职工大会上所从未经历过的惊人场面，最高委员会选择了约翰·勃罗姆来、机车司机和加煤工人协会的书记——杰·赫·汤玛士亲密的同盟者——去附议斯密李要求更多捐款的呼吁。委员会恐怕很难做出

比这更不策略的事情，因为勃罗姆莱在大約两个月前由于罪惡昭彰地破坏了“六月公約”而和礦工們結下深仇。勃罗姆莱，在七月份他的工会刊物上刊載了差不多是最高委员会准备向后来并未召开的六月特別會議提出的报告的全部内容。在当时，这一报告仍然是秘密的，勃罗姆莱的行动，很自然地就被整个新聞界所追隨，他們鑒于該文对礦工在总罢工期間的“态度”進行尖銳的攻击而加以大肆宣揚。胡特寫道：“勃罗姆莱的發表可以被認為是对‘六月公約’的一种最罪惡昭彰的——即使是無意的——破坏，或者至少也使該一公約無效和作廢。最高委员会的态度也許可以从勃罗姆莱先生之被選擇为波內茅斯大会上关于煤礦議決案中的發言人这一事实來加以推測”^①。

当主席公布之后，礦工代表中立刻發生了喧囂的騷动。他們踢翻了桌子并且摩拳擦掌好像准备打架：他們的某些代表企圖冲上主席台。最后主席在極力使他的声音在喧鬧中被大家听見时，他就停止了大会。礦工們列隊而出并高唱“紅旗歌”。这种史無前例的示威也表現了这次大会的緊張。自始至終，只需要一点火星就能在會議中燃燒起仇恨与攻訐。“勃罗姆莱事件”对于最高委员会和礦工之間关系的緩和并無很大俾益，当时的感情是如此强烈，以致不論怎样都很难有所改善。

在波內茅斯大会之前曾有多次促使礦工与礦主接近的努力，但是每一次試探都由于一个無法調和的老障碍——削減工資——而告失敗。七月間教會會議曾提議進行調解，建議礦主应当接受全國協定，并且不削減工資。煤礦執

① 艾倫·胡特：“战后英國工人階級史”，第一七〇——一七一頁。

行委員會接受了這一提議，當他們提交各地區時，一大部份人也接受了，雖然反對票在總的票數中還是稍占優勢——三三三、〇三六票對三六七、六五〇票。因為政府斷然地拒絕了主教的提議——該一動議也毫無結果。七月下旬工黨議會黨團提議討論解決的途徑和方法——但是他們的態度比教會更欠誠意，礦工們輕蔑地加以拒絕了。八月間，礦工和政府的會晤也是毫無成就，十月中礦工們的代表在一次會議上再度拒絕妥協，並甚至採取了南威爾士的決議撤回了所有的安全人員，以便加強這一鬥爭。在這次會議中也出現了密得蘭與諾茲煤田中的一部分人分裂了礦工的行動，但總的來說，為數是很少的，大部份礦工都仍然堅定地支持他們的領袖。

其時共產黨的領袖們已從監獄中釋放出來，雖然內政大臣喬遜—希克斯還堅決主張對他們加以監視。他甚至發出一項禁令阻止威廉·加拉赫在杜爾漢郡演講，然而加拉赫還是設法逃避了法律的鐵臂，並且在礦工們的居處差不多是按照全部排定的程序進行了演講，他總是走在警察之前。加拉赫自己寫道：

“……孩子們決定我要在所有公布過我要演講的地方進行演講。而我也講了話，每一次都是在礦工居處的擠得滿滿的會議上，所有的幹部也都在場。當會議在進行時我溜進去，立刻走上台，演講四十或四十五分鐘，然後再在警察來收拾以前離開。他們從來也不知道——正如我也從不知道——下一次我要在那裡出現……”^①

在總罷工期間和礦工們進行鬥爭的漫長的時日中，共

^① 威廉·加拉赫：“雷聲隆隆”，第九四頁。

產黨和以哈里·波立特為首的少數派運動，以及華爾·漢寧頓所領導的全國失業工人運動堅強地為礦工們作戰。他們的全部力量都投入了鬥爭。但是黨在數量上和財政上仍然是弱小的。誠然它的影响增大了，到一九二六年秋天時，黨員的數字增加了一倍，從五千人增至一萬人。共產黨刊物的流通和散布也同時增長了。可是這並不是真正的考驗，因為黨員的數字在一九二一年曾到達一萬名，而在一九二三年的團結會議時又再度降低到五千人。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一教訓並沒有被汲取，因為共產黨員的數字在一九二七年未再度降低至五千人。這種變化中的很大一部份可以肯定是由於遭受迫害和長久的失業。事實上，這就生動地証明了條件的惡化和生活水平的降低，這一事實的本身並不造成龐大的共產黨運動。的確在總罷工後三年間，工人運動的整個實力是嚴重地低落了，而工黨本身也毫無希望地受到了一九二七年產業糾紛法與工會法的統治，這樣就使凡是擁護征募政治基金的人必須訂約才可以交納這項會費，而不是如以前那樣凡是反對的人必須訂約才可以免徵。

全國失業工人運動領導着煤田中的反對失業與貧困的羣眾鼓動工作。這一運動在總罷工和繼起的停業之後就繼續了礦工們的鬥爭，並且在華爾·漢寧頓驚人的有力領導之下，戰鬥在煤田中甚至繼續至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二八年。只是在這些戰鬥中，才出現了威爾士礦工們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從龍達被棄置的礦井和煤渣堆向倫敦的進軍；以及蘇格蘭礦工在一九二八年向愛丁堡的進軍。然而當時職工大會的最高委員會已經完全拋棄了礦工，他們不僅拒絕在戰勝貧窮中予以援助，並且還竭盡全力破壞這些進軍。總

書記西特林，代表最高委員會向各業理事會發出函件指示他們不得參與接待進軍者。

漢寧頓他自己活生生地描寫了那些日子裡煤田中的景象，他寫道：“在像南威爾士這樣的煤田中，數以千計的人們完全陷於窮困中，絲毫沒有任何的支援。他們還必須繳付房租否則唯一的出路就是被逐出，數以千計的家庭經歷着真正的飢餓。保守黨政府雖然完全認識到這種處境，却宣布它限于能力無法補救這種局面。勞工部頒發的失業救濟法案下的規則使大批的人由於各式各樣的理由而不能受益。人們被剝奪了福利的享受，因為‘沒有獲得工作的希望’，而其他的人不合規定，則因為據稱是‘他們沒有真正努力地去尋覓工作’；有的人被拒絕享受福利，因為他們是太老而其他的則又因為太年輕，又告訴他們如果一家的收入每人每周在十三先令以上，他們的親屬就要贍養他們”^①。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職工大會最高委員會決定主動地促使雙方再度接近，經過了四個星期的建議與反建議，宣布了這一絕望的鬥爭的結束。但是甚至是在臨結束時仍然有一大部份人投票贊成繼續戰鬥。

由於職工大會建議的結果，政府提出了一項分區協定的提議，在工人与礦主之間進行淨收益的分配時，其百分比是在八十七比十三和八十五比十五之間不等，并有某些保證，限制工資減少的程度。十一月十三日礦工方面同意把這一計劃提交給他們的二十個地區進行投票——而投票的結果為贊成政府建議者三一三、二〇〇票，反對者四六〇、八〇六票。然而有十個地區投了“贊成票”，七個地區投

① “一九一九年——一九三六年的失業工人鬥爭”，第一五六頁。

“反对票”，两个地区弃权。

杜尔漢、南威尔士、蘭开夏等大煤田区和整个的蘇格蘭仍然堅定地要繼續战斗。賽彼夏、密得蘭和約克郡則反对。尽管有許多人对停止罢工，礦工执行委员会現在已十分清楚，只有他們偉大的精神在支持着这些人罢工。他們的抵抗已为飢餓、疲乏和苦难消耗殆尽。整个夏天和冬季最初的月份中，他們还勇敢地抵抗着，希望他們的战斗会影响工会运动中其余的人員再度参加战斗。但是末日已經到來了，十一月十九日礦工代表會議向各地区建議進行分別談判，尽他們的可能去获得最有利的条件，并向全國會議彙報批准。接着就是各区的談判——某些地区得到了羞辱的結果，在最后一滴力量也已施出后，十一月二十六日的代表會議就正式結束了这次歇業。

講述关于礦工們在其歷史性的抵抗中所遭遇到的全部牺牲和苦难事蹟的整个故事是决不可能表达出其真实的和悲劇性的程度的。我們只能希望零零星星地对他們絕望的处境和整个的布好陣勢对付他們的國家机器的無情与冷酷有片段的，或者是一鱗半爪的了解。

这是一次多么巨大的、可恨的和令人心碎的战斗啊！这些男人和他們的妻子以及他們的孩子，背上穿着像挂着的碎布条一样的衣服，他們的眼睛中射出飢餓的目光，絕望和令人憂郁的大屠殺籠罩着他們的房屋，他們怎样坚持了如此之久？用不着从理論上去尋找原因：提出理論或者从人类行为的表面上去搜索是不得要領的。这些人为了—百万个不同的理由去这样做——但是有一个高于一切的理由：他們已經嘗試到了團結的威力，他們知道和他們的兄弟并肩坚持的力量，而他們直觉地看到了未來对这一切可能

的答案——他們對於他們的同伙感到了一種新的信任，因為當所有別的東西都已被燒成灰燼時，還有別的什麼東西可能使希望繼續燃燒呢？

峽谷又被推回到奴役之下……

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日星期四在議會中央大廳舉行的一次工會執行委員會的歷時兩天的特別會議上，進行了期待已久的關於總罷工善後。或許工會運動史上從來也沒有一次會議上存在着如此深刻的互相殘殺的仇恨。最高委員會的報告——可以回憶到這是為了後來延期的一九二六年六月會議而早已準備好的——大部份早已在一月會議召開前就洩漏了。最高委員會知道他們將遭受嚴厲的批評，因而妥為準備他們的論據：礦工們來此也是決心要攤牌。在這相互攻擊的仇恨的兩天中，很少人得益，但是這次會議標誌着一個人在工會中地位的升高，他也是以後成為這一運動所曾培植出的最有权力的人物之一。

華爾特·默·西特林在當時是代理總書記。他在愛克勒斯頓廣場鋒芒畢露，但他也戰勝了一些敵人——那不是在政治意義上的敵人，而是個人爭奪權力方面的敵人。最高委員會的上層有着好幾個可以被恰當地稱為“事業家”的人物，而這顆昇起的明星華爾特·西特林在某些場合是和他們對抗的。但是西特林已經學會了致勝之道——直到目標已經在望時總是緊握著韁繩。他在中央大廳第一次放開了韁繩，在那一個值得記憶的場合，多年來高高在上的人們喪失了他們的信譽。當仇恨的譴責像毒蛇的牙齒一樣在會議廳中發出响声時，西特林向大家呼喚要神智清明。他自始至終扮演著十分不突出的和事老，既不以這一邊的擁護者也不以另一邊的擁護者出現：他曾經因制訂後來為最高

委員會所拒絕的總罷工準備計劃而一度與礦工們友善。另一方面他自己從來也沒有表示過他是一個罷工的热情贊助者，所以沒有一個委員會的成員可以把指責的手指指向他說“西特林，叛徒”。現在在這工會事務決定性的轉折點，他以理智的擁護者出現。在這種互相攻訐的氣氛下，他在一篇出色的演說中向每個人呼吁忘却舊的紛爭，為了運動而共同工作。這是一個大膽的行動：但是這種大膽得到了它的報酬。自該時起，最高委員會中就再也沒有人能和西特林匹敵。

在該一會上西特林在阿瑟·杰·柯克向最高委員會作了嚴厲的攻擊之後接着發言。他莊重地宣稱“大家認為這是一次重要的會議，它如果不是我們運動史上所曾舉行過的最重要的會議，也可算是最重要會議之一……”^①

他出色地為最高委員會的缺乏準備而辯護——雖然他自己曾準備過一個計劃。他指責了礦工們的遷延時日。然後他以西特林不言而喻的技巧作出了下列結論：“最高委員會和我們的大會如果要去找出失敗的根本原因，它必須要作比以往更深的探索。我希望這樣的時刻將要來到，就是不去調查究竟是礦工們對呢？還是最高委員會是對的，我們將坐下來客觀地研究問題，看看有些什麼缺點。除非我們這樣做，不論是趕走你們的領袖或者把杰美·湯瑪士的頭顱放在大盤子里都是毫無裨益的。如果你們高興的話，你們可以解雇所有你們的領袖們——把領袖這一個名稱加在我自己的身上實在使我極感自卑。我寧可被稱為是一個代表。我知道有些人他們談論着如何做領袖，但他們又以

① “職工大會全國罷工特別會議報告”，一九二七年，第三六頁。

同样的声調說他們所作所为只是羣众所告訴他們的事。(笑声)是的，領導必須肯定地意味着要願意和准备去面对批評和担負起自己的責任。对于所發生的情况，礦工联合会和最高委員會都不能說是毫無过錯的——我要求你們尽可能地忘却其中的个人，客觀地去研究这一事件，再告訴你們自己什么地方錯了；在这样情况下，还能有任何人采取其他不同的行动嗎”？[⊖]

尽管西特林在講演中不是完全成功的——他对柯克所質詢的許多問題未加答复——但在贏得大会贊同这点上肯定地他是沒有失敗。如果有任何一篇演講可以說是在使最高委員會獲得勝利(以二、八四〇、〇〇〇票对一、〇九五、〇〇〇票)上功居第一的話，那肯定地是西特林的演講。但它并未中止战争，因为次日礦工代表斯·奧·戴維斯(現为工党國會議員)和鐵路工人的領袖西·特·克蘭普發生了劇烈的冲突。普通和市政工人工会的总書記查理·丟克斯先生(后为勳爵)提出了一个陈旧的和議論紛紛的問題，即在总罢工期間授權的問題。他說他在紀念大厅會議上的印象是每一个工会的執行委員會“已放棄了他們的獨立性，把他們的權力，全部的權力交給最高委員會”。一些“不”的喊声回答了这一論調，但是毫無疑問，最高委員會本身也采取了和丟克斯先生相同的看法，而且也确实从未对煤礦联合会掩飾这一事实。一名年輕的礦工代表彼得·詹勃斯先生作了會議將近最后的一篇演說，他向四周环顧并面向主席台說出了他最后的詞句，他向最高委員會進行了公开的反抗：“我們將要有一次沒有你們參加的总罢工，而下次我們

⊖ “职工大会全國罢工特別會議報告”，一九二七年，第三六頁。

將獲得勝利”。

当两个完全相反的主题还在他们耳畔的时候——克蘭普之流的“决不要再这样做”；和詹勃斯的“我們將要再來一次”——代表們在一个可怕的正月的日子里离开了中央大廳，彼此分裂相互敌对，虽然有过上述的一些呼吁。他們很少認識到——或者是已經認識到？——在以后的几个月中，有些什麼限制的措施正在等待着他們。政府知道，領導者之間可能已經形成分裂，而当工人們自己嘗試到了統一的行動，他們是會很快地遺忘的。鮑爾溫考慮到立法機構必須要迅速採取行動，以便阻止任何新的問題爆發，所以他迅速地採取了行動——迅速而無情地——并在二月关于英王致詞的辯論中，提出了声名狼藉的產業糾紛法案（一九二七年），或如通常所稱的“工賊憲章”。

這一件純粹政治性的立法毫無疑問是政府對總罷工惡毒的報復，他們的政策部份地是要阻止任何類似情況再度發生，在他們的綱領上再進一步就是要動員工人進入一個“愉快的工人關係”的時代，這和那些經歷過組合國家的人們毫無二致。

有充分的證據證明該法案曾經準備了相當長的時間，而鮑爾溫僅僅是在等待一個適當的時機把它提出。還有比現在更好的時刻嗎？各工會之間正因為總罷工的是與非而形成了分裂：許多工會還在向僱主們付出大量的賠償，因為在關於罷工期間破壞契約的問題上僱主們採取了法律行動。一九二六年五月八日還在罷工的中途，鮑爾溫內閣成員之一——阿瑟·斯梯爾——梅特蘭爵士致書赫伯特·賽繆爾爵士評論了赫伯特爵士以調停者身份所作的努力……“同意通過契約的過程以求得總罷工的結束，實際上，要致命地

使政府不能执行作为社会的託付者所必須要担負的任务……他們認定总罢工是違憲和非法的。他們必須要采取措施使其不可能重演。因此这很清楚，他們不能進入任何的談判……从最近發生的事件來看这些談判將使他們在正当的立法之前受窘”。[⊖]

一九二七年的“產業糾紛和工会法案”制造了一种新的“非法罢工”的类型，而当一次罢工被認為是非法时，政府可以頒發命令禁止用工会基金去支持它。但是它的目标并不僅僅是与罢工搏斗，而是去打击，打击創痛最深之处，打击作为一种組織的工会运动。攻击工会征募基金的办法不僅限制了工会的訂立契約的力量，也限制了工党基金的主要來源。右翼党派大部份是由大企業和富有的家族提供財政上的支持。但是工党是依靠，几乎是全部地依靠工会的征募——这是一种制度，一个工会會員除非他訂約不繳納政治基金，他每年必須繳納不足一先令，作为他的工会的政治基金。而該法案把这点更改为各工会會員如果希望繳納政治基金，他就必須“訂約”。这当然是一个聰明的办法，它是靠着一般工会會員对政治的冷淡，他們是怕麻煩去完成“訂約”的形式。在一九一〇年奧斯本判决案廢除了繳納政治基金的义务，但一九一三年的工会法又把該一措施恢复为合法的。現在，甚至于“观察家报”在当时都說保守党实施了一項典型的“階級立法”。

該法案对于罢工自由的破坏是有巨大影响的。任何人“宣布，挑起或鼓动他人参加或以其他行为贊助”被宣布为非法的罢工就將被处以二年以下的徒刑。“非法的罢工”这

⊖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四日“泰晤士报”。

一名詞使一个反动的政府获得極大的歧視的权力，任何类似总罢工的再演肯定地会被毫不躊躇地划分为高度“非法的”。

但它所涉及的範圍比这更廣。这一禁令应用于一切的凡是發展为一个行業或是工業部門以外的，“圖謀直接地或以使社会遭受困难的方法來强迫政府”的罢工。正如所有其他的劳資糾紛立法一样，停業也和罢工一起包括在內的。但是包括与否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因为从嚴格的法律意义上來說，“停工”是很少的。僱主們通常是很聰明地迫使工人們拒絕“参加新的协定”，从而促成一次罢工，虽然从道义和社会的意义上來看可以証实这是一次布置好的停業。該法案重大作用是在于阻止工会放縱地進行罢工，因为政府認為在采取法律行动之后，那些罢工将引起嚴重的訴訟。在效果上，該法案的警告作用是更大于直接的压迫作用——虽然最后对工人們的談判权，从而生活水平所發生的影响是和直接起阻碍作用的立法完全相同的。

它允許法庭有特別廣泛的行动自由权去進行干涉。此外，“非法的罢工”这一条款使基本工業部門中的工人進行任何的罢工——甚至是在真正明顯的冤曲之下——都要遭受危險。

該法案对進行糾察也加以限制：它禁止政府机关職員加入与职工大会或工党，或是与二者有关的工会，并禁止地方政府在僱用时以工会會員为錄用条件或优先錄用的条件。后者当然是明顯地鼓厉地方政府职工不加入工会，因为他們可以不必付出工会会費而获得同等的待遇。同一条款对于地方机关的分承攬人也同样有效——这意味着把它推廣至当地商業或工業中很廣大的一部份去。其中有一条

教，它使“重要公共事業”中工人破坏协定的行为成为可加以惩治的罪行。正如格·德·赫·柯尔所曾指出，“这是回到了被一八七五年雇主与工人法案所扫除的旧的主僕法”^①。

从每一条来看——該法案包括了七条直接有关限制罢工的条文——該立法是政治自由上突出的向后轉。第一条：宣布总罢工和同情罢工是非法的并給予法庭廣泛的权力加以干涉。第二条：給工賊以保护。第三条：使進行糾察几乎成为不可能，而且也一定会造成嚴重的后果。第四条：禁止工会在財政上支持他們在公共团体中的代表。第五条：禁止邮务人員以及其他國家机关人員和其他有組織的工人階級联合起来。第六条：禁止市政机关以工会會員为僱用的条件，該类職員如事先沒有及早通知而進行罢工就是犯罪行为。第七条：規定以总檢察長为監督工会的警犬和憑他們的忠誠，担任超乎法律之上的仲裁者。

華尔特·西特林在通过產業糾紛法时評論說：“五十年來努力的成果大部份都要失去，而有組織的工人將比过去任何一时期都更依賴于有組織的資本主义的仁慈”。^②

虽然工人运动中發出了抗議的吼声，該一法案还是被鮑尔溫政府所指揮的國會中的絕對多数所通过。工人运动繼續組織了一次反对法案的巨大战斗，但是那些領導着叫嚷和大声疾呼反对法案的人正是那些把工人導向“失望的泥潭”中去的人：他們已失去了主动，并且在今后的許多年中，保守党人是沉醉在报复的光輝之中。

就工党而論，一九二七年法案的影响是極大的。黨員

① 格·德·赫·柯尔教授“一九一四年后英國工党史”。

② “政府对工会法的道歉”(一九二七年阿靈·漢德森在职工大会所作的分析報告)。

数字自一九二六年的三、三八八、〇〇〇人下降至兩年后的二、〇七七、〇〇〇人。在同一时期工会会员数字自五、二一八、〇〇〇人下降至四、八〇四、〇〇〇人。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之間，工党损失了差不多全部党費的收入的四分之一，而工会基金的枯竭意味着工会不得不在他們对工党候选人財政上的支援嚴加限制。从那年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工党实际上是在保守党员处心積慮地強加于他們的極为不利的条件之下進行工作。为了这一原因，如果不是为了其他原因的話，他們在一九四五年恢复权力后工党政府第一件事就是廢止一九二七年罪惡的法案。

总罢工的退却并不是到此为止。这种耻辱还更深入一步，这种毒液不僅是由鮑尔溫政权的保守党人注射，也由那夥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叛賣的人注射。这段时期被标榜为“工業和平时期”，在合夥的基礎上和有組織的資本主义合作的必要性：需要額外的生產，更好的工業技術以及其他我們現已熟知的一些陈腔濫調到处充斥。在一九二七年、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它是为了一个不同的宗旨，但它都是服务于一个同样的根本目的——保存資本主义。工人运动的領導陷入了那些除了忠实地解釋社会主义而外，什么都能行的人手中。直接導向一九三一年大泛濫的裂痕已經出現了；但是只有比較少数的人——在共產党外——在当时認識到工党上層弱点的嚴重性。

这一“合夥”原則是在最高委員會中取得勝利的，到了一九二七年年中时，當他們仍然在進行对產業糾紛法案的战斗时，領袖們主动地邀請僱主們合作“共同努力改進工業效能和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实际上这些字眼就是乔治·希克斯先生，一位总罢工前在委員會中的左派人士，在一九

二七年爱丁堡职工大会的主席致詞中所使用的。

在将近年終时，以已故的梅尔契特勳爵(当时是阿尔夫雷德·蒙特爵士)，即規模宏大的資本家的帝國化学工業聯合的建立者为首的一个二十名主要工業家組成的集团向最高委員會說他們非常願意討論有关“工業的改組和工業关系”的一般問題。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二日，在產業糾紛法案的提出还不到一年时，就举行了工会活动家和工業家第一次的联席會議——在朴素的波林頓宮中的平等的气氛中進行。

蒙特主义——这一时期工業关系的名称——歷时甚久。在許多方面，它现在还同我們存在着。这些观点如：資本主义必須加以改進，必須加以修補，必須不能使它由于它自己固有矛盾的結果而复滅，从其中工人們是可以获得一些好处的，而社会主义可以找到一条“和平的道路”到达其目的地等等仍然在曲解着工人运动的远景。在蒙特主义被右翼工人运动所正式接受僅僅六年之后，杰·默·凱恩斯就出版了他著名的“普通理論”一書，其中發展了經濟上的論点，資本主义可以用非正統的財政或資本的措施來加以挽救。

一九二九年工党政府把蒙特主义推行到邏輯的結論上去。它和倫敦市各大銀行和工業資本主义狼狽为奸——而最后它也就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死亡。但是蒙特主义还有其他可恥的方面。蒙特报告中有一項暗藏的关于公司工会运动的建議。罢工的非法化还不能使它滿足，一般的激進活动在將來都要被摺斥。一个被僱主所迫害的激進的工会會員將不包括在蒙特报告的範圍內，因而他不能要求他的工会給予任何的支持。他甚至可能就会被开除出工会。

当有組織的工人开始認識到这种“工業和平”的巨大影响时，工会运动的内部开始战慄起來。他們在工会内部頑強地進行着斗争迫使其領袖違反自己的意志而去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在和僱主們進行的战斗中，敌人是暴露的。但是当工人階級内部还有一个障碍有待于克服——叛賣的領導——困难是巨大的：刑罰是嚴厉的、沉重的和实在的。蒙特主义和合作在当时就意味着这些。今天的情况也是如此。

結 論

有人曾經說過總罷工的瓦解是因為職工大會所面臨的唯一的轉換就是革命。然而我們知道，這次罷工並不是用以支持這樣的基本信念，即利用總罷工的武器作為獲得權力的根本的方法，這樣的一個基本信念也不是與任何計劃中的政變相關聯的。最高委員會熱切地堅持否認這是對憲法的一次進攻，並聲稱這“僅僅是一件勞資糾紛”。但是甚至是在那樣的束縛下，其可能性仍然是龐大的。除了領導不幸的投降外，還可以有各種策略上的變換。一次持久的鬥爭，號召出更多的工人，在誠實和勇敢的領導下是可以使鮑爾溫政府相信最高委員會不是可以輕易對付的。這就可能迫使政府向礦工們國有化的要求讓步——如我們現在所知他們是完全可以讓步的。

而結果却是保守黨人得以使煤礦工業在二十年間繼續惡化，在國有化最後到來時它已處於完全衰落的條件之下。這樣的過程有時候是被稱為“演變的發展”。認為最高委員會所面臨的選擇是——瓦解或革命，這的確是一個錯誤的分析。

但是從一條現實的途徑去解決整個國家權力的問題一直是英國工人運動的右翼——實在也是一般社會民主黨人——所迴避的。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不可能想像在一次總罷工中，或甚至是在任何一次罷工中可以不面對資

本主义的國家权力。自工業革命以來，沒有任何一件單一的事件像总罢工那样把政权問題提在英國工人的面前。一九二六年的罢工如果取得勝利，由于事件的性質，必然会造成更換政府——換上工党政府——的基礎。然而，那不能算是一次革命；因为在这种条件下，工党在國會中的一次勝利固然意味着大大地前進了一步，但它本身不能决定为政权而斗争这一問題，因为这只能由工人階級及其最先進的份子的繼續不断的羣众性行动所决定。

鮑尔溫所持的論点从來也沒有被假扮成为單純的法律上的論点。他的“罢工是对憲法的進攻”这一推論是建立在比司法的先例(例如西蒙所提出)更完全和更具体的基礎上的。这是一切資本主义國家的社会的——也是哲学上的——教义，如果“社会”(即社会上的有產階級)被一次有組織的生產停頓所“威脅”，那末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國家的一次攻击：如果發展到全國，就是对憲法的進攻。这是跟随着資產階級所采用的对國家政权的概念而來的。但是实际上这种國家权力究竟是什么呢？鮑尔溫在使用鎮压罢工的無上权力时，他的行动在邏輯上是符合于資本主义的需要的——保护統治階級的財產。哈罗德·拉斯基教授寫道：“甚至是在工会不受國家政权的管轄，絕大部分的工業和農業掌握在私人手中的政治社会中，困难的条件会迫使現代的政府，在它認為國民生活中主要方面受到威脅时……把独立的运动轉变为必須服从于國家政权的运动……在理論上这种权力的执行是可以不顧实际糾紛中的是和非的”[⊖]。

換言之，依据这种邏輯，國家政权的作用必須是在于保

⊖ 哈·杰·拉斯基：“新社会的工会”，第一五頁。

衛財產權，這在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內，就資本家的利益所及而言是不可侵犯的。正如金斯萊·馬丁先生所指出，法律是受到了這一交織在任何資產階級國家結構中關於財產權的概念所限制的：“合乎憲法，實際上就意味着合乎習慣的，而違憲就意味着有產階級感覺不方便的行為”^①；馬丁又說，就有关法律方面而言（在一九二六年中）“法律是用以消除對潛存的財產權問題的注意力，而在裁判時對窮人的判決特別嚴酷又加強了這樣的觀念，即當財產開始發生危險時，法律的大公無私就告結束”。諾森伯蘭公爵不是曾向桑基委員會解釋過他每年自礦山的專利使用費上收入七萬三千英鎊，除了他的繼承權而外，他就不需要為此提出任何理由嗎？

資本主義國家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法學概念給予任何政府——不論它是保守黨的、自由黨的或是正統工黨的（即社會民主黨）——在有关工會問題方面，一種特別的政治上的地位。這種地位迫使工會把國家當作它們的主人，並且也使人看清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在一件勞資糾紛中是注定了偏向於對工人不利的一方面^②。

拉斯基寫道^③：“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當一件勞資糾紛嚴重地影響到社會時，政府所採取的干涉的影響在正常的情况下將是……有利於有產階級及其經營的代理人，而是

① 金·馬丁：“英國公眾與總罷工”，第一〇五、一一六——一一七頁。

② 一九一九年七月，列寧在斯維爾德洛夫大學的演說“論國家”中說：“不管共和制度用什麼形式粉飾起來，就算它是最民主的共和制度，但如果它是資產階級的，如果它那里保存有土地和工廠私有制，而私有資本把全社會都控制在雇傭奴隸的地位……那末這個國家就是供一部份人壓迫另一部份人的一副機器”。

③ “新社會的工會”，第二二頁。

不利于工会运动的”。对于一个和任何自由党或保守党政府同样地認為在國民經濟的工業和農業中有必要保存一大部分私人資本的工党政府，这点也是同样適用的。工党政府，也就是拉斯基自己的同僚，在一九五〇年援引了一項保衛規則(調解令一三〇五号)以对付十名罢工的煤气工人，而恰巧在同时倫敦印刷工業中有一批僱主違反了同一法令却免于處罰。

私有財產的權利是資本主義國家固有的概念之一，并且受到法令以及習慣法保护的。应用法律的形式來維護財產的不可侵犯的權利是資本主義國家主要功能之一。因为，正如德·托克維爾所說：“民主政治的歷史迄今为止絕大部分是服务于謀取利潤的動機。”这样就得出結論，当一批工人向這一概念挑戰，正如礦工們在一九二六年向煤礦主挑戰一樣，依据資本主義國家的邏輯，他們是向國家權力的基礎，即憲法進行挑戰。在整個的歷史中，“一無所有者”的每一行動总是被“所有者”標榜為“違憲”的。

總罷工對英國政治制度的影響是不小的。產業糾紛法企圖以法令來建立約翰·西蒙爵士在罷工期間用法律上的詭辯所未能辦到的一切。當這整個詭計和迫害的布局完成后，善于突然吐露出某些發聾的但又真實的言論的斯丹萊·鮑爾溫首相暴露了保守黨最奇異的秘密。他殘忍地說：

“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我挑起了一次總選舉，以這一工具瓦解工人運動和使工黨在行動上和言論上都參與了我們的帝國政策。

“在一九二六年我挑起了一次總罷工，以這一工具瓦解工會領袖們和打破在一九二五年時已變得如此明顯的各工會的團結。

“現在不論在國會內或國會外，都沒有重要的有組織的政治上的反對派。不論革命力量可能獲得怎樣的實力，它還是很小的，他們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對我們所希望實施的任何政策加以嚴重的阻礙”。

鮑爾溫裝了一套這樣的哲學在他的背囊中，和他的政黨就大踏步地走向一九三九年的深淵：他經歷了三十年代初期的經濟危機、羣眾性的貧窮和失業，最後把警棍交付給尼維爾·張伯倫……

我們現在知道了總罷工悲劇性的退却的一般情況和最後結果。走向戰爭是逐步實現的。從蒙特主義到麥克唐納的叛賣：在艱苦的經濟衰退的幾年中法西斯主義向前挺進，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佛朗哥的魔爪指向人民；經過了西班牙和慕尼黑就到达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社會主義的改良主義者在一九四五年獲得了最好的機會。當時的問題是：資本主義的國家如何求助於不存在於法庭之外的憲法來保衛神聖的財產權利？今天這答案已經知道了——它們實際上從來也沒有受到過威脅。要說資本主義國家同意和平地轉變到“民主的社會主義”那是不正確的。因為正統工黨所持的觀點是和任何其他資產階級政黨一樣地尊重現狀（有時候社會民主黨人把這當作一種對“法治”的信仰而加以保護）。社會主義的改良主義者很難期望處於比一九四五年總選舉後更有利的條件之下：儘管如此它却未能實現如歷史所必然要證明的，工黨的空前多數所預示的根本的社會革命。

這種進展着的叛賣政策，今天已經到了令人難以相信的程度。如果說它的開端是在總罷工之後，那未免過於簡單，它的開始是深深地埋伏在社會民主主義的根上。但是

自总罢工开始在英國叛賣的步伐是更加快了，更加明顯了，当然也更加狡猾了。对于工人階級來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是艰苦的歲月：但是他們的政治水平和覺悟也随着每一次新的經驗而提高。一九四五年他們利用了那种經驗对英國資本主义加以如他們所認為的一次巨大的打击。但是它只証明了上一次的教訓还需要加以學習。叛賣的力量仍然是在前一步。

我們今天对于一九四五年的錯覺應該指出什么呢？不管叛賣者給它(資本主义)加上什么名字，資本主义不会帶來別的，只有战争。讓他們称之为“社会民主主义”或者是“民主社会主义”；讓他們授以法治的称号或者是“西方文明”的称号；总之都归結为同一基本的真理——工人階級不能和資本主义社会的統治階級合作。这种合作要分裂工人階級的隊伍，并在它的軌痕上帶來新的叛賣，和相繼而來的失敗和幻想——失望。一九四五年的幻想現已完全粉碎了，但是碎片却打得很深。右翼工党的領導者們——一九二六年的繼承者——蜕化的影响造成了不可避免的后果。工人們再度面臨着歷史上空前巨大和破坏性的战争与毀滅。这次他們却顯然不是被保守黨員，而是被險惡乖張和具有魔法的戴着社会主义者面具的人導入地獄。⊖英國作为世界上最窮凶極惡的資本主义國家——美利堅合眾國——的一个衛星國，只有工人階級强有力的正义才能阻止進一步陷入巨大的灾难，只有學習过去大叛賣的教訓，我們才能了解今天的叛賣，才能逐漸获得團結以阻止新的禍患。正如我們的威廉·莫理士(在他的“轉變的征兆”一書中)所告誡我

⊖ 本書出版時，英國執政黨仍為工黨。——譯者

們：

“能够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的不是我們：过去的时代曾为我們做了大部份的工作：但是我們能擦亮我們的眼睛看到时代的征兆：这时候我們將看到获得良好的生活条件对我們來說，已經成为可能，而我們的工作只是伸出我們的手去抓住它”。